马列毛主义者基础书单之民族和殖民地问题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 编

2023

声明

本 pdf 文件由志愿者制作，内容搜集自 telegram 频道“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其频道链接是 t.me/proletarianstruggles。

编者简介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是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的机关报。我党主张社会主义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本报作为全国性质的政治报，通过建立代办员网络、进行全面的政治鼓动，宣传革命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逐步做到巩固的思想一致，组织中国共产主义者和无产阶级群众。

斗争报将力图对一切引起关注和争论的斗争事件按马列毛主义的精神进行评论，坚决批判各种机会主义思想，将科学社会主义灌输到工人运动当中。

联系方式

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先锋队，是从民族主义者、自由派到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等一切资本主义政党的敌人。因此，无耻的机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政客们必然会用尽各种办法攻击我们党，可以预见到阶级敌人的其中一种手段就是**表面上假扮成支持我党**的口吻，**事实上却肆意编造谣言来歪曲我党的主张**，甚至**冒充我党党员发表反动言论，把我们从未说过的话强行按在我们头上**，把我党抹黑成打家劫舍、杀人放火的赤匪或者极端“左”倾的疯狂迫害知识分子的红卫兵，借此欺骗恐吓小资产阶级群众远离和仇视无产阶级革命派，迫使群众对我们党的纲领和主张保持一无所知的状态。有鉴于此，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预先发布下列联系方式和 GPG 公钥，以便广大群众能够直接联系我党和了解我们的立场，摆脱资产阶级的谎言。

我们的**公开群组**对所有进步群众开放，只要不发表反动言论都可以留在群内。这就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审查每一个加入群组的人的真实身份，不可能把警察、自由派、机会主义者等等绝对排除在公开群组以外，这些反革命分子必然潜藏在群众里伺机而动。因此，各平台的**公开群组**里鱼龙混杂，**群成员的言论仅能代表发言者个人，任何意义上都不能代表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的立场**。不论在墙内还是墙外，只有我们在《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和《佳士工人声援团官网》上公布和验证过的宣传平台能够代表我们党的正式立场，除此之外，不要相信任何自称能代表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的骗子。

一、网站

佳士工人声援团官网

jiashigrsyt1.github.io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

proletarianstruggles.github.io

proletarianstruggles.wordpress.com

二、邮箱

佳士工人声援团联络邮箱

jiashigrsyt@protonmail.com

斗争报邮箱

douzhengbao@protonmail.com

三、Telegram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频道

https://t.me/proletarianstruggles

“声援佳士工友”群组

https://t.me/JSshengyuan

管理员电报账号

https://t.me/jsgrsyt

https://t.me/zgmzdzygcd

四、Matrix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频道

https://app.element.io/#/room/#proletarianstruggles:matrix.org

“声援佳士工友”群组

https://app.element.io/#/room/#JSshengyuan:matrix.org

管理员 Matrix 账号

https://app.element.io/#/user/@jiashigrsyt:matrix.org

https://app.element.io/#/user/@mcpc:matrix.org

五、Keybase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团队

https://keybase.io/team/douzhengbao

管理员 Keybase 账号

https://keybase.io/jiashigrsyt

六、XMPP

“声援佳士工友”群组

jsshengyuan@conference.conversations.im

管理员 XMPP 账号

jsgrsyt@conversations.im

mcpc@yax.im

七、GPG 公钥

https://keybase.io/jiashigrsyt/pgp_keys.asc

https://proletarianstruggles.files.wordpress.com/2023/11/pgp_keys.asc

https://jiashigrsyt1.github.io/pgp_keys.asc

目录

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1
注释：……8
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11
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13
1．自由派和民主派对语言问题的态度……13
2．“民族文化”……16
3．民族主义的吓人字眼——“同化”……20
4．“民族文化自治”……26
5．民族平等和少数民族的权利……32
6．中央集权制和自治……36
注释：……42
精致的民族主义对工人的腐蚀……48
注释：……50
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52
注释：……61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1，3，4）……63
1 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63
注释：……78
3 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1]……81
注释：……85
4 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发言[1]……86
注释：……92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93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99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102
一　民族......105
二　民族运动......113
三　问题的提法......119
四　民族文化自治......125
五　崩得，它的民族主义，它的分离主义......133
六　高加索人，取消派代表会议......144
七　俄国的民族问题......154
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160
一 二月革命和民族问题......160
二 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162
三 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165
毛泽东篇......168

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

列宁（1903 年 7 月 15 日〔28 日〕）

在党纲草案中，我们提出了建立具有民主宪法的共和国的要求，民主宪法应保证“承认国内各民族有自决权”。许多人觉得我们纲领中的这一要求不够明确，所以在本报第 33 号上谈到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人宣言时，我们对这一条的意义作了如下的说明。社会民主党将永远反对任何用暴力或任何非正义手段从外部影响民族自决的企图。但是，无条件地承认争取民族自决的自由的斗争，这丝毫也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支持任何民族自决的要求。社会民主党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其真正的主要的任务不是促进各民族的自决，而是促进每个民族中的无产阶级的自决。我们应当永远无条件地努力使各民族的无产阶级最紧密地联合起来。只有在个别的特殊情况下，我们才能提出并积极支持建立新的阶级国家或者用比较松散的联邦制的统一代替一个国家政治上的完全统一等等要求。[注：见本卷第 87—90 页。——编者注]

我们纲领中对于民族问题的这个解释，招来了波兰社会党[1]的强烈抗议。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对民族问题的态度》一文（1903 年 3 月《黎明》[2]）中，波兰社会党对于这种“令人惊异的”解释，对于我们“神秘的”自决之“模糊不清”表示愤慨，指责我们是学理主义，是“无政府主义”观点，似乎我们认为“除了彻底消灭资本主义之外，其余什么都与工人无关，因为语言、民族、文化等等都只是资产阶级的虚构”，如此等等。这个论据值得详细地谈一谈，因为它把社会党人中在民族问题上很经常、很普遍的误解几乎暴露无遗了。

我们的解释为什么会这样“令人惊异”呢？为什么会认为它违背了“本”义呢？难道承认民族自决权就得支持任何民族自决的任何要求吗？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承认一切公民有自由结社的权利，这丝毫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支持组织任何新

的社团，丝毫也不妨碍我们发表意见、进行鼓动，反对不适宜的和不明智的组织某种新的社团的想法。我们甚至承认耶稣会教徒有自由传道的权利，可是我们反对（当然不是用警察手段来反对）耶稣会教徒同无产者结社。《黎明》说："如果自由自决这个要求能按它的本义来理解（我们至今是这样来理解的），那我们就满意了。"这就十分明显，违背纲领本义的正是波兰社会党。从形式上看来，它的结论之不合逻辑是肯定无疑的。

但是我们不愿只从形式上来检验我们的解释。我们要直截了当地从实质上提出问题：社会民主党应当永远无条件地要求民族独立呢，还是只在某种条件下提出这个要求？这种条件究竟是什么？波兰社会党在解答这个问题时总是赞成无条件地承认民族独立。因此，它对要求建立联邦制的国家制度、主张"完全地无条件地承认民族自决权"（《革命俄国报》第 18 号《民族的奴役和革命的社会主义》一文）的俄国社会革命党人脉脉含情，我们就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了。可惜这只不过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空话，它第一百次、第一千次地表明了所谓社会革命党人的所谓党的本性。波兰社会党经不起这种空话的引诱，受到这种叫嚣的迷惑，这证明它在理论认识和政治活动方面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联系是多么薄弱。我们应当使民族自决的要求服从的正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这个条件正是我们对民族问题的提法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提法的区别之所在。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跟在他们后面亦步亦趋的现代社会党内的机会主义者）以为民主制可以消灭阶级斗争，所以他们抽象地、笼统地、"无条件地"、从"全民"利益的观点、甚至从永恒的绝对的道德原则的观点来提出自己的一切政治要求。社会民主党人无论何时何地都无情地揭露这种资产阶级的幻想，不管它表现为抽象的唯心主义哲学，还是表现为无条件地要求民族独立。

马克思主义者只能有条件地而且只能在上述条件下承认民族独立的要求，这一点如果还需要证明，我们可以援引一位著作家的话，他曾经从马克思主义观点

出发卫护过波兰无产者提出的波兰独立要求。1896 年，卡尔·考茨基在《波兰完了吗？》一文中写道：“只要波兰无产阶级着手解决波兰问题，他们就不能不主张波兰独立，也不能不欢迎目前在这方面可能采取的每一步骤，因为这种步骤总的说来同正在进行斗争的国际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是相符的。”

考茨基继续写道：“这个附带条件，无论如何必须加上。民族独立同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并不是完全密不可分的，不应当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条件地要求民族独立［注：黑体是我们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十分坚决地主张意大利的统一和解放，可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在 1859 年反对意大利同拿破仑结成联盟。”（《新时代》[3]第 14 年卷第 2 册第 520 页）

你们看：考茨基坚决反对无条件地要求民族独立，他不仅坚决要求在一般的历史基础上提出问题，而且正是要求在阶级基础上提出问题。如果我们研究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波兰问题的提法，那就会发现，他们一开始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新莱茵报》[4]曾经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谈波兰问题，它不仅坚决要求波兰独立，而且坚决要求德国为了波兰的自由同俄国作战。然而，马克思同时也抨击过在法兰克福议会[5]主张波兰自由的卢格，因为他只用“可耻的非正义行为”这类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空话解决波兰问题，而不作任何历史分析。马克思并不是那种最怕在革命的历史关头进行“论战”的革命中的腐儒和庸人。马克思用辛辣的讽刺无情地嘲笑了“人道的”公民卢格，用法国北部压迫南部的例子向他说明，在民主派和无产阶级看来，并不是任何民族压迫在任何时候所引起的独立要求都是正当的。马克思引述了一些特殊的社会条件，由于这些条件，“波兰已经成了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革命的部分……甚至波兰小贵族阶级（一部分还站在封建的立场上）也以无比的忘我精神参加民主的土地革命。当德国还在最庸俗的立宪思想和浮夸的哲学思想中徘徊的时候，波兰就已经成了东欧［注：在列宁的引文中是“欧洲”。——编者注］民主的策源地……只要我们〈德国人〉还在帮助压迫波兰，

只要我们还把波兰的一部分拴在德国身上，我们自己就仍然要受俄国和俄国政策的束缚，我们在国内就不能彻底摆脱宗法封建的专制政体。建立民主的波兰是建立民主德国的首要条件。”［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5 卷第 421—422 页和第 391 页。——编者注］

我们如此详细地摘录了这些话，因为它们生动地表明，国际社会民主党在几乎整个 19 世纪后半期对波兰问题的提法，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忽视从那时以来已经变化了的条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旧的答案，那就是只忠于学说的字句，而不是忠于学说的精神，就是只背诵过去的结论，而不善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来分析新的政治局势。当时和现在，一个是最后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时代，一个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前夕反动派十分猖獗、各方面力量极其紧张的时代，这两个时代的区别是极其明显的。当时整个波兰，不仅农民而且很多贵族都是革命的。民族解放斗争的传统是如此地有力和深刻，甚至在本国失败之后，波兰的优秀儿女还到处去支援革命阶级，东布罗夫斯基和弗卢勃列夫斯基的英名，同 19 世纪最伟大的无产阶级运动，同巴黎工人最后一次——我们希望是最后一次——不成功起义，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当时，不恢复波兰的独立，民主运动在欧洲确实不可能取得完全的胜利。当时，波兰确实是反对沙皇制度的文明堡垒，是民主运动的先进部队。现在，波兰的统治阶级、德奥的贵族地主、俄国的工业金融大亨，都在充当压迫波兰的各国统治阶级的支持者。而德国和俄国的无产阶级，同英勇地继承了过去革命波兰的伟大传统的波兰无产阶级一起，在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现在，邻国先进的马克思主义者密切地注视着欧洲政局的发展，对波兰人的英勇斗争充满了同情，不过他们也公开承认：“彼得堡现在已经成为比华沙重要得多的革命中心，俄国革命运动已经比波兰革命运动具有更大的国际意义。”早在 1896 年，考茨基在赞成波兰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包括恢复波兰的独立要求的时候就有过这样的评语。1902 年，梅林考察了 1848 年以来波兰问题的

演进情况，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波兰无产阶级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恢复波兰的阶级国家（关于这一要求，统治阶级本身连听都不愿意听），那就等于演出历史的滑稽剧：对有产阶级来说这是常有的事（如波兰贵族在1701年就是如此），但是工人阶级却不该堕落到这个地步。如果提出这种反动的空想，为的是吸引那些对民族的鼓动还能有一定反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阶层，让他们接受无产阶级的鼓动，那么这种空想作为卑鄙的机会主义的表现，更应加倍地受到谴责，这种机会主义为了一时微小的和廉价的成功而牺牲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

这种利益绝对地要求在三个瓜分波兰的国家中的波兰工人义无反顾地同自己的阶级弟兄并肩战斗。资产阶级革命可以建立自由波兰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只有通过一场现代无产阶级将在其中砸碎自己身上锁链的社会革命，波兰才有恢复独立的可能。”

我们完全同意梅林的这个结论。只是要指出：我们在论证时即使不象梅林走得那么远，这个结论也是无懈可击的。毫无疑问，现在波兰问题的情况和 50 年前根本不同了。但是不能认为现在这种情况是万古不变的。毫无疑问，现在阶级的对抗已经使民族问题远远地退居次要地位了，但是，也不能绝对肯定地说某一个民族问题不会暂时地居于政治戏剧舞台的主要地位，否则就有陷入学理主义的危险。毫无疑问，在资本主义崩溃以前，恢复波兰的独立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也不能说绝对没有可能，不能说波兰资产阶级不会在某种情况下站到主张独立这边来，如此等等。俄国的社会民主党决不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它在自己的纲领中承认民族自决权的时候，把所有的可能性，甚至凡是可能发生的一切情况都估计到了。这个纲领丝毫不排斥波兰无产阶级把建立自由独立的波兰共和国作为自己的口号，尽管这在社会主义以前极少有实现的可能。这个纲领只是要求，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党不要腐蚀无产阶级的意识，不要掩盖阶级斗争，不要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空话来诱惑工人阶级，不要破坏现代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统一。这个条件

正是全部关键之所在，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我们才承认民族自决。波兰社会党枉费心机地把事情说成似乎它同德国或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这两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否认自决权，否认要求建立自由独立的共和国的权利。并非如此，是他们忘掉了阶级观点，用沙文主义掩盖阶级观点，破坏当前政治斗争的统一，——正是这一点，使我们看不出波兰社会党是真正的工人社会民主党。请看波兰社会党通常对问题的提法吧："……我们只能用波兰脱离俄国的方法来削弱沙皇制度，至于推翻沙皇制度则是俄国同志的事情。"又如："……专制制度消灭以后，我们只会这样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使波兰同俄国脱离。"请看，这种即使从恢复波兰独立的纲领性要求看来也是十分奇怪的逻辑引出了多么奇怪的结论。因为恢复波兰独立是民主演进可能产生的（不过在资产阶级统治之下肯定不会很有保障）结果之一，所以波兰无产阶级不能同俄国无产阶级一起为推翻沙皇制度而斗争，而"只能"用波兰脱离俄国的方法来削弱沙皇制度。因为俄国沙皇制度同德奥等国的资产阶级和政府结成日益紧密的联盟，所以波兰无产阶级就应该削弱同俄国、德国和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现在波兰无产阶级正和他们在反对同一种压迫）的联盟。这无非是为了迎合资产阶级民主派关于民族独立的见解而牺牲无产阶级最迫切的利益。和我们推翻专制制度的目的不同，波兰社会党所追求的是俄国的四分五裂，而只要经济的发展使一个政治整体的各个部分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只要世界各国资产阶级愈来愈齐心地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无产阶级，支持共同的盟友——沙皇，那么俄国的四分五裂在目前和将来都只能是一句空话。然而，目前在这种专制制度压迫下受苦受难的无产阶级力量的四分五裂，这倒是可悲的现实，这是波兰社会党犯错误的直接后果，是波兰社会党崇拜资产阶级民主公式的直接后果。为了假装看不到无产阶级力量的四分五裂，波兰社会党只得堕落到沙文主义的地步，例如，他们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作了这样的歪曲："我们〈波兰人〉应当等待社会革命，在这以前应该耐心忍受民族压

迫。”这简直是胡说八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不但从来没有提出过这样的劝告，相反，他们自己在为反对俄国境内的任何民族压迫而斗争，并且号召俄国整个无产阶级来进行这一斗争，他们在自己的纲领中不仅提出语言、民族等等完全平等，而且承认每个民族有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在承认这种权利的时候，我们对民族独立要求的支持，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的，只有沙文主义者才会把我们的立场解释成俄罗斯人对异族人的不信任，因为实际上，这种立场是由于觉悟的无产者对资产阶级不信任而必然产生的。在波兰社会党看来，民族问题只是“我们”（波兰人）同“他们”（德国人、俄国人等等）的对立。而社会民主党人则把“我们”无产者同“他们”资产阶级的对立放在首位。“我们”无产者多次看到，当革命的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面前站起来的时候，资产阶级是怎样出卖自由、祖国、语言和民族的利益的。我们看到，在法兰西民族受压迫、受屈辱最厉害的时候，法国的资产阶级如何卖身投靠普鲁士人，民族抵抗政府如何变成了背叛人民的政府，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如何召唤压迫民族的兵士来帮助镇压敢于伸手夺取政权的无产者同胞。正因为如此，我们根本不在乎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攻击，我们要经常地告诉波兰工人：只有同俄国无产阶级结成最亲密无间的联盟，才能满足目前反对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的要求，只有这样的联盟，才能保证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彻底解放。

我们在波兰问题上所说的话，也完全适用于任何其他民族问题。万恶的专制制度的历史，给我们遗留下了专制制度压迫下各族工人阶级之间的严重隔阂，这种隔阂是反专制制度斗争中极大的弊端、极大的障碍。我们不应当用什么党的独特性或党的“联邦制”“原则”使这种弊端合法化，把这种怪事神圣化。比较简单省事的办法当然是走阻力最小的道路，各顾各，“各人自扫门前雪”，崩得现在就想这样做。我们愈是意识到统一的必要性，愈是坚信没有完全的统一就不能对专制制度发起总攻，集中的斗争组织在我国政治制度下愈是显得必要，我们就愈不

能满足于用表面“简单”实际十分虚假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既然认识不到隔阂的危害，既然不愿意不惜任何代价彻底消除无产阶级政党阵营内的这种隔阂，那就用不着“联邦制”这种遮羞布了，就不必去解决问题了，因为有“一方”实际上并不想解决问题，既然如此，最好还是让生活经验和实际运动的教训去说服人们：受专制制度压迫的各族无产者反对专制制度、反对日益紧密团结的国际资产阶级的斗争要取得胜利，集中制是必不可少的。

注释：

[1]波兰社会党是以在波兰社会党人巴黎代表大会（1892 年 11 月）确定的纲领方针为基础于 1893 年成立的。这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独立民主共和国、为争取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而斗争的口号，但是没有把这一斗争同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革命力量的斗争结合起来。该党右翼领导人约·皮尔苏茨基等认为恢复波兰国家的唯一道路是民族起义，而不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全俄反对沙皇的革命。从 1905 年 2 月起，以马·亨·瓦列茨基、费·雅·柯恩等为首的左派逐步在党内占了优势。1906 年 11 月召开的波兰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把皮尔苏茨基及其拥护者开除出党，该党遂分裂为两个党：波兰社会党—“左派”和所谓的波兰社会党—“革命派”。波兰社会党—“左派”逐步转到了革命的和国际主义的立场，于 1918 年 12 月同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一起建立了波兰共产党。波兰社会党—“革命派”于 1909 年重新使用波兰社会党的名称，强调通过武装斗争争取波兰独立，但把这一斗争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割裂开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起，该党的骨干分子参加了皮尔苏茨基站在奥德帝国主义一边搞的军事政治活动（成立波兰军团）。1918 年波兰社会党参加创建独立的资产阶级波兰国家。该党不反对地主资产阶级波兰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并于 1920 年 7 月参加了所谓国防联合政府。1926 年该党支持皮尔苏茨基发动的政变，同年 11 月，由于拒绝同推行“健全化”的当局合作而成为反对党。——218。

[2]《黎明》杂志（《Przedswit》）是波兰政治刊物，由一些波兰社会主义者于1881年创办。1884年起是波兰第一个工人政党“无产阶级”党的机关刊物。1892年起《黎明》杂志被右翼社会党人和民族主义分子所掌握，但偶尔也刊登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1893—1899年该杂志是波兰社会党人国外联合会（波兰社会党的国外组织）的机关刊物，1900—1905年是波兰社会党的理论性和争论性机关刊物。1907年起，该杂志是右派波兰社会党（所谓波兰社会党—“革命派”）的机关刊物；1918—1920年是波兰社会党的机关刊物。1920年停刊。1881—1901年《黎明》杂志在国外（日内瓦、利普斯克、伦敦、巴黎）出版，后来在波兰（克拉科夫、华沙、利沃夫）出版。——218。

[3]《新时代》杂志（《Die Neue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1885—1895年间，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并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还有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弗·梅林等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俄国1905—1907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910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221。

[4]《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是德国和欧洲革命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日报，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马克思任该报的主编，编辑部成员恩格斯、恩·德朗克、斐·沃尔弗、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斐·弗莱里格拉特等都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该报揭露反动的封建君主派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主张彻底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用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是当时指导群众革命行动的中心。该报创刊不久，就遭到反动报纸的围攻和政府的迫害，1848年9—10月间一度被查封。1849年5月，普鲁

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把他驱逐出境，并对其他编辑进行迫害，该报因此被迫停刊。——221。

[5]法兰克福议会是德国 1848 年三月革命以后召开的全德国民议会，1848 年 5 月 18 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正式开幕。法兰克福议会的选举由各邦自行办理，代表中资产阶级自由派占多数。由于自由派的怯懦和动摇以及小资产阶级左派的不坚定和不彻底，法兰克福议会不敢夺取国家最高权力，也没有能建立人民武装来粉碎反革命，以克服德国的分崩离析状态。法兰克福议会从一开始就宣布制定全德宪法为其唯一重要任务。在制宪过程中，代表们竞相发表演说，无休止地空谈和争辩。直至 1849 年 3 月 27 日，议会才通过了帝国宪法，而这时反动势力已在奥地利和普鲁士得胜。法兰克福议会制定的宪法尽管很保守，但毕竟主张德国统一，有些自由主义的气味，因此普鲁士、奥地利、巴伐利亚等邦纷纷宣布予以拒绝，并从议会召回自己的代表。留在议会里的小资产阶级左派不敢领导已经兴起的人民群众保卫宪法的斗争，于 1849 年 5 月 30 日把法兰克福议会迁至持中立立场的符腾堡的斯图加特。6 月 18 日，法兰克福议会被符腾堡军队解散。——221。

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

列宁（1913年5月10日〔23日〕）

把标题中的这两个词组作对比，似乎是不合情理的。谁不知道欧洲先进，亚洲落后呢？但是用作本文标题的这两个词组却包含着一个辛辣的真理。

技术十分发达、文化丰富全面、实行立宪、文明又先进的欧洲，已经进入这样一个历史时期，这时当权的资产阶级由于惧怕日益成长壮大的无产阶级而支持一切落后的、垂死的、中世纪的东西。正在衰朽的资产阶级与一切已经衰朽的和正在衰朽的势力联合起来，以求保存摇摇欲坠的雇佣奴隶制。

在先进的欧洲，当权的是支持一切落后东西的资产阶级。当今欧洲之所以先进，并不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存在，而是由于不顾资产阶级的反对，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使争取美好未来的百万大军日益壮大起来，只有它才能保持和传播对落后、野蛮、特权、奴隶制和人侮辱人现象的无情的仇视心理。

在“先进的”欧洲，只有无产阶级才是先进的阶级。而活着的资产阶级甘愿干一切野蛮、残暴和罪恶的勾当，以维护垂死的资本主义奴隶制。

欧洲资产阶级为了金融经纪人和资本家骗子的自私目的而支持亚洲的反动势力，这可以说是整个欧洲资产阶级已经腐朽的一个最明显不过的例子。

在亚洲，强大的民主运动到处都在发展、扩大和加强。那里的资产阶级还在同人民一起反对反动势力。数亿人正在觉醒起来，追求生活，追求光明，追求自由。这个世界性的运动使一切懂得只有通过民主才能达到集体主义的觉悟工人多么欢欣鼓舞！一切真诚的民主主义者对年轻的亚洲是多么同情！

而“先进的”欧洲呢？它掠夺中国，帮助中国那些反对民主和自由的人！

请看一笔很简单而又很有教益的帐吧。为了反对中国的民主派，已经签订向中国提供一笔新借款的契约，因为“欧洲”支持准备实行军事独裁的袁世凯。为

什么它要支持袁世凯呢？因为这是一笔有利可图的生意。借款数目将近 25000 万卢布，但要按 100 卢布折合 84 卢布的行市计算。这就是说，“欧洲”资产者实际付给中国人 21000 万卢布；而他们向公众则要去 22500 万卢布。你看，在几星期内，一下子就赚得 1500 万卢布的纯利！这岂不确实是一笔很大的“纯”利吗？

要是中国人民不承认这笔借款呢？中国不是建立了共和制而国会中的多数又反对这笔借款吗？

啊，那时“先进的”欧洲就会大喊什么“文明”、“秩序”、“文化”和“祖国”！那时它就会出动大炮，并与那个冒险家、卖国贼、反动势力的朋友袁世凯勾结起来扼杀“落后的”亚洲的共和制！

整个欧洲的当权势力，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都是与中国的一切反动势力和中世纪势力勾结在一起的。

但整个年轻的亚洲，即亚洲数亿劳动者，却有着一切文明国家里的无产阶级做他们的可靠的同盟者。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无产阶级的胜利，而这一胜利一定能把欧洲各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都解放出来。

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

列宁（1913 年 10—12 月）

在俄国社会生活诸问题中，民族问题目前已经很突出，这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反动派的民族主义气焰嚣张，还是反革命资产阶级自由派转向民族主义（特别是转向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其次是转向波兰、犹太、乌克兰以及其他的民族主义），甚至各个不同“民族的”（也就是非大俄罗斯的）社会民主党人中民族主义的动摇思想日趋严重，发展到违反党纲的地步，——这一切都绝对要求我们比以往更加关注民族问题。

本文的目的，就是专门对马克思主义者和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在民族问题上的这些涉及纲领的动摇思想从总的方面进行研究。我在《北方真理报》第 29 号上（1913 年 9 月 5 日《自由派和民主派对语言问题的态度》）［注：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23 卷第 423—426 页。——编者注］谈过自由派在民族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犹太机会主义报纸《时报》[2]发表的弗·李普曼先生的文章，对我这篇文章进行抨击。另一方面，乌克兰的机会主义分子列夫·尤尔凯维奇先生也批评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问题纲领（1913 年《钟声》杂志[3]第 7—8 期合刊）。这两位著作家提到的问题很多，要回答他们，就非得涉及我们这个题目的各个方面不可。因此，我感到最方便的办法就是先转载《北方真理报》的那篇文章。

1．自由派和民主派对语言问题的态度

许多报纸都不止一次地提到高加索总督的报告。这个报告的特点并不在于它的黑帮反动主张，而在于它的羞羞答答的“自由主义”。顺便提一下，总督表示反对人为的俄罗斯化，即反对非俄罗斯民族俄罗斯化。高加索非俄罗斯民族的代表

自己就在竭力教儿童讲俄语，例如，在不一定要教俄语的亚美尼亚教会学校里就有这种情形。

俄国发行最广的自由派报纸之一《俄罗斯言论报》[4]（第 198 号）指出了这一点，并且作了一个公正的结论：在俄国，俄语之所以遭到敌视，“完全是”由于“人为地”（应当说：强制地）推广俄语“引起的”。

该报写道：“用不着为俄语的命运担心，它自己会得到全俄国的承认。”这说得很对，因为经济流转的需要总是要使居住在一个国家内的各民族（只要他们愿意居住在一起）学习多数人使用的语言。俄国的制度愈民主，资本主义的发展就会愈有力、愈迅速、愈广泛，经济流转的需要就会愈迫切地推动各个民族去学习最便于共同的贸易往来的语言。

但是自由派报纸很快就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证明它的自由主义不彻底。

该报写道：“就是反对俄罗斯化的人里面也未必会有人反对象俄国这样大的国家应当有一种全国通用的语言，而这种语言……只能是俄语。”

逻辑正好相反！瑞士没有一种全国通用的语言，而是有三种语言——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但是小小的瑞士并没有因此吃亏，反而得到了好处。在瑞士居民中，德意志人占 70％（在俄国，大俄罗斯人占 43％），法兰西人占 22％（在俄国，乌克兰人占 17％），意大利人占 7％（在俄国，波兰人占 6％，白俄罗斯人占 4．5％）。在瑞士，意大利人在联邦议会经常讲法语，这并不是由于某种野蛮的警察法（在瑞士没有这种法律）强迫他们这样做，而纯粹是由于民主国家的文明公民自己愿意使用多数人都懂得的语言。法语之所以没有引起意大利人的仇视，是因为它是一个自由的、文明的民族的语言，而不是靠令人厌恶的警察措施强迫别人接受的语言。

为什么民族成分复杂得多而又极端落后的“庞大的”俄国却一定要保留一种语言的特权，从而妨碍自己的发展呢？自由派先生们，情况不是正好相反吗？如果俄国想赶上欧洲，它不是应当尽量迅速、彻底、坚决地取消一切特权吗？

如果取消一切特权，如果不再强迫使用一种语言，那么所有的斯拉夫人就会很快而且很容易地学会相互了解，就不用担心在全国议会里使用不同的语言发言这一“可怕的”主张。经济流转的需要本身自然会确定一个国家的哪种语言使用起来对多数人的贸易往来有好处。由于这种确定是各民族的居民自愿接受的，因而它会更加巩固，而且民主制实行得愈彻底，资本主义因此发展得愈迅速，这种确定也就会愈加迅速、愈加广泛。

自由派对待语言问题也象对待所有的政治问题一样，活象一个虚伪的小商人，一只手（公开地）伸给民主派，另一只手（在背后）却伸给农奴主和警察。自由派分子高喊：我们反对特权；但在背后却向农奴主时而要求这种特权，时而要求那种特权。

一切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都是这样的，不仅大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它是最坏的，因为它带有强制性，并且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有着血缘关系）是这样，波兰的、犹太的、乌克兰的、格鲁吉亚的以及一切其他的民族主义也是这样。无论在奥地利还是在俄国，一切民族的资产阶级都高喊“民族文化”这个口号，实际上是在分裂工人，削弱民主派，同农奴主大做出卖人民权利和人民自由的交易。

工人民主派的口号不是“民族文化”，而是民主主义和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文化。让资产阶级用各种“良好的”民族纲领去欺骗人民吧。觉悟的工人将这样回答他们：解决民族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如果说在资本主义世界，在追逐金钱、互相争吵和人剥削人的世界，民族问题能够解决的话），那就是实行彻底的民主主义。

证据是：西欧的瑞士是一个具有古老文化的国家，东欧的芬兰是一个具有新兴文化的国家。

工人民主派的民族纲领是：绝不允许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语言享有任何特权；采取完全自由和民主的办法解决各民族的政治自决问题，即各民族的国家分离权问题；颁布一种全国性的法律，规定凡是赋予某一民族任何特权、破坏民族平等或侵犯少数民族权利的措施（地方自治机关的、城市的、村社的等等），都是非法的和无效的，同时国家的每一个公民都有权要求取消这种违反宪法的措施，都有权要求给予采取这种措施的人以刑事处分。

各民族的资产阶级政党由于语言问题以及其他问题而争吵不休，工人民主派则反对这样争吵，要求在一切工人组织中，即在工会组织、合作社组织、消费合作社组织、教育组织以及其他一切组织中，各民族的工人无条件地统一，并且完全打成一片，以对抗各种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只有这样的统一，这样的打成一片，才能捍卫民主，捍卫工人的利益而反对资本（资本已经成为而且愈来愈成为国际资本），捍卫人类向不容许任何特权、任何剥削现象的新的生活制度发展的利益。

2．“民族文化”

读者看到，《北方真理报》上的那篇文章通过一个实例即通过全国性的语言问题阐明了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和机会主义，说明了自由派资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有一只手伸给农奴主和警察。谁都知道，除了全国通用的语言问题外，在其他一系列类似的问题上，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表现也很阴险、虚伪和愚蠢（甚至从自由派的利益来看也是如此）。

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是：任何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都会在工人中起严重的腐蚀作用，都会使自由的事业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事业遭受

极大的损失。尤其危险的是，资产阶级的（以及资产阶级－农奴主的）趋向是以“民族文化”的口号作掩护的。黑帮和教权派以及一切民族的资产者，都在大俄罗斯的、波兰的、犹太的、乌克兰的等等民族文化的幌子下，干反动肮脏的勾当。

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现代的民族生活，如果把口号同阶级利益和阶级政策加以对照而不是同空洞的“一般原则”、高调和空话加以对照，那么事实就是如此。

民族文化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的（而且常常是黑帮－教权派的）骗局。我们的口号是民主主义的和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各民族共同的文化。

于是崩得分子李普曼先生失去克制而大打出手，写了一大段杀气腾腾的话对我大肆攻击：

“凡是对民族问题略知一二的人，都知道各民族共同的（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ьная）文化并不是非民族的（иннациональная）［注：Интер——在……之间；——非；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ьный——各民族间的，国际的；иннациональный——非民族的，非国民的，无民族的，无国民的。］文化（没有民族形式的文化）；非民族的文化，即既不应当是俄罗斯的，也不应当是犹太的，更不应当是波兰的，而只应当是纯粹的文化，这种非民族的文化是荒谬的；超越民族的思想只有适合工人的语言、适合工人生活的具体民族条件，才能成为工人阶级所亲近的思想；工人对自己的民族文化状况及其发展不应当漠不关心，因为通过民族文化，而且只有通过民族文化，工人才有可能参加‘民主主义的和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各民族共同的文化’。这是大家早已知道的，然而对这一切，弗·伊·却不愿意知道……”

请仔细考虑考虑这个典型的崩得分子用来驳倒我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论点的议论吧。崩得分子先生非常自信，俨然以“了解民族问题”的人自居，把常见的资产阶级观点当作“大家早已知道的”真理奉献给我们。

是的，亲爱的崩得分子，各民族共同的文化不是非民族的。谁也没有否认过这一点。谁也没有宣布过什么既不是波兰的，也不是犹太的，更不是俄罗斯等等的“纯粹”文化，可见你说了一大堆废话只不过是想转移读者的注意力，想用空话来掩盖事情的本质。

每个民族文化，都有一些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即使是不发达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都有被剥削劳动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每个民族也都有资产阶级的文化（大多数还是黑帮的和教权派的），而且这不仅表现为一些“成分”，而表现为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因此，笼统说的“民族文化”就是地主、神父、资产阶级的文化。崩得分子避而不谈这个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最起码的基本的道理，而“大谈”其空话，这实际上就是反对揭露和阐明阶级鸿沟，把阶级鸿沟掩盖起来，使读者看不清楚。实际上，崩得分子和资产者的表现一样，因为资产者的整个利益要求散布对超阶级的民族文化的信仰。

我们提出“民主主义的和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各民族共同的文化”这个口号，只是从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中抽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成分，我们抽出这些成分只是并且绝对是为了对抗每个民族的资产阶级文化、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任何一个民主主义者，特别是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否认语言平等，不会否认用母语同“本民族的”资产阶级进行论战、向“本民族的”农民和小市民宣传反教权派的思想或反资产阶级的思想的必要性，这是用不着多说的，但是崩得分子却用这些无可争辩的道理来掩盖争论的问题，也就是掩盖问题的实质。

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者可否直接或间接提出民族文化的口号呢，还是说必须“适应”各地方和各民族的特点，用各种语言宣传工人的国际主义口号以反对民族文化这一口号。

“民族文化”这个口号的含义，不取决于这位知识分子的诺言或他想“说明”这个口号“是指通过它来推行各民族共同的文化”的善良愿望。这样看问题就是幼稚的主观主义。民族文化这个口号的含义，取决于这个国家同世界各国各阶级的客观相互关系。资产阶级的民族文化就是一个事实（而且我还要重说一遍，资产阶级到处都在同地主和神父勾结）。气焰嚣张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麻醉、愚弄和分化工人，使工人听任资产阶级摆布，——这就是当代的基本事实。

谁想为无产阶级服务，谁就应当联合各民族工人，不屈不挠地同“自己的”和别人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作斗争。谁拥护民族文化的口号，谁就只能与民族主义市侩为伍，而不能与马克思主义者为伍。

举个具体例子。大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者能采纳大俄罗斯的民族文化这个口号吗？不能。这样的人应当请他到民族主义者那儿去，而不应让他呆在马克思主义者当中。我们的任务是同占统治地位的、黑帮和资产阶级的大俄罗斯民族文化作斗争，完全用国际主义精神并通过同别国的工人结成最紧密的联盟，来培植那些在我国民主工人运动史上出现的幼苗。你的任务是同本国的大俄罗斯的地主和资产者作斗争，反对他们的“文化”，“适应”普利什凯维奇和司徒卢威之流的特点为国际主义而斗争，不是去鼓吹民族文化这一口号，不是让这个口号畅行无阻。

对于最受压迫最受欺凌的民族——犹太民族来说同样如此。犹太的民族文化，这是拉比和资产者的口号，是我们敌人的口号。但是犹太的文化中和犹太人的全部历史中还有别的成分。全世界 1050 万犹太人中，有一半多一点居住在落后的、半野蛮的加里西亚和俄国境内，这两个国家用暴力把犹太人置于帮会地位。另一半居住在文明世界，那里的犹太人没有帮会式的隔绝。那里犹太文化明显地表现出具有世界进步意义的伟大特征：它的国际主义，它对时代的先进运动的同情（犹太人参加民主运动和无产阶级运动的百分比，任何地方都高于犹太人在居民中所占的百分比）。

谁直接或间接地提出犹太“民族文化”的口号，谁（不管他的愿望多么好）就是无产阶级的敌人，谁就在维护犹太的旧的和帮会的一套，谁就是拉比和资产者的帮凶。相反，犹太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同俄罗斯、立陶宛、乌克兰以及其他民族的工人在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组织之中打成一片，并且为建立工人运动的各民族共同的文化作出自己的贡献（既用俄语又用依地语），也正是这些犹太人不顾崩得的分离主义，继承了犹太人的优良传统，同时反对“民族文化”这一口号。

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这是两个不可调和的敌对口号，这两个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两大阶级营垒相适应的口号，代表着民族问题上的两种政策（也是两种世界观）。崩得分子维护民族文化这一口号，并且根据这个口号制定出所谓“民族文化自治”的一揽子计划和实践纲领，因此，他们实际上充当了向工人传播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人。

3．民族主义的吓人字眼——“同化”

同化［注：字面的意思是同类化，一律化。］问题，即失去民族特点，变成另一个民族的问题，清楚地表明了崩得分子及其同道者的民族主义动摇思想所产生的后　果。

李普曼先生正确地转述和重复了崩得分子惯用的论据，更确切些说，转述和重复了崩得分子的手法，他把本国的各民族工人必须在统一的工人组织之中统一和打成一片的这个要求（见上面提到的《北方真理报》刊载的那篇文章的最后一段）叫作“同化的陈词滥调”。

关于《北方真理报》那篇文章的结尾，弗·李普曼先生说：“因此，要是有人问你属于哪个民族，工人就应该回答说：我是社会民主党人。”

我们的崩得分子认为这种说法俏皮极了。其实，这种立意反对彻底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口号的俏皮话和关于“同化”的叫嚣，正是他们的彻底自我揭露。

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在民族问题上有两种历史趋势。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这是其一。各民族彼此间各种交往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隔阂的消除，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这是其二。

这两种趋势都是资本主义的世界性规律。第一种趋势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是占主导地位的，第二种趋势标志着资本主义已经成熟，正在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化。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纲领考虑到这两种趋势，因而首先要维护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不允许在这方面存在任何特权（同时维护民族自决权，关于这一点下面还要专门谈），其次要维护国际主义原则，毫不妥协地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哪怕是最精致的）毒害无产阶级。

试问，我们的崩得分子向苍天高喊反对“同化”，他指的究竟是什么呢？这里他不会是指对民族采取暴力和某个民族应享有特权，因为“同化”二字在这里根本不适合；因为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论是个人还是正式的统一整体，都非常明确而毫不含糊地斥责过哪怕是最轻微的民族暴力、压迫和不平等现象；还因为那篇遭到崩得分子攻击的《北方真理报》的文章，也十分坚决地阐明了这个一般的马克思主义思想。

不。这里含糊其辞是不行的。李普曼先生在斥责“同化”时，他指的既不是暴力，也不是不平等，更不是特权。那么同化这一概念，除了一切暴力和一切不平等现象外，还有没有什么实际的东西呢？

当然有。还有消除民族隔阂、消灭民族差别、使各民族同化等等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资本主义趋势，这种趋势每过 10 年就显得更加强大，并且是使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化的最大推动力之一。

谁不承认和不维护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不同一切民族压迫或不平等现象作斗争，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也不是民主主义者。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大骂其他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同化”，这样的假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不过是民族主义的市侩而已，这也是毫无疑问的。所有的崩得分子以及（我们就要看到的）列·尤尔凯维奇和顿佐夫先生之流的乌克兰民族社会党人，都属于这类不值得尊敬的人物之列。

为了具体说清楚这些民族主义市侩的观点的十足反动性，我们引证三种材料。

反对俄国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的“同化”喊得最厉害的是俄国的犹太民族主义者，特别是其中的崩得分子。不过，从上面引证的材料可以看到，全世界 1050 万犹太人中，约一半人生活在文明世界里，处在“同化”最多的条件下；只有俄国和加里西亚的被蹂躏的、无权的、受普利什凯维奇之流（俄国和波兰的）压迫的不幸的犹太人，才生活在“同化”最少、隔绝得最厉害，甚至还有“犹太区”[5]、“百分比限额[6]”以及其他普利什凯维奇式的种种好处的条件下。

卡·考茨基和奥·鲍威尔说，文明世界的犹太人不是一个民族，他们被同化得最厉害。加里西亚和俄国的犹太人不是一个民族，很遗憾，他们（不是由于他们的过错，而是由于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过错）在这里还是帮会。这就是那些完全了解犹太人历史并且考虑到上述种种事实的人所作的无可争辩的论断。

这些事实究竟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只有犹太的反动市侩才会高喊反对“同化”，他们想使历史的车轮倒转，想让历史不要从俄国和加里西亚的制度走向巴黎和纽约的制度，而是想让历史开倒车。

在世界历史上享有盛名的犹太优秀人物，其中出现过全世界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先进领袖，他们从未高喊过反对同化。只有那些肃然起敬地注视犹太人“后背”[7]的人才高喊反对同化。

在现代先进的资本主义条件下，民族同化过程的规模一般究竟有多大，以北美合众国的移民材料为例就可以得出一个大致的概念。1891—1900 这 10 年，欧洲有 370 万人去那里，而 1901—1909 这 9 年，就有 720 万人。根据 1900 年的统计调查，合众国有 1000 多万外国人。而纽约州活象一个磨掉民族差别的磨坊，根据这份统计调查，这里有 78000 多奥地利人，136000 英国人，20000 法国人，480000 德国人，37000 匈牙利人，425000 爱尔兰人，182000 意大利人，70000 波兰人，166000 俄国移民（大部分是犹太人），43000 瑞典人等等。在纽约州以巨大的国际规模发生的过程，现在也在每个大城市和工厂区发生了。

谁没有陷进民族主义偏见，谁就不会不把资本主义的民族同化过程看作是极其伟大的历史进步，看作是对各个偏僻角落的民族保守状态的破坏，对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来说尤其如此。

就拿俄国和大俄罗斯人对乌克兰人的态度来说吧。自然，任何一个民主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就更不用说了，都会坚决反对骇人听闻的对乌克兰人的侮辱，都会要求保证他们享有完全平等的权利。但是，如果削弱目前存在的乌克兰无产阶级同大俄罗斯无产阶级在一国范围内的联系和联盟，那就是直接背叛社会主义，甚至从乌克兰人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任务”来看，这也是愚蠢的政策。

列夫·尤尔凯维奇先生，自称也是“马克思主义者”（不幸的马克思！），他就是推行这种愚蠢政策的榜样。尤尔凯维奇先生写道：1906 年索柯洛夫斯基（巴索克）和卢卡舍维奇（图恰普斯基）断言，乌克兰的无产阶级已经完全俄罗斯化了，因此它不需要另立组织。尤尔凯维奇先生根本不打算举出任何一件涉及问题实质的事实，而是抓住这一点对他们二人进行攻击，完全以最低级、愚蠢和反动的民族主义精神，歇斯底里地狂叫什么这是“民族的消极性”，是“对民族的背弃”，扬言这些人“分裂了〈!!〉乌克兰的马克思主义者”等等。尤尔凯维奇先生硬说，现在我们这里，尽管“工人的乌克兰民族意识增强了”，但是有“民族意识的”工

人还是少数，多数人“仍然处于俄罗斯文化的影响下”。这位民族主义的市侩大声疾呼，我们的任务“不是跟着群众走，而是率领群众前进，向他们说明民族的任务（民族事业）”（《钟声》杂志第 89 页）。

尤尔凯维奇先生的所有这些议论完全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议论。但是，甚至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他们中一些人想使乌克兰获得完全平等和自治，另一些人想建立一个独立的乌克兰国家）看来，这种议论也是不值一驳的。反对乌克兰人谋求解放的意愿的是大俄罗斯和波兰的地主阶级以及这两个民族的资产阶级。什么样的社会力量有能力抵抗这些阶级呢？20 世纪的头 10 年已经作出实际的回答，只有率领民主主义农民的工人阶级才是这种社会力量。如果真正的民主力量获得胜利，民族暴力就不可能存在，而尤尔凯维奇先生则竭力分裂这种真正的民主力量，从而削弱它，因此他不仅背叛了民主派的利益，而且背叛了本民族即乌克兰的利益。只有大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无产者统一行动，才可能有自由的乌克兰，没有这种统一行动，就根本谈不上这一点。

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受资产阶级民族观点的限制。在南部即乌克兰，已有好几十年十分清楚地显示出较快的经济发展过程，乌克兰把数以几万、几十万计的大俄罗斯农民和工人吸引到资本主义农场、矿山和城市中去了。在这些地方，大俄罗斯的无产阶级和乌克兰的无产阶级“同化”的事实是无可置疑的。而这一事实肯定是进步的。资本主义把大俄罗斯或乌克兰愚蠢、保守、死守在穷乡僻壤的不开化的庄稼汉变为流动的无产者，这些无产者的生活条件既打破了大俄罗斯特有的民族狭隘性，也打破了乌克兰特有的民族狭隘性。假定说，大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以后要划国界，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大俄罗斯工人和乌克兰工人“同化”的历史进步性也是不容置疑的，这和美国的民族界限的磨掉有其进步性一样。乌克兰和大俄罗斯愈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就会愈广泛愈迅速，那么资本主义将

会更加有力地把国内各地区的各民族工人和各邻国（如果俄罗斯成了乌克兰的邻国的话）的劳动群众吸引到城市、矿山和工厂里去。

列夫·尤尔凯维奇先生的所作所为，活象是一个十足的资产者，而且是一个狭隘愚蠢、鼠目寸光的资产者即市侩，他为了乌克兰的民族事业的一时成就而将两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彼此交往、联合、同化的利益置之脑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和跟着他们跑的尤尔凯维奇和顿佐夫先生之流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说，首先是民族的事业，然后才是无产阶级的事业。而我们说，首先是无产阶级的事业，因为它不仅能保证劳动的长远根本利益和人类的利益，而且能保证民主派的利益，而没有民主，无论是自治的乌克兰，还是独立的乌克兰，都是不可思议的。

最后，在尤尔凯维奇先生层出不穷的关于民族主义的奇谈怪论中，还应当指出下面一点。他说，乌克兰工人中有民族意识的是少数，“多数人仍然处于俄国文化的影响下”（бīльшīсть перебувае ще пīд впливом російськоï культури）。

在谈到无产阶级时，这种把整个乌克兰文化同整个大俄罗斯文化对立起来的做法，就是对无产阶级利益的最无耻的背叛，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效劳。

我们要告诉一切民族的社会党人：每一个现代民族中，都有两个民族。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一种是普利什凯维奇、古契柯夫和司徒卢威之流的大俄罗斯文化，但是还有一种是以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的名字为代表的大俄罗斯文化。乌克兰同德国、法国、英国和犹太人等等一样，也有这样两种文化。如果说多数乌克兰工人处于大俄罗斯文化的影响下，那么我们就确凿地知道了，除了大俄罗斯神父的和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外，还有大俄罗斯的民主派和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在产生影响。乌克兰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同前一种“文化”作斗争时，总是要把后一种文化区别开来，并且要告诉自己的工人们：“必须用全力抓住、利用、巩固一切机会，同大俄罗斯的觉悟工人相交往，阅读他们的书刊，

了解他们的思想，乌克兰的工人运动的根本利益和大俄罗斯的工人运动的根本利益都要求这样做。”

一个乌克兰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大俄罗斯压迫者的仇恨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但是如果忘乎所以，以致对大俄罗斯工人的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事业也仇恨起来，哪怕只有一点儿，哪怕仅仅采取疏远态度，那么这个马克思主义者也就会滚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泥潭。如果一个大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者哪怕只是一分钟忘记了乌克兰人对于完全平等的要求，或者忘记了他们享有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那么他同样也会滚入民族主义的泥潭，并且不仅会滚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泥潭，而且还会滚入黑帮民族主义的泥潭。

只要大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工人生活在一个国家里，他们就应该一同通过组织上最紧密的统一和打成一片，维护无产阶级运动共同的文化或各民族共同的文化，以绝对宽容的态度对待用何种语言进行宣传的问题和在这种宣传中如何照顾一些纯地方的或纯民族的特点问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绝对要求。任何鼓吹把一个民族的工人同另一个民族的工人分离开来的论调，任何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同化”的言论，任何在涉及无产阶级的问题时把某个民族文化当作整体同另一个据说是整体的民族文化相对立等等的行为，都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应该与之作无情的斗争。

4.“民族文化自治”

“民族文化”这个口号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意义重大，不仅是因为它决定了我们在民族问题上的整个宣传鼓动工作的思想内容不同于资产阶级的宣传，而且还因为臭名远扬的民族文化自治的一整套纲领是以这个口号为依据的。

这个纲领主要的、根本的缺陷，就在于它竭力要实现最精致、最绝对、最彻底的民族主义。这个纲领的实质是：每一个公民都登记加入某一个民族，每一个

民族就是一个法律上的整体，有权强迫自己的成员纳税，有本民族的议会（国会），有本民族的“国务大臣”（大臣）。

这种思想用到民族问题上，正如蒲鲁东思想用到资本主义上一样。不是消灭资本主义及其基础——商品生产，而是清除这个基础的各种弊端和赘瘤等等；不是消灭交换和交换价值，而相反，是“确立”交换价值，使之成为普遍的、绝对的、“公正的”、没有波动、没有危机、也没有弊端的东西。——这就是蒲鲁东思想。

蒲鲁东是小资产阶级，他的理论把交换和商品生产绝对化，把它当作宝贝，而“民族文化自治”的理论和纲领也是小资产阶级的，同样是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绝对化，把它当作宝贝，清除其中的暴力、不公正等等现象。

马克思主义同民族主义是不能调和的，即使它是最“公正的”、“纯洁的”、精致的和文明的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提出以国际主义代替一切民族主义，这就是各民族通过高度统一而达到融合，我们亲眼看到，在修筑每一俄里铁路，建立每一个国际托拉斯，建立每一个工人协会（首先是经济活动方面的，其次是思想方面、意向方面的国际性协会）的同时，这种融合正在加强。

民族原则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因此，马克思主义者重视这个社会，完全承认民族运动的历史合理性。然而，不要把这种承认变成替民族主义辩护，因此应该极严格地仅限于承认这些运动中的进步东西，因此不能因为这种承认而让资产阶级思想模糊了无产阶级意识。

群众从封建沉睡状态中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为争取人民主权、争取民族主权而斗争，这是进步。因此，在民族问题的各个方面维护最坚决最彻底的民主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义不容辞的责任。这项任务多半是消极的。可是无产阶级不能超出这项任务去支持民族主义，因为超出这项任务就属于力图巩固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的“积极”活动了。

冲破一切封建桎梏，打倒一切民族压迫，取消一个民族或一种语言的一切特权，这是无产阶级这个民主力量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是正在为民族纠纷所掩盖和妨碍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绝对利益。然而，超出这些受一定历史范围的严格限制的界限去协助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就是背叛无产阶级而站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这里有一条界线，这条界线往往是很细微的，而崩得分子和乌克兰民族社会党人却把它全忘光了。

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是绝对正确的。为一切民族发展，为笼统的“民族文化”而斗争是绝对不正确的。全世界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没有充分发展的民族运动的实例，提供了一些由若干小民族组成大民族或损害某些小民族而组成大民族的实例，也提供了一些民族同化的实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原则是笼统的民族发展，由此而产生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局限性，由此而产生了难解难分的民族纠纷。无产阶级不仅不维护每个民族的民族发展，相反，还提醒群众不要抱这种幻想，无产阶级维护资本主义周转的最充分的自由，欢迎民族的一切同化，只要同化不是强制性的或者依靠特权进行的。

在某种“公正”划定的范围内巩固民族主义，“确立”民族主义，借助于专门的国家机关牢固而长期地隔离一切民族，——这就是民族文化自治的思想基础和内容。这种思想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的，是彻头彻尾虚伪的。无产阶级不能支持任何巩固民族主义的做法，相反，它支持一切有助于消灭民族差别、消除民族隔阂的措施，支持一切促进各民族间日益紧密的联系和促进各民族打成一片的措施。不这样做就站到反动的民族主义市侩一边去了。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在他们的布隆代表大会[8]上（1899 年）讨论民族文化自治草案时，几乎没有注意对这个草案从理论上加以评价。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当时提出了以下两个反对这一纲领的论据：（1）它会加强教权主义；（2）“它导致的后果就是使沙文主义永世长存，把沙文主义搬进每一个小团体，每一个小组”

（见布隆代表大会正式德文记录第 92 页。这个记录有犹太民族主义政党“犹 太社会主义工人党”[9]出版的俄文译本）。

毫无疑问，目前世界各国，一般含义的“民族文化”即学校等等，都处于教权派和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者的绝对影响下。崩得分子为“民族文化”自治进行辩护，说民族的确立会使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成为不带任何不相干的意图的纯粹斗争，这是很明显很可笑的诡辩。在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中，重大的阶级斗争都首先是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内进行的。把教育部门从这个领域分出来，首先，这是一种荒谬的空想，因为要学校（以及笼统的“民族文化”）脱离经济和政治是不行的；其次，正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生活每走一步都迫使消除荒谬陈腐的民族隔阂和偏见，而把学校教育这一类事业分出来恰恰会保持、加剧、加强“纯粹的”教权主义和“纯粹的”资产阶级沙文主义。

在股份公司里，不同民族的资本家坐在一起，不分彼此。在工厂里，不同民族的工人在一起工作。当发生任何真正严肃而深刻的政治问题时，人们是按阶级而不是按民族来进行组合的。使教育这一类事业“不受国家管理”交给各个民族管理，恰恰是企图把社会生活的可以说是最高的意识形态领域同使各民族打成一片的经济分开，在意识形态这一领域中，对“纯粹”民族文化的存在或教权主义和沙文主义在民族中的培植都是极为有利的。

“超地域的”（非地域的，同某一民族所居住的地域无关的）或“民族文化的”自治计划付诸实施，只能意味着以民族划线分割教育事业，即分民族办教育事业。只要清楚地想想著名的崩得计划的这种真正本质，就足以了解这个计划的十足反动性了，即使从民主派的观点来看这个计划也是极其反动的，更不用说从无产阶级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了。

只要举出学校教育“民族化”的一个例子和一个草案，就可以清楚地说明问题的实质。北美合众国在全部生活中直到现在仍然划分为北方诸州和南方诸州；

前者自由传统和反对奴隶主斗争的传统最多，后者奴隶占有制的传统最多，经济上压制黑人、文化上歧视黑人（黑人中 44％是文盲，白人中 6％是文盲），等等对黑人迫害的残余现象仍然存在。因此，在北方诸州，黑人和白人是合校上课的。在南方则有专门的——“民族的”或种族的，怎么称呼都行——黑人学校。看来，这倒是学校“民族化”的唯一实例。

东欧有一个国家直到现在还有可能发生类似贝利斯案件[10]的事情，那里的犹太人被普利什凯维奇先生们贬到比黑人还不如的地位。这个国家的内阁不久前拟了一个犹太学校民族化的草案。值得庆幸的是，这个反动的空想未必能够实现，奥地利的小资产者的空想也是如此，这些人对实现彻底的民主主义、对终止民族纠纷已经绝望了，于是就在学校教育方面给各民族重重设防，使各民族不会因为分校而发生纠纷……然而各民族之间却“确定地”要发生一种“民族文化”反对另一种“民族文化”的永无休止的纠纷。

奥地利的民族文化自治在很大程度上是著作家杜撰出来的，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人自己都没有把它当真。但是俄国所有的犹太资产阶级政党和各民族的一些市侩机会主义分子，例如崩得分子、高加索的取消派以及俄国各民族左派民粹派政党代表会议[11]，却都把它纳入了纲领。（顺便说一下，这个代表会议在 1907 年召开，代表会议的决议是在俄国社会革命党和波兰社会爱国派、波兰社会党[12]弃权的情况下通过的。弃权——这是社会革命党人和波兰社会党人在涉及民族纲领方面的最重要的原则问题上所采用的一种极其典型的方法！）

在奥地利，正是“民族文化自治”的最主要的理论家奥托·鲍威尔在自己的书中，用专门一章来论证对犹太人不能提出这个纲领。而在俄国，正是所有的犹太资产阶级政党及其应声虫崩得采纳了这个纲领［注：崩得分子常常激动万分地否认所有的犹太资产阶级政党都采纳了“民族文化自治”的事实，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一事实彻底揭露了崩得所起的真正作用。崩得分子之一马宁先生在《光线报》

上试图重申其否认，恩·斯科宾则对他进行了彻底的揭露（见《启蒙》杂志第 3 期）。但是列夫·尤尔凯维奇先生在《钟声》杂志上（1913 年第 7—8 期合刊第 92 页）引用《启蒙》杂志（第 3 期第 78 页）上恩·斯科宾关于“崩得分子同所有的犹太资产阶级政党和集团一起，早就维护民族文化自治”这段话时，竟加以歪曲，删去了这句话中的“崩得分子”几个字，并以“民族权利”一语偷换了“民族文化自治”一语，对此，我们只能感到惊奇！！列夫·尤尔凯维奇先生不仅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不仅是一个对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和它的纲领极其无知的人，而且是一个为了维护崩得利益而干脆捏造引文的人。崩得和尤尔凯维奇先生们的情况不妙啊！]。这说明什么呢？这就是说，历史用另一个国家的政治实践揭露了鲍威尔的荒谬杜撰，同样，俄罗斯的伯恩施坦分子（司徒卢威、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别尔嘉耶夫之流）也用自己从马克思主义向自由主义的迅速演变的事实揭露了德国伯恩施坦派的实际思想内容。

无论是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人，还是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没有把“民族文化”自治纳入自己的纲领。然而，一个最落后的国家里的犹太资产阶级政党和许多冒牌的社会主义市侩集团却采纳了它，以便用精致的形式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灌输到工人中去。这个事实本身很清楚地说明了问题。

既然我们已经谈到了奥地利关于民族问题的纲领，那就不能不恢复常常被崩得分子所歪曲的真相。在布隆代表大会上曾经提出一个纯粹的“民族文化自治”纲领。这是南方斯拉夫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这个纲领的第 2 条说：“居住在奥地利的每一个民族，不论其成员所居住的地域，组成一个自治团体，完全独立地管理本民族的（语言的和文化的）一切事务。”维护这个纲领的不仅有克里斯坦，而且还有颇具威信的埃伦博根。但是这个纲领被否决了，没有一票赞成。大会所通过的纲领是拥护地域原则的，即主张不建立任何“与民族成员的居住地域无关”的民族集团。

已通过的纲领的第 3 条写道："同一个民族所居住的各自治区域共同组成统一的民族联盟，完全按自治原则来处理本民族的事务。"（参看 1913 年《启蒙》杂志第 4 期第 28 页[13]）显然，这个折中的纲领也是不正确的。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萨拉托夫省的德意志移民村社、里加或罗兹城郊的德意志工人区和彼得堡附近的德意志人的居住区等等合起来组成俄国境内的德意志人"统一民族联盟"。显然，社会民主党人不能要求干这种事，不能巩固这种联盟，虽然他们当然丝毫不否认在这个国家成立任何联盟的自由，包括成立任何民族的任何村社联盟的自由。但是，按国家法律把俄国各地的和各阶级中的德意志人等单独组成统一的德意志民族联盟，这种事只有神父、资产者、市侩等等人才会干，社会民主党人是决不干的。

5．民族平等和少数民族的权利

俄国的机会主义者在讨论民族问题时最惯用的手法，就是以奥地利作例子。我在《北方真理报》[注：见本卷第 121—124 页。——编者注]（《启蒙》杂志第 10 期第 96—98 页）上发表的那篇遭到机会主义分子攻击（谢姆柯夫斯基先生在《新工人报》上，李普曼先生在《时报》上）的文章中肯定地说：既然在资本主义世界民族问题一般地说有解决的可能，那就只有一种解决办法，这就是实行彻底的民主主义。为了证明这一点，我顺便举了瑞士的例子。

上面提到的那两个机会主义分子都不喜欢这个例子，都企图驳倒这个例子或缩小其意义。据说，考茨基曾经说瑞士是个例外，说瑞士有完全独特的分权制，有独特的历史，有独特的地理条件，说那里操外国语的居民居住分散，情况非常特殊等等，等等。

所有这些说法都不过是企图回避论争的实质罢了。当然，瑞士不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它是个例外。但是奥地利和俄国也属于这样的

例外（或落后，——考茨基补充说）。当然，在瑞士，正是独特的、不寻常的、历史形成的条件和生活条件，才保证了它比那些同它接壤的多数欧洲邻国有更多的民主。

可是，既然我们所谈的是一个应该借鉴的榜样，那为什么要说这番话呢？在现代条件下，那些已经根据彻底的民主原则建立了某种机构的国家，在全世界来说都是例外。我们在自己的纲领中，难道因此就不该坚持一切机构都应实行彻底的民主主义吗？

瑞士的特点在于它的历史、它的地理条件和其他条件。俄国的特点在于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从未有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和国家的各方面都非常落后，这种落后客观上要求必须冒着种种失利和失败的危险，特别迅速、特别坚决地向前迈进。

我们是以无产阶级的观点为依据来制定民族纲领的；从什么时候起选个榜样必须选坏的而不该选好的？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有在彻底实行民主主义的国家里才能实现民族和平（既然一般地说是有可能实现的），这在任何情况下难道不都是不可争辩、不可反驳的事实吗？

既然这是无可争辩的，那么机会主义分子坚持要以奥地利而不以瑞士为例，就是地道的立宪民主党人的手法，因为立宪民主党人总是抄袭欧洲的坏宪制，而不是抄袭好宪制。

瑞士通行三种国语，然而法律草案在付诸全民投票时，是用五种文字刊印的，也就是除了用三种国语外，还用了两种“罗马语族的”方言。根据 1900 年的调查，在瑞士的 3315443 个居民中有 38651 人操这两种方言，即占 1％强。军队中军官和士官“享有用母语同士兵讲话的最大自由”。在格劳宾登和瓦利斯两个州（各有居民 10 万多一点），这两种方言是完全平等的。［注：见勒内·昂利《瑞士与语言问题》1907 年伯尔尼版。］

试问，我们是应该宣传并且维护一个先进国家的这种生动的经验呢，还是应该从奥地利人那里抄袭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试验过的（奥地利人自己也还没有采纳的）象“超地域自治”一类的杜撰出来的东西呢？

鼓吹这种杜撰出来的东西就是鼓吹按民族分校，就是鼓吹非常有害的观点。而瑞士的经验表明，在整个国家实行彻底（仍然是相对而言）民主主义的条件下保证高度的（相对而言）民族和平，在实践上是可能的并且已经实现了。

对这个问题有研究的人们说：“瑞士不存在东欧那样的民族问题。这个词汇（民族问题）在这里甚至都无人知晓……瑞士的民族斗争早在1797—1803年间就终止了。”［注：见爱·布洛赫尔《瑞士的民族》1910年柏林版。］

这就是说，法国大革命时代不仅用最民主的方式解决了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的一些首要问题，同时还顺便地“解决了”民族问题。

俄国境内有的县份甚至一个县的一部分的20万居民中就有4万人操两种方言并且希望在本地区享有使用语言方面的完全平等，现在就让谢姆柯夫斯基和李普曼之流先生们以及其他机会主义分子去试试作出论断，说这个“唯独瑞士的”解决办法不适合于这些地方吧！

宣传民族和语言的完全平等，就可以把每个民族的彻底的民主分子（即只是无产者）单独分出来，可以不按民族，而是根据他们对一般国家制度进行深入和重大改善的愿望把他们联合起来。反之，宣传“民族文化自治”（尽管个别人和个别集团出于好意），就是离间民族，并且实际上是促使一个民族的工人同该民族的资产阶级接近（所有的犹太资产阶级政党都采纳了这个“民族文化自治”）。

保障少数民族权利同完全平等的原则是分不开的。我在《北方真理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对这个原则的表述几乎同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召开的会议作出的更确切的正式决定的表述完全一样。这个决定要求“宪法中还要加一条基本法律条款，宣布任何一个民族不得享有特权、不得侵犯少数民族的权利”。

李普曼先生试图嘲笑这个提法，他问道："怎样才能知道什么是少数民族的权利呢？"民族学校使用"自己的教学大纲"的权利，是否属于这些权利之列呢？少数民族要有多大才有权设自己的法官，自己的官员，开办使用母语的学校呢？李普曼先生想从这些问题中作出必须要有"积极的"民族纲领的结论。

其实，这些问题清楚地表明，我们这个崩得分子用所谓细节问题的争论作掩护，正在偷运着多么反动的货色。

在自己的民族学校里有"自己的教学大纲"！……可亲的民族社会党人，马克思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的学校教学大纲，比方说，大纲要求实施绝对的世俗教育。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不允许背离这个共同的大纲（至于用某些"地方性的"课程、语言等等作补充的问题，可由当地居民决定）。可是，根据使教育事业"不受国家管理"而交给各民族管理的原则，我们工人就得允许各"民族"在我们的民主国家中把人民的钱财花在办教权派的学校上！李普曼先生自己不知不觉清楚地说明了"民族文化自治"的反动性！

"少数民族要有多大？"这一点连崩得分子心爱的奥地利纲领也没有确定，这个纲领说（比我们的更简短更不清楚）："对于少数民族的权利，帝国议会将颁布一项特别法律加以保障。"（布隆纲领第 4 条）

这究竟是什么样的法律？为什么谁也没有提出这个问题来质问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呢？这个法律究竟应该保证什么样的少数民族有什么样的权利呢？

因为一切明白事理的人都懂得，纲领中规定细节问题是不适当的，也是不可能的。纲领只能确定一些基本原则。这里所说的基本原则在奥地利人那里是不言而喻的，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最近举行的一次会议所通过的决定也直接表述了这条原则。这条原则就是不容许存在任何民族特权和任何民族不平等。

为了给崩得分子解释清楚问题，我们举一个具体例子。根据 1911 年 1 月 18 日的学校普查材料，圣彼得堡市国民"教育"部所属的初等学校有学生 48076 人。

其中犹太学生 396 人，也就是说，不到 1%。其次，罗马尼亚学生 2 人、格鲁吉亚学生 1 人、亚美尼亚学生 3 人等等[14]。能不能制定一个包罗这些各种各样的关系和条件的“积极的”民族纲领呢？（自然，在俄国，彼得堡还远不是民族成分最“复杂的”城市。）看来，连崩得分子这样的研究民族“微妙问题”的专家也制定不出这样的纲领。

然而，如果在国家宪法中有一项规定不得侵犯少数民族权利的基本法律条款，那么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要求废除这样的命令，例如，规定不得用公费雇专门教员讲授犹太语、犹太史等等的命令，或者规定不向犹太、亚美尼亚、罗马尼亚孩子乃至一个格鲁吉亚孩子提供公家场所听课的命令。在平等的基础上满足少数民族的一切合理公正的愿望决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而且谁也不会说，宣传平等是有害的。相反，宣传按民族分校，例如，宣传在彼得堡专门为犹太孩子办犹太学校，那就是绝对有害的，而且为所有的少数民族，为一两个或两三个孩子办民族学校简直是不可能的。

其次，在任何一项全国性的法律中，都不可能规定究竟什么样的少数民族才有权开办专门学校或聘请讲授补充课程的专门教员等等。

相反，关于民族平等的全国性的法律，完全可以在各地区议会、各城市、各地方自治机关、各村社等等的专门法令和决定中，详细地加以规定并加以发展。

6．中央集权制和自治

李普曼先生在自己的反驳意见中写道：

“以我国的立陶宛、波罗的海边疆区、波兰、沃伦、俄国南部等地为例，——你们到处都可以发现杂居的居民；没有一个城市没有一个大的少数民族。不管分权制实行得怎样广泛，到处（主要在城市公社中）都可以发现各种不同的民族居住在一起，正是民主主义把少数民族完全交给多数民族支配。然而，大家知道，

弗·伊·是反对瑞士联邦实行的那种国家联邦制和无限分权制的。试问，他为什么要举瑞士作例子呢？”

我为什么举瑞士作例子，上面已经说明了。同时也说明了，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问题，只有在不背离平等原则的彻底的民主国家中，通过颁布全国性的法律才有可能得到解决。可是在上面的一段引文中，李普曼先生还重复了一条最流行的（也是最不正确的）反对意见（或者怀疑意见），这种意见通常是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纲领的，因此值得加以分析。

当然，马克思主义者是反对联邦制和分权制的，原因很简单，资本主义为了自身的发展要求有尽可能大尽可能集中的国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觉悟的无产阶级将始终坚持建立更大的国家。它将始终反对中世纪的部落制度，始终欢迎各个大地域在经济上尽可能达到紧密的团结，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地域上，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才能广泛地开展起来。

资本主义生产力广泛而迅速的发展，要求有广阔的、联合和统一成为国家的地域，只有在这样的地域里，资产者阶级，还有和它必然同时存在的死对头无产者阶级，才能各自团结起来，消灭一切古老的、中世纪的、等级的、狭隘地方性的、小民族的、宗教信仰的以及其他的隔阂。

关于民族自决权，即关于民族享有分离和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权利，我们还要专门来谈。［注：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25 卷第 223—285 页。——编者注］但是，在各种不同的民族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的情况下，并且正是由于这种情况，马克思主义者是决不会主张实行任何联邦制原则，也不会主张实行任何分权制的。中央集权制的大国是从中世纪的分散状态向将来全世界社会主义的统一迈出的巨大的历史性的一步，除了通过这样的国家（同资本主义紧密相联的）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然而，决不能忘记，我们维护集中制只是维护民主集中制。在这方面，所有的市侩和民族主义市侩（包括已故的德拉哥马诺夫），把问题搅乱了，这就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花时间来进行澄清。

民主集中制不仅不排斥地方自治以及有独特的经济和生活条件、民族成分等等的区域自治，相反，它必须既要求地方自治，也要求区域自治。我们这里人们总是把集中制同专横和官僚主义混为一谈。俄国的历史自然会引起这种混淆，然而这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仍然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举个具体例子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罗莎·卢森堡在她的长篇文章《民族问题和自治》[注：《社会民主党评论》杂志[15]1908 年和 1909 年克拉科夫版。] 中犯有许多可笑的错误（下面将要谈到），其中一个错误特别可笑，这就是她试图说明自治的要求只适用于波兰。

然而，请先看看她是怎样给自治下定义的。

罗莎·卢森堡承认（她既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当然必须承认），一切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最重要的和重大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决不应该由各区域的自治议会掌管，而只能由全国性的中央议会掌管。属于这类问题的有：关税政策、工商法、交通和联络工具（铁路、邮局、电报、电话等）、军队、税制、民法 [注：罗莎·卢森堡在发挥自己的思想时谈得很细，例如，她还谈到（而且谈得很对）离婚法（上述杂志第 12 期第 162 页）。] 和刑法、教育的一般原则（例如，关于绝对的世俗教育、关于普及教育、关于最低教学大纲、关于学校的民主制度等等的法律）、劳动保护法、政治自由法（结社权）等等，等等。

根据全国性的立法，由自治议会掌管的是纯粹地方性的、区域性的或纯粹民族方面的问题。罗莎·卢森堡在发挥这个思想时也谈得十分详细（甚至过于详细），她指出了例如建设地方铁路（第 12 期第 149 页）、地方公路（第 14—15 期合刊第 376 页）等等。

非常明显，如果不保证每一个在经济和生活上有较大特点并且民族成分不同等等的区域享有这样的自治，那么现代真正的民主国家就不可能设想了。资本主义发展所必需的集中制原则，不仅不会因为实行这样的（地方的和区域的）自治而遭到破坏，反而会因此能够民主地而不是官僚主义地得到贯彻。没有这种既促进资本集中、生产力发展，又促进资产阶级及无产阶级在全国范围内的团结的自治，那么，资本主义广泛、自由和迅速的发展就是不可能的，或者至少会有极大的阻力。这是因为，对纯粹地方性的（区域的、民族的等等）问题实行官僚主义的干预，是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特别是在大的、重要的、根本性的问题上实行集中制的障碍之一。

因此，当读到我们杰出的罗莎·卢森堡非常严肃地用“纯粹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竭力证明自治要求只适用于波兰，而且只是作为一种例外的时候，是很难叫人不发笑的！自然，这里并没有一点对“自己教区”的爱国主义，这里只有“实际的”考虑……例如对立陶宛的考虑。

罗莎·卢森堡以维尔纳、科夫诺、格罗德诺和苏瓦乌基四省为例，力求使读者（也使她自己）相信，这些省份居住的“主要”是立陶宛人，她还把这些省份的居民加在一起，结果是立陶宛人占全体居民的 23％，如果再把日穆奇人[16]同立陶宛人加在一起，则占居民的 31％，就是说不到 1/3。结论自然就是关于立陶宛自治的想法是“无根据和人为的”（第 10 期第 807 页）。

凡是了解我们俄国官方统计方面存在的人所共知的缺点的读者，立刻就会发现罗莎·卢森堡的错误。为什么要以立陶宛人只占百分之零点二（0．2％）的格罗德诺省为例呢？为什么要以整个维尔纳省而不是只以该省的立陶宛人在居民中占多数的特罗基一县为例呢？为什么要以整个苏瓦乌基省为例，确定立陶宛人占该省居民的 52％，而不以该省一些立陶宛人居住的县份，即以 7 个县中立陶宛人占居民 72％的 5 个县为例呢？

在说明现代资本主义的条件和要求时，不用“现代的”，不用“资本主义的”行政区划，而用俄国中世纪的、农奴制的、官方官僚制的行政区划，而且用的是最粗线条的行政区划形式（用省而不是用县），这是很可笑的。非常明显，不废除这些区划，不代之以真正“现代的”区划、真正符合资本主义的而不是官家的、不是官僚制度的、不是守旧势力的、不是地主的、不是神父的要求的区划，那么就谈不上在俄国进行什么比较认真的地方改革，同时，现代资本主义的要求，无疑会包括居民的民族成分要尽可能统一的这项要求，因为民族性、语言统一对于完全控制国内市场和经济流转的完全自由是一个重要因素。

崩得分子麦迭姆重犯罗莎·卢森堡的这个明显的错误，他想证明的不是波兰的那些“例外”特征，而是民族地域自治原则行不通（崩得分子是拥护民族超地域自治的！），这实在令人惊奇。我们的崩得分子和取消派分子搜集了全世界各国、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一切错误和一切机会主义的动摇思想，并且囊括的一定是全世界社会民主党中最坏的东西：从崩得分子和取消派分子的著述中摘录的只言片语凑在一起就能组成一个标准的社会民主主义垃圾博物馆。

麦迭姆用教训的口吻说：区域自治对于区域和“边疆区”是适合的，而对于拥有 50 万到 200 万居民、面积相当于一个省的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这样的州就不适合了。“这就不是区域自治，而是普通的地方自治……在这种地方自治之上必须建立真正的区域自治……”同时这位作者还斥责了对旧的省和县的“破坏”。

[注：弗·麦迭姆《关于俄国民族问题的提法》，1912 年《欧洲通报》杂志[17]第 8 期和第 9 期。]

事实上，保留中世纪的、农奴制的、官方行政的区划就是“破坏”和损害现代资本主义条件。只有满脑子是这种区划精神的人，才会“故作博学的专家的姿态”，动脑筋把“地方自治”同“区域自治”对立起来，考虑什么按照死板公式大区域应推行“区域自治”，小区域应推行地方自治。现代资本主义完全不需要这些官僚死板公式。为什么不仅不可能成立拥有 50 万居民的民族自治州，甚至拥有

5 万居民的民族自治州也不可能，为什么这一类的州在合适的情况下，在经济流转需要的情况下，不能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同毗邻的大大小小的州联合成统一的自治“边疆区”，——这一切始终是崩得分子麦迭姆的一个秘密。

我们要指出，社会民主党布隆民族纲领完全立足于民族地域自治，它提出“废除历代的皇朝封地”，而把奥地利划成若干“以民族为界”的州（布隆纲领第 2 条）。我们是不想走这么远的。毫无疑义，统一的居民民族成分，是实现自由的、广泛的、真正现代化的商业周转的最可靠的因素之一。毫无疑义，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任何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都不会去保护奥地利的皇朝封地和俄罗斯的省和县（后者不象奥地利皇朝封地那样糟糕，但毕竟还是很糟糕的），都不会否认必须尽可能地用按居民的民族成分划分区域的办法来代替这些旧的划分办法。最后，毫无疑义，建立拥有清一色的、统一的民族成分的自治州，哪怕是最小的自治州，对于消灭一切民族压迫都是极其重要的，而且散居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这个民族的成员都会“倾向”这些州，同它们交往，同它们组成各种自由联盟。所有这一切都是无可争辩的，只有从顽固的官僚主义观点出发，才会对这一切提出异议。

居民的民族成分是极重要的经济因素之一，但它不是唯一的，在其他诸因素中也不是最重要的。例如，城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起着极其重要的经济作用，但是任何地方的城市，波兰的也好，立陶宛的也好，乌克兰的也好，大俄罗斯等地的也好，居民的民族成分都是十分复杂的。由于考虑“民族”因素而把城市同那些经济上倾向城市的乡村和州分割开来，这是荒谬的，也是不可思议的。因此，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当完全绝对地以“民族地域”原则为立足点。

因此，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最近一次会议上所规定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奥地利的办法要正确得多。这个会议在民族问题上提出了如下的原则：

“……必须实行广泛的区域自治”（当然，不是指波兰一地，而是指俄国各个区域）“和完全民主的地方自治，并且根据当地居民自己对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居民民族成分等等的估计，确定地方自治地区和区域自治地区的区划”［注：见本卷第61页。——编者注］（不是按照现在的省界、县界等）。

这里是把居民的民族成分和其他条件（首先是经济条件，其次是生活条件等等）相提并论的，这些条件应该作为确定与现代资本主义相适应而不是与官场习气和亚洲式的野蛮状态相适应的新区划的根据。只有当地居民才能够完全准确地“估计”所有这些条件，而国家的中央议会将根据这种估计来确定自治区域的区划和自治议会的管辖范围。

※　※　※

我们还要研究一下民族自决权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各民族的一大帮机会主义分子——既有取消派分子谢姆柯夫斯基，也有崩得分子李普曼，还有乌克兰民族社会党人尤尔凯维奇——都在“推广”罗莎·卢森堡的错误。下一篇文章，我们将专门探讨这个被这“一大帮”搅得特别混乱的问题[18]。

注释：

[1]《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写于1913年10—12月，并于同年11月7日（20日）、12月7日（20日）、12月23日（1914年1月5日）发表在布尔什维克的合法刊物《启蒙》杂志第10、11、12期上。

在写这篇文章之前，列宁曾于1913年夏在瑞士的苏黎世、日内瓦、洛桑和伯尔尼等城市作过关于民族问题的专题报告，并于1913年秋在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波罗宁会议上作了关于民族问题的长篇报告。——[120]。

[2]《时报》（《Di Zait》）是崩得的机关报（周报），1912年12月20日（1913年1月2日）—1914年5月5日（18日）用依地文在彼得堡出版。——[120]。

[3]《钟声》杂志（《Дзвін》）是合法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刊物（月刊），倾向孟什维克，1913 年 1 月—1914 年在基辅用乌克兰文出版，共出了 18 期。参加该杂志工作的有 B．П．列文斯基、弗·基·温尼琴柯、列·尤尔凯维奇（雷巴尔卡）、德·顿佐夫、西·瓦·佩特留拉、格·阿·阿列克辛斯基、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列·达·托洛茨基等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停刊。——[120]。

[4]《俄罗斯言论报》（《Русское Слово》）是俄国报纸（日报），1895 年起在莫斯科出版（第 1 号为试刊号，于 1894 年出版）。出版人是伊·德·瑟京，撰稿人有弗·米·多罗舍维奇（1902 年起实际上为该报编辑）、亚·瓦·阿姆菲捷阿特罗夫、彼·德·博博雷金、弗·阿·吉利亚罗夫斯基、瓦·伊·涅米罗维奇－丹琴科等。该报表面上是无党派报纸，实际上持资产阶级自由派立场。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并曾拥护科尔尼洛夫叛乱，是一家公开的反革命报纸。1917 年十月革命后不久被查封，其印刷厂被没收。1918 年 1 月起，该报曾一度以《新言论报》和《我们的言论报》的名称出版。1918 年 7 月最终被查封。——[121]。

[5]“犹太区”是沙皇俄国当局在 18 世纪末规定的可以允许犹太人定居的区域，包括俄罗斯帝国西部 15 个省，以及高加索和中亚细亚的一些地区，1917 年二月革命后被废除。——[131]。

[6]“百分比限额”是指沙皇政府从 1887 年起实行的限制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录取犹太人学生的办法。根据规定，在所谓“犹太区”内，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录取的犹太人学生不得超过学生总数的 10％，在“犹太区”外限定在 5％以内，在莫斯科和彼得堡限定在 3％以内。——[131]。

[7]“后背”一词出自圣经中摩西见耶和华只能看到后背的传说（见《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 33 章）。——[131]。

[8]指 1899 年 9 月 24—29 日在布隆（现捷克斯洛伐克布尔诺）举行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是民族问题。在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反

映不同观点的两个决议案：一个是总的说来主张民族区域自治的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案；另一个是主张超地域的民族文化自治的南方斯拉夫社会民主党委员会的决议案。代表大会一致否决了民族文化自治纲领，通过了一个承认在奥地利国家范围内的民族自治的妥协决议（参看本卷第 339—341 页《关于奥地利和俄国民族纲领的历史》一文）。——[138]。

[9]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是俄国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成立于 1906 年。该党的纲领基础是要求犹太人民族自治，即建立有全权决定俄国犹太人政治制度问题的超地域的犹太议会（因此该党亦称议会派）。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思想上同社会革命党人接近，并同他们一起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38]。

[10]贝利斯案件是沙皇政府和黑帮分子迫害俄国一个砖厂的营业员犹太人门·捷·贝利斯的冤案。贝利斯被控出于宗教仪式的目的杀害了信基督教的俄国男孩Ａ．尤辛斯基，而真正的杀人犯却在司法大臣伊·格·舍格洛维托夫的庇护下逍遥法外。贝利斯案件的侦查工作从 1911 年持续到 1913 年。黑帮分子企图利用贝利斯案件进攻民主力量，并策动政变。俄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以及一些外国社会活动家则仗义执言，为贝利斯辩护。1913 年 9—10 月在基辅对贝利斯案件进行审判。俄国许多城市举行了抗议罢工。布尔什维克还作好准备，一旦贝利斯被判刑，就在彼得堡举行总罢工。贝利斯终于被宣告无罪。——[140]。

[11]指 1907 年 4 月 16—20 日在芬兰举行的俄国各民族社会主义政党代表会议。出席代表会议的有社会革命党和各民族内与社会革命党相近的政党的代表。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每年召开一次各民族社会主义政党代表大会、关于组织专门的秘书处来执行会议的决议、关于各民族社会主义政党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创办秘书处的定期机关刊物等决议。《1907 年 4 月 16—20 日俄国各民族社会主义政党代表会议记录》于 1908 年由圣彼得堡议会出版社出版。——[140]。

[12]这里说的波兰社会党是指波兰社会党—“革命派”（见本卷第 341 页）。

波兰社会党是以波兰社会党人巴黎代表大会（1892 年 11 月）确定的纲领方针为基础于 1893 年成立的。这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独立民主共和国、为争取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而斗争的口号，但是没有把这一斗争同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革命力量的斗争结合起来。该党右翼领导人约·皮尔苏茨基等认为恢复波兰国家的唯一道路是民族起义而不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全俄反对沙皇的革命。从 1905 年 2 月起，以马·亨·瓦列茨基、费·雅·柯恩等为首的左派逐步在该党内占了优势。他们反对皮尔苏茨基分子的民族主义及其恐怖主义和密谋策略，认为只有在全俄革命运动胜利基础上才能解决波兰劳动人民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问题。1906 年 11 月在维也纳召开的波兰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把皮尔苏茨基及其拥护者开除出党，该党遂分裂为两个党：波兰社会党—“左派”和所谓的波兰社会党—“革命派”（弗腊克派）。

波兰社会党—“左派”主张同全俄工人运动密切合作，可是它力图把波兰和俄国工人运动中除民族主义派别外的所有派别机械地联合起来。在 1908—1910 年期间，它主要通过工会、文教团体等合法组织进行活动。它不接受孟什维克的在反对专制制度斗争中领导权属于资产阶级的论点，可是与孟什维克合作，支持他们反对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该党持国际主义立场，参加了 1915 年的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和 1916 年的昆塔尔会议。该党欢迎俄国十月革命。1918 年 12 月，该党同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一起建立了波兰共产党。

波兰社会党—“革命派”于 1909 年重新使用波兰社会党的名称，强调通过武装斗争争取波兰独立，但把这一斗争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割裂开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起，该党的骨干分子参加了皮尔苏茨基站在奥德帝国主义一边搞的军事政治活动（成立波兰军团）。在战争期间，以皮尔苏茨基为首的一批领导骨干脱离该党。1917 年俄国二月革命后，该党转而对德奥占领者采取反对立场，开

展争取建立独立的民主共和国和进行社会改革的斗争。1918 年波兰社会党参加创建独立的资产阶级波兰国家，1919 年同原普鲁士占领区的波兰社会党和原奥地利占领区的加里西亚和西里西亚波兰社会民主党合并。该党不反对地主资产阶级波兰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并于 1920 年 7 月参加了所谓国防联合政府。1926 年该党支持皮尔苏茨基发动的政变，同年 11 月由于拒绝同推行“健全化”的当局合作而成为反对党。——[140]。

[13]这里指的是发表在《启蒙》杂志上的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该文第 4 章引用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布隆代表大会通过的民族纲领的条文（见《斯大林全集》第 2 卷第 316—317 页）。参看注 135。——[142]。

[14]列宁引用的这个材料摘自统计汇编《1911 年 1 月 18 日进行的帝国初等学校一日普查。第 1 编，第 2 册，圣彼得堡学区。阿尔汉格尔斯克省、沃洛格达省、诺夫哥罗德省、奥洛涅茨省、普斯科夫省和圣彼得堡省》1913 年圣彼得堡版第 72 页。——[146]。

[15]《社会民主党评论》杂志（《Przeglad Socjaldemokratyczny》）是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在罗·卢森堡积极参加下办的刊物，于 1902—1904 年、1908—1910 年在克拉科夫出版。——[149]。

[16]日穆奇人是俄罗斯人和波兰人对居住在立陶宛西部的古立陶宛部落热迈特人的称呼。——[150]。

[17]《欧洲通报》杂志（《Вестник Европы》）是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历史、政治和文学刊物，1886 年 3 月—1918 年 3 月在彼得堡出版，1866—1867 年为季刊，后改为月刊。先后参加编辑出版工作的有米·马·斯培秀列维奇、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等。——[152]。

[18]这里列宁说的是他准备写的《论民族自决权》一文。该文写于 1914 年 2—5 月，载于 1914 年 4—6 月《启蒙》杂志第 4、5、6 期（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25 卷第 223—285 页）。——[154]。

精致的民族主义对工人的腐蚀

列宁（1914 年 5 月 10 日〔23 日〕）

工人运动愈发展，资产阶级和农奴主就愈拼命地试图镇压或瓦解它。用暴力来镇压和用资产阶级影响来瓦解，这两种方法在全世界、在各个国家都经常采用，统治阶级的各个党时而采用这种方法，时而采用那种方法。

在俄国，特别在 1905 年以后，最聪明的资产者清楚地看到，光用赤裸裸的暴力是靠不住的，于是各“进步的”资产阶级党派就愈来愈经常地鼓吹各种各样的能够削弱工人阶级斗争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学说，用这种方法来分化工人。

精致的民族主义就是这样一种思想，它在最漂亮和最动听的借口下，例如在保护“民族文化”利益、保护“民族自治或独立”等等利益的借口下鼓吹分化瓦解无产阶级。

觉悟的工人正用全副力量反击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不论是粗鲁的、暴力的、黑帮的民族主义，还是鼓吹各民族平等同时又主张……以民族划线分化瓦解工人事业、工人组织、工人运动的最精致的民族主义。觉悟的工人正在执行马克思主义者最近（1913 年夏天）一次会议[1]的决议，他们跟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资产阶级不同，不但坚持各个民族和各种语言最充分、最一贯、最彻底的平等，而且还坚持各个民族的工人必须在各种统一的无产阶级组织中打成一片。

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纲领与任何资产阶级的，即使是最“进步的”资产阶级的民族纲领的根本区别就在这里。

马克思主义者重视承认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不仅因为他们是最彻底的民主派。无产阶级团结的利益、工人的阶级斗争的同志般团结一致的利益要求各民族最充分的平等，以消除民族间最微小的不信任、疏远、猜疑和仇恨。充分平等也包括否认某种语言的任何特权，包括承认各民族自决的权利。

但是对于资产阶级来说，要求民族平等实际上往往就等于鼓吹民族特殊性和沙文主义，而且这种要求又经常是同鼓吹民族分裂和疏远同时并进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决不能容忍这种要求，因为国际主义不但宣传民族接近，而且宣传一国的各族工人在统一的无产阶级组织中打成一片。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坚决斥责所谓“民族文化自治”，也就是使教育事业不受国家管理而交给各个民族管理的计划。这个计划就是在“民族文化”问题上，以一个国家联盟的民族划线分割教育事业，把它交给各自有单独的议会、教育经费、教育委员会和教育机关的民族联盟。

这是腐蚀和分化工人阶级的精致的民族主义的计划。针对这个计划（崩得分子、取消派分子、民粹派分子的，即各种小资产阶级集团的计划），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如下的原则：各个民族和各种语言最充分的平等，直到否认国语的必要，同时坚持各民族最亲密的接近，坚持建立各民族统一的国家机关、统一的教育委员会、统一的教育政策（世俗教育！），坚持各族工人团结一致反对一切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反对以“民族文化”的口号作幌子来欺骗头脑简单者的民族主义。

让那些小市民民族主义者——崩得分子、取消派分子、民粹派分子和《钟声》杂志[2]的作者们——去公开捍卫他们那些精致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原则吧！这是他们的权利。但愿他们不要象弗·奥·女士在《北方工人报》第 35 号上那样欺骗工人，硬要读者相信，似乎《拥护真理报》[3]否定用母语来教学！！！

这是极大诬蔑，因为真理派不但承认这种权利，而且比任何人都更坚定不移地承认这种权利。真理派拥护宣布不要义务国语的那次马克思主义者会议，在俄国首先完全承认使用母语的权利！

把用母语教学同“以民族划线分割一个国家的教育事业”混淆起来，同“民族文化自治”混淆起来，同“使教育事业不受国家管理”的做法混淆起来，是绝顶无知的表现。

世界上任何地方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民主主义者）都没有否定用母语教学。世界上任何地方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采纳过“民族文化自治”的纲领，——只有在奥地利一个国家有人提出过这个纲领。

弗·奥·女士所引用的芬兰的例子恰恰打了她自己的耳光，因为在这个国家中承认并实现了各个民族和各种语言的平等（这是我们无条件地并且比一切人都更彻底地承认的），至于象“使教育事业不受国家管理”、成立单独的民族联盟来管理整个教育事业以及用民族藩篱把国家整个教育事业分割开等等，那是根本没有的事。

注释：

[1]指 1913 年 9 月 23 日—10 月 1 日（10 月 6—14 日）在波兰扎科帕内附近的波罗宁村举行的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出于保密考虑定名为“八月”会议或“夏季”会议）。这次会议就其历史意义说相当于一次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 22 人，其中有表决权的 17 人，有发言权的 5 人。会议是在列宁领导下进行的，他作了中央委员会工作的总结报告、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关于将在维也纳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报告及议程上其他问题的报告，审订了全部决议。会议还听取了各地的报告以及关于目前的鼓动任务、组织问题和关于党代表大会、关于罢工运动、关于党的报刊、关于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工作、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关于在合法团体里的工作和关于民粹派等项报告。会议指出在国内工人运动加强、革命不断发展和取消派影响普遍下降的情况下，党的主要革命口号仍然是建立民主共和国，没收地主土地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会议决定立即普遍开展全俄政治罢工的鼓动。会议强调指出，合法报刊已

成为使群众布尔什维克化的有力工具，各个党组织必须用订阅和捐款来支持合法报刊，并把这看作是交纳党费。会议同时还决定扩大秘密书刊的出版。为了加强革命鼓动，会议建议布尔什维克杜马代表更广泛地利用国家杜马的讲坛。由于孟什维克侵犯布尔什维克代表的权利，会议要求社会民主党党团内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部分权利平等。会议决定加强在合法组织（工会、俱乐部等）中的工作，以便把它们变成党的支柱。会议所通过的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驳斥了孟什维克和崩得分子的民族文化自治的论点，强调指出工人阶级的利益要求将一国各民族的无产者在统一的政治、工会、合作社和教育组织中打成一片。社会民主党应当坚持被压迫民族自决直至分离和组成独立国家的权利。会议认为主要的组织任务是加强每一城市的党的领导组织，并建立地区的党的联合组织。会议还就拟订党代表大会的议程和准备决议草案的问题向各个党组织发出了指示。——152。

[2]《钟声》杂志（《Дзвін》）是合法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刊物（月刊），倾向孟什维克，1913 年 1 月—1914 年在基辅用乌克兰文出版，共出了 18 期。参加该杂志工作的有 B. П. 列文斯基、弗·基·温尼琴柯、列·尤尔凯维奇（雷巴尔卡）、德·顿佐夫、西·瓦·佩特留拉、格·阿·阿列克辛斯基、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列·达·托洛茨基等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停刊。——154。

[3]《拥护真理报》（《За Правду》）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机关报，1913 年 10 月 1 日（14 日）—12 月 5 日（18 日）代替被沙皇政府查封的《真理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 52 号。——154。

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

列宁（1919 年 11 月 22 日）

同志们！能够向代表东部各穆斯林民族共产党组织的党员同志的代表大会表示祝贺，并就俄国和全世界当前局势问题讲几句话，我感到非常高兴。我的报告的题目是目前形势问题。我觉得目前在这方面具有最重大意义的，是东部各民族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和这些民族中间的革命运动。显然，东部各民族的革命运动，目前只有和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直接联系起来，才能顺利地发展，才能有所成就。由于种种原因，如由于俄国落后和幅员广大，由于它地跨欧亚两洲，位于东西方之间，我们不得不肩负起全部重担（我们认为这是极大的光荣），充当世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先锋。因此，最近将来事态发展的整个进程将预示一场更广泛更顽强的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而且这个进程必然会同苏维埃共和国反对德、法、英、美帝国主义联合势力的斗争联系起来。

讲到军事方面，你们知道，现在我们各条战线上的情况都很顺利。我不准备详细谈这个问题，我只想说明，国际帝国主义以暴力强加给我们的国内战争，两年来使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遭受了无穷的苦难，使农民和工人担负了往往是他们担负不了的重担。但是，这次战争也创造了奇迹：早在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以前就掠夺我们而现在已经成为野兽的所谓我国“盟友”的暴行和残酷进攻，使疲于作战、似乎无法再经受一次战争的人们变成了战士，使他们在两年中间不仅经受住了战争，而且即将胜利地结束这次战争。我们现在对高尔察克、尤登尼奇和邓尼金的胜利，说明世界帝国主义抗拒各国和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的历史已进入了新的阶段。从这方面说来，两年来我们的国内战争不仅仅完全证实了历史早已作出的结论，即战争的性质及其胜利主要取决于参战国的国内制度，

战争是该国战前所推行的国内政治的反映。所有这一切必然都对战争的进行起着作用。

进行战争和继续战争的是哪个阶级，这个问题极为重要。正因为我们的国内战争是解放了的工人和农民进行的，是劳动人民为摆脱本国和全世界资本家压迫而进行的政治斗争的继续，所以在俄国这样一个受了四年帝国主义战争折磨的落后国家里，人们才能有坚强的意志，才能在难以想象的无比艰难困苦的两年中把战争坚持下来。

国内战争的历史通过高尔察克的实例特别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高尔察克有世界所有最强大的国家的援助，有十万外国军队（其中包括国际帝国主义者最精良的军队，如原准备参加帝国主义战争、后来几乎没有参加、因而很少受到损失的日本军队）护卫下的铁路线，可以依靠那些生活最富裕、从来没有尝过农奴制的滋味、因而自然比任何人都更远离共产主义的西伯利亚农民，——象高尔察克这样的一个敌人，看起来似乎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因为他的军队是国际帝国主义的先头部队，而且直到今天，在西伯利亚还有日本、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其他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在活动。高尔察克在自然资源极其富饶的西伯利亚统治了一年多，起初还受到第二国际各社会党的支持，受到建立立宪会议委员会[2]阵线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从庸人和一般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他的统治似乎是稳固的、不可战胜的，可是实践表明，他愈深入俄国腹地，他的力量就愈枯竭，最后，我们看到苏维埃俄国彻底战胜了高尔察克。毫无疑义，我们在这里得到了实践的证明，摆脱了资本家压迫的工人和农民团结一致的力量，能够创造出真正的奇迹。我们在这里得到了实践的证明：革命战争如果真正吸引被压迫劳动群众参加并同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使这些群众意识到自己是在同剥削者作斗争，那么，这种革命战争就会唤起创造奇迹的毅力和才能。

我想，红军所做的一切，它所进行的斗争和它取得胜利的历史，对东部各族人民会有巨大的世界意义。它将向东部各族人民表明：尽管这些民族非常弱小，尽管欧洲那些压迫民族在斗争中采用了种种奇迹般的技术装备和军事艺术，似乎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但是被压迫民族所进行的革命战争如能真正唤醒千百万被剥削劳动者，就会显示巨大的潜力，创造奇迹，使东部各族人民现在完全可以实现解放，无论从国际革命的远景来看，从苏维埃共和国遭受了所有帝国主义强国军事侵犯以后在亚洲即在西伯利亚直接作战的经验来看，都是如此。

此外，俄国国内战争的这个经验还向我们和各国共产党人表明，在国内战争的烈火中，随着革命热情的高涨，国家内部也在大大地巩固起来。战争是对每个民族全部经济力量和组织力量的考验。战争使工人农民挨饿受冻，吃尽苦头。但是，在取得两年战争的经验后，我们终究可以根据这个经验说，我们正在胜利，并且将来还会胜利，因为我们有后方，有巩固的后方，因为农民和工人虽然饥寒交迫，但却是团结的，坚强的，每一个沉重打击都使他们更紧密地联合起来，更努力地增强经济实力。正因为如此，我们能够战胜高尔察克、尤登尼奇和他们的同盟者——世界上的头等强国。过去的两年向我们表明：一方面，革命战争能够继续发展；另一方面，苏维埃政权已经在外敌侵犯的沉重打击下巩固起来。外敌侵犯的目的是要迅速摧毁革命发源地，摧毁敢于向国际帝国主义宣战的工农共和国。但是，他们并没有能摧毁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反而使俄国工人和农民受到了一次锻炼。

这就是目前形势的主要总结和主要内容。我们就要彻底战胜我们领土上的最后一个敌人邓尼金了。我们感觉得到自己是强大的。我们可以千百次地重复说，我们的话没有错：共和国的内部建设已经巩固；我们结束对邓尼金的战争以后，一定能比过去强壮许多倍，并且能更有准备地来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大厦的任务。

在国内战争时期，我们还只能用极少的时间和力量去从事建设，现在，我们走上了自由的道路，一定能拿出全部力量来从事建设了。

我们看到西欧帝国主义正在瓦解。你们知道，一年以前，甚至德国社会党人也同极大多数不了解形势的社会党人一样，以为世界帝国主义两大集团之间在进行斗争，这种斗争构成了全部历史，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力量还能有所作为。他们觉得，甚至社会党人也只能投靠某一个强大的世界强盗集团，没有其他的选择。1918 年 10 月底的时候，似乎就是这样。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以后的一年当中，世界历史上发生了一些空前未有的现象，广泛而深刻的现象，使很多社会党人擦亮了眼睛，这些人在帝国主义大战期间曾经是爱国主义者，而且曾经借口大敌当前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还为自己联合英法帝国主义者的行为辩解，说这些帝国主义者能使人们摆脱德帝国主义的压迫。看吧，这场战争破除了多少幻想！我们看到，德帝国主义的瓦解不仅引起了共和革命，而且引起了社会主义革命。你们知道，目前德国的阶级斗争更尖锐了，国内战争，即德国无产阶级反对那些涂上了一层共和派色彩但依然代表帝国主义的德帝国主义者的斗争，日益逼近了。

大家知道，社会革命现时在西欧不是一天一天地，而是每时每刻地成熟起来。美国和英国的情形也如此。这些国家似乎是文化和文明的代表，是德帝国主义生番的征服者，可是一看到凡尔赛和约，大家都认为，这个和约的掠夺性比德国掠夺者强迫我们接受的布列斯特和约还要厉害一百倍，但凡尔赛和约只能是对这些倒霉的战胜国的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自己的最沉重的打击。凡尔赛和约使各战胜国民族擦亮了眼睛，并且证明英法等国并不是文化和文明的代表，而是一些号称民主实则由帝国主义强盗操纵的国家。这些强盗之间的内部斗争发展得异常迅速，这使我们十分高兴，因为我们知道凡尔赛和约不过是高唱凯歌的帝国主义者的表面胜利，实质上它意味着整个帝国主义世界的崩溃，意味着劳动群众断然离开那些在战争时期同腐朽的帝国主义者结成联盟并维护着一个参战强盗集团的社会

党人。劳动人民的眼睛已经擦亮了，因为凡尔赛和约是掠夺性的和约，它表明，英法两国同德国作战，实际上是为了巩固自己对殖民地的统治和加强本国帝国主义的实力。这种内部斗争愈往后就会愈扩大。今天我看到 11 月 21 日从伦敦发出的一则无线电讯，美国记者（这些人是不可能有同情革命者的嫌疑的）在电讯中写道，法国出现空前的反美情绪，因为美国人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

英国和法国是胜利了，但它们欠下了美国很多的债。不管法国人和英国人怎样以战胜者自居，美国还是决定要榨取他们的脂膏，要为美国在战时提供的援助取得超额利息，而此刻正在建设并在规模上日益超过英国的美国舰队，势必是实现这一目的的保证。掠夺成性的美帝国主义表现极其粗野，这从以下这件事可以看出：美国的经纪人收买妇女和姑娘这种活商品，把她们运到美国去卖淫。自由文明的美国竟以活商品供给妓院！在波兰和比利时，经常发生同美国经纪人发生冲突的事情。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例子，它说明在每一个得到过协约国援助的小国里都大量发生着类似的事情。就拿波兰来说吧。你们可以看到，虽然它自夸现在是一个独立强国，但美国的经纪人和投机商人却纷纷去到那里，要收买波兰的所有财富。美国经纪人正在把波兰全部买下来。那里没有一个工厂、没有一个工业部门不在美国人的掌握之中。美国已蛮横到如此地步，竟奴役起“伟大自由的胜利者”法国来了。法国过去是一个放高利贷的国家，现在却完全成了美国的债务国，因为法国已毫无经济实力，粮食和煤炭都不能自给，不能大规模发展自己的物质力量，而美国又一定要它交纳全部贡款。因此，法国、英国和其他强国的经济破产愈往后就愈明显。法国大选的结果是教权派占了上风。法国人民过去受了骗，为了所谓自由民主拿出了全部力量去跟德国打仗，现在得到的报酬却是无穷的债务、凶残的美帝国主义者的嘲弄，以及代表最野蛮的反动势力的教权派在大选中的获得多数。

世界局势已变得无比的错综复杂。我们打垮高尔察克和尤登尼奇这些国际资本的走狗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但是，我们在国际范围内取得的胜利还要巨大得多，虽然这个胜利并不十分明显。这个胜利就是：帝国主义内部在瓦解，它不能派军队来攻打我们了。协约国作过出兵的尝试，但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因为协约国军队一碰到我们的军队，一读到译成他们本国文字的俄罗斯苏维埃宪法，就瓦解了。不管腐朽的社会主义的首领们有多大影响，我们的宪法总是不断博得劳动群众的同情。"苏维埃"这个词现在已为大家所理解，苏维埃宪法已经译成各国文字，每个工人都读到了。工人知道，这是劳动者的宪法，这是号召大家去战胜国际资本的劳动者的政治制度。工人知道，这是我们反对国际帝国主义者的斗争的成果。我们这个胜利已经影响了每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因为我们已把它们的军队夺过来了，争取过来了，它们再不能派这些军队来进攻苏维埃俄国了。

它们曾试用外国军队，即试用芬兰、波兰和拉脱维亚的军队来作战，但也没有得到什么结果。几星期以前，英国大臣邱吉尔在议院的演说中夸口说（他的话已电告全世界）：已经组织了 14 个国家对苏维埃俄国进行讨伐，新年到来之前就能战胜俄国。确实，参加讨伐的国家是不少，有芬兰、乌克兰、波兰、格鲁吉亚、捷克斯洛伐克，还有日本人、法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但是我们知道讨伐究竟得到了什么结果！我们知道，爱沙尼亚人已离开了尤登尼奇的军队，由于爱沙尼亚人不肯帮助尤登尼奇，现在各家报纸正在进行着激烈的论战；芬兰也没有帮助尤登尼奇，虽然芬兰的资产阶级是很想这样做的。这样，第二次进攻我们的尝试也失败了。在第一个阶段，协约国派出了它的装备精良的军队，看起来他们会战胜苏维埃共和国。然而，他们却退出了高加索、阿尔汉格尔斯克、克里木，现在他们虽然还留在摩尔曼，但是同捷克斯洛伐克军还留在西伯利亚一样，也已经象是残存的孤岛了。想用自己的军队来战胜我们的第一次尝试以我们取得胜利而告终。第二次尝试是命令跟我们毗邻而在财政上完全依赖协约国的那些国家来攻打

我们，迫使它们来扼杀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发源地。然而这一次尝试也失败了，原来这些小国哪个也没有能力来打这样的仗。更糟糕的是，每一个小国都对协约国有很深的仇恨。芬兰没有在尤登尼奇占领红谢洛的时候夺取彼得格勒，就是因为它拿不定主意，它看出它跟苏维埃俄国为邻还能够独立生存，而同协约国就不可能和平相处。所有的小国都有过这种情形。芬兰、立陶宛、爱斯兰和波兰现在就是这样。这些国家虽然盛行着彻头彻尾的沙文主义，但都仇恨协约国在它们那里盘剥它们。现在，我们根据对事态发展的准确估计，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反苏维埃共和国的国际战争，不仅第一阶段已经破产，而且第二阶段也破产了。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去战胜已被打垮一半的邓尼金的军队。

我要在报告中简要说明的目前国内外的形势就是如此。最后，请允许我谈谈东部各民族目前的情况。你们是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的代表和共产党的代表。我要指出，如果说俄国布尔什维克能够在旧帝国主义中打开一个缺口，担负起异常艰难但又异常崇高的开辟革命新道路的任务，那么，你们这些东部劳动群众的代表今后要担负的就将是更伟大更新的任务。十分明显，全世界行将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决不限于每一国无产阶级战胜本国资产阶级。如果各国革命进行得很顺利，很迅速，这也许是可能的。我们知道，帝国主义者是不会让我们这样做的，世界各国都已武装起来对付本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一心在想怎样战胜自己家里的布尔什维主义。因此，每一个国家都酝酿着国内战争，而老社会党人妥协分子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参加这个战争的。由此可见，社会主义革命不会仅仅是或主要是每一个国家的革命无产者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不会的，这个革命将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一切殖民地和国家、一切附属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在我们党今年 3 月通过的纲领里面，我们在说明世界社会革命日益接近的时候说，各先进国家的劳动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剥削者的国内战争正开始同反对国际帝

国主义的民族战争结合起来。这一点正由革命进程所证实，并且今后会得到更多的证实。东方的情形也会是如此。

我们知道，东方的人民群众将作为独立的斗争参加者和新生活的创造者起来奋斗，因为东方亿万人民都是一些不独立的、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至今仍是帝国主义国际政治的客体，它们的存在只是为了给资本主义文化和文明当肥料。我们非常了解，所谓分配殖民地的统治权，就是分配掠夺和抢劫权，就是分配地球上一小撮人对大多数人的剥削权。地球上的大多数人过去完全处于历史的进步之外，因为当时他们不能成为独立的革命力量，但是在 20 世纪初，他们已不再扮演这种消极的角色了。我们知道，1905 年以后，土耳其、波斯、中国相继发生了革命，印度也展开了革命运动。帝国主义战争也促进了革命运动的发展，因为由殖民地人民组成的整团整团的军队被卷入了欧洲帝国主义者之间的斗争。帝国主义战争也唤醒了东方，把东方各族人民卷入了国际政治生活。英国和法国武装了殖民地人民，帮助他们熟悉了军事技术装备和革新的机械。他们将利用学到的本事去反对帝国主义老爷们。继东方觉醒时期之后，在当代革命中，东方各民族为了不再仅仅充当别人发财的对象而参与决定世界命运的时期到来了。东方各民族正在纷纷觉醒，采取实际行动，使每一个民族都参与决定全人类命运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今后在世界革命发展史中（从这个革命开始时的情况看来，它还要继续很多年，需要人们做很多工作），在革命斗争中，在革命运动中，你们将要发挥重大的作用，将要把你们的斗争和我们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汇合起来。你们参加国际革命，就要担负起一个艰巨复杂的任务，解决了这个任务就会为总的胜利打下基础，因为在这里，人口中的多数是第一次进行独立的运动，他们将成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的积极因素。

东方大多数民族的处境比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俄国还要坏。我们已经在反对封建主义残余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把俄国农民和工人联合起来了，我们的斗争

所以进行得很顺利，正是因为工人和农民是联合起来反对资本和封建主义的。在这方面，同东部各族人民的联系特别重要，因为东部人民大多数是典型的劳动群众，他们不是受过资本主义工厂锻炼的工人，而是典型的被剥削劳动农民群众，即遭受中世纪制度压迫的劳动农民群众。俄国革命已经表明，战胜了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把千百万涣散的劳动农民群众团结起来以后，就胜利地进行了反对中世纪制度压迫的斗争。现在，我们苏维埃共和国要把觉醒的东部各族人民团结在自己周围，共同去进行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

你们面临着全世界共产党人所没有遇到过的一个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共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但又是一个能收到卓著成效的任务，因为一些还没有参加过斗争的群众正被卷到斗争中来，另一方面，由于东部组织了共产党支部，你们就能够同第三国际保持最紧密的联系。你们必须找到特殊的形式，把全世界先进无产者同东部那些往往处在中世纪生活条件下的被剥削劳动群众联合起来。我们在小范围内即在我们国家内实现了的任务，你们将在大范围内即在一些大的国家内予以实现。这第二个任务，我希望你们能够胜利完成。由于东部已经有了共产党组织——你们就是这些组织的代表——你们就与先进的革命无产阶级有了联系。你们当前的任务，就是要继续关心怎样在每一个国家内用人民懂得的语言进行共产主义宣传。

不言而喻，能够获得最终胜利的，只有全世界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我们俄国人开创的事业，将由英国、法国或德国的无产阶级来巩固；但是我们看到，没有各被压迫殖民地民族的劳动群众的援助，首先是东方各民族的劳动群众的援助，他们是不能取得胜利的。我们应当懂得，单靠一支先锋队还不能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必须激发劳动群众从事独立活动和把自己组织起来的革命积极性（不管

他们的水平如何）；把指导较先进国家的共产党人的真正的共产主义学说译成各民族的文字；实现那些必须立刻实现的实际任务，同其他国家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共同斗争。

任务就是这些，它们的解决方法无论在哪一部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是找不到的，但是在俄国所开始的共同斗争中却能够找到。你们应当提出这种任务，并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解决这种任务。对你们会有帮助的，一方面是同其他国家的全体劳动人民的先锋队结成紧密的联盟，另一方面是善于正确对待你们在这里所代表的东部各民族。你们不得不立足于正在这些民族中间产生出来并且必然要产生出来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的产生是有其历史根据的。同时你们应当去联系每一个国家的被剥削劳动群众，用他们懂得的语言告诉他们，获得解放的唯一希望是国际革命的胜利，国际无产阶级是东方各民族亿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唯一同盟者。

这就是摆在你们面前的极其巨大的任务。由于革命时代的来临和革命运动的发展（这是不容置疑的），东部各共产党组织只要能共同努力，就一定会成功地解决这个任务，并彻底战胜国际帝国主义。

注释：

[1]这是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当前形势的报告。

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由俄共（布）中央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中央局召开，于 1919 年 11 月 22 日—12 月 3 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 71 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 11 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在代表大会开幕的前一天，曾由列宁主持召开了有俄共（布）中央委员和一部分代表参加的预备会议。代表大会听取了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中央局的工作报告，各地的报告，中央穆斯林军事委员会和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中央穆斯林委员部的报告，以及关于国家

组织问题和党的问题、关于东部妇女工作、青年工作等小组的报告、并讨论了鞑靼—巴什基尔问题。代表大会规定了东部党的工作和苏维埃工作的任务，选出了俄共（布）中央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中央局。

[2]立宪会议委员会是社会革命党人组织的反革命政府，1918 年 6 月 8 日在捷克斯洛伐克军占领的萨马拉成立。委员会自封为立宪会议召开前的“临时政权”。委员会最初由 5 名社会革命党立宪会议代表组成，弗·卡·沃尔斯基为主席；以后不断补充，到 9 月底增至 96 名。立宪会议委员会宣布“恢复民主自由”，建立所谓的工人代表苏维埃，成立“国民军”，同时废除苏维埃政权法令，将已经收归国有的企业归还原主，并在实际上让地主夺取已归农民的土地。1918 年 6—8 月，立宪会议委员会的统治曾扩大到萨马拉、辛比尔斯克、喀山、乌法各省和萨拉托夫省的部分地区。9 月，“国民军”在红军打击下节节败退，放弃了大部分地盘。1918 年 9 月乌法执政府成立后，立宪会议委员会改名为“立宪会议代表大会”，它的行政机关“部长会议”则成为乌法地区政府。11 月 19 日，在亚·瓦·高尔察克发动政变后，“立宪会议代表大会”成员被逮捕；虽经捷克斯洛伐克军交涉获释，但 12 月 3 日再度被捕，一部分人并被白卫军枪决于鄂木斯克。1918 年 12 月，“代表大会”和“部长会议”均被撤销。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1，3，4）

（1920 年 7—8 月）

1 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

（热烈欢呼。全场起立，鼓掌。报告人准备讲话了，听众仍继续鼓掌，用各种语言欢呼。长时间欢呼。）同志们，关于共产国际基本任务问题的提纲［注：见本卷第 179—195 页。——编者注。］已经用各种文字发表了，这个提纲并没有提出什么重大的新东西（特别是对俄国同志来说），因为这个提纲主要是要把我国革命经验的某些基本点和我国革命运动的教训推广运用于西方国家，运用于西欧。因此，对我报告中的第一部分，即国际形势部分，我要稍许多谈一点，当然也只能是简要地谈一谈。

目前整个国际形势的基础就是帝国主义的经济关系。资本主义的这个新的、最高的和最后的阶段到 20 世纪已经完全形成了。大家当然都知道，帝国主义最突出最本质的特征就是资本达到了巨大的规模。大规模的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极少数资本家有时能把一些工业部门整个集中在自己手里；这些工业部门转到了往往是国际性的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等联合组织的手里。因此，垄断资本家不仅在个别国家内，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在金融方面、产权方面、部分地也在生产方面，控制了整个整个的工业部门。在这个基础上就形成了极少数大银行、金融大王、金融巨头的空前未有的统治，他们实际上甚至把最自由的共和国都变成了金融君主国。这一点，象法国的利西斯这样一些决非革命的著作家，在战前就已经公开承认了。

一小撮资本家的这种统治达到全盛时期是在世界已经瓜分完毕的时候，不仅各种原料产地和生产资料已被最大的资本家夺走，就是殖民地也已经初步瓜分完

毕。大约 40 年前，6 个资本主义强国所属殖民地的人口不过稍稍超出 25000 万。1914 年大战爆发前夕，殖民地人口已近 6 亿，如果再加上波斯、土耳其、中国这类当时已处于半殖民地地位的国家，匡算一下，约有 10 亿人口被最富有、最文明和最自由的国家置于殖民地附属地位，受它们的压迫。大家知道，殖民地附属地位，除了在政治上法律上直接处于附属地位之外，还必须有一系列财政和经济上的附属关系，还要进行一系列不能算作战争的战争，因为这些战争常常不过是用最精良的杀人武器装备起来的欧美帝国主义军队残害手无寸铁的殖民地国家居民的大屠杀而已。

由于世界已经瓜分完毕，由于资本主义垄断的这种统治，由于极少数大银行（每个国家最多只有两三家、四五家）的无限权力，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1914—1918 年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这场战争是为了重新瓜分世界。这场战争是为了决定：极少数大国集团（英国集团或德国集团），谁可以、谁有权来掠夺、扼杀和剥削全世界。大家知道，战争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是有利于英国集团的。这场战争的结果使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空前尖锐化了。战争一下子就把世界上近 25000 万的人口置于同殖民地毫无差别的境地，把俄国约 13000 万的人口，奥匈帝国、德国、保加利亚不下 12000 万的人口置于这样的境地。这是包括象德国那样最先进、最文明、最有文化、具有现代技术水平的国家在内的 25000 万人口！战争的结果签订了凡尔赛条约，迫使先进的民族屈居殖民地附属地位，陷于贫困、饥饿、破产、无权的境地，今后世世代代都要受条约的束缚，这种遭遇是任何文明的民族所未曾有过的。现在你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幅世界的图景：战后马上使不下 125000 万人遭受殖民压迫，遭受野蛮的资本主义的剥削。资本主义自夸爱好和平，50 来年前，它还可以勉强这样吹嘘，因为那时候，世界还没有瓜分完毕，垄断还不占统治地位，资本主义还可以比较和平地发展，而没有引起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如今这个“和平”时期已经过去，压迫更加骇人听闻了，殖民压迫和军事压迫又重新抬头，而且变本加厉了。凡尔赛条约使德国以及其他许多战败国经济崩溃，无法生存，丧尽权利，备受屈辱。

有多少国家从中得到好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一定会想到美国。只有美国一国在战争中完全是获利的，它从负债累累一跃而为各国的债主，它的人口不超过 1 亿。日本的人口是 5000 万，它没有卷入欧美冲突，而攫取了亚洲大陆的许多地方，因此也获得了很大利益。获利仅次于上述两国的是英国，它的人口有 5000 万。如果加上战时发了财的中立国的极少数人口，总计约 25000 万人。

这就是帝国主义战争后世界状况的轮廓。被压迫的殖民地人口 125000 万，其中包括波斯、土耳其、中国这类正在被人活活瓜分的国家，以及那些因战败而沦于殖民地地位的国家。保持原来地位的国家的人口，不超过 25000 万，但是这些国家在经济上都已仰赖美国，战时在军事上也处于依赖地位，因为战争席卷了整个世界，使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保持真正的中立。最后，是居民不到 25000 万的几个国家，在这些国家中自然只有上层分子，只有资本家才能从瓜分世界中得到好处。这些数字加在一起是 175000 万，构成世界人口的总数。我想提醒大家注意世界的这样的一幅图景，是因为所有导致革命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帝国主义基本矛盾，所有引起了对第二国际作极其激烈斗争的工人运动中的基本矛盾（主席同志讲到了这一点），都是同世界人口的这种划分联系着的。

当然，这些数目字只是粗略地勾画出一幅世界经济的图景。同志们，在世界人口这样划分的基础上，金融资本的剥削，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剥削，加重了许多倍，是很自然的。

不但殖民地、战败国陷于附属地位，就是在每个战胜国里，矛盾也尖锐化了，一切资本主义矛盾都尖锐化了。我现在举几个例子来简单说明一下。

就拿国家债务来说吧。我们知道，从 1914 年到 1920 年，欧洲最大的几个国家的债务至少增加了六倍。下面我再引证一个特别有价值的经济材料，即凯恩斯《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凯恩斯是英国外交家，他奉本国政府之命参加凡尔赛和谈，从纯粹资产阶级的观点直接作了观察，一步步地作了详尽的研究，并且以经济学家的身分参加过各种会议。他作出的结论，比任何一个共产党人革命家的结论更有说服力，更引人注目，更发人深思，因为作出这个结论的人是一个人所共知的资产者，布尔什维主义的死敌，在这个英国市侩的想象中，布尔什维主义的样子是畸形的狰狞可怕的。凯恩斯得出结论说，欧洲和整个世界正随着凡尔赛和约的签订而走向破产。凯恩斯后来辞职了，写了一本书，指责政府说，你们在干蠢事。我现在把他的数字综合摘引一下。

列强之间的债务关系怎样呢？我按 1 英镑等于 10 个金卢布的比价来折算。那么，美国借出是 190 亿，贷入是零。战前它是英国的债务国。莱维同志 1920 年 4 月 14 日在最近一次德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说得很对，现在世界上只剩下英美两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了。只是美国在财政上是绝对独立的。美国战前是债务国，现在却完全是债权国了。世界上其他强国都负了债。英国的状况是：借出 170 亿，贷入 80 亿，已经陷于半负债地位，而且在它借出的款项中，有近 60 亿是俄国欠的，其中包括俄国战时赊购军火的欠款。不久前，俄罗斯苏维埃政府代表克拉辛在同劳合－乔治谈到贷款条约问题时，曾经明确地告诉过英国政府的领袖们、学者和政治家们说，要是他们还指望收回债款，那就大错特错了。英国外交家凯恩斯也早已指出了这种错误。

问题当然不仅仅在于，甚至根本不在于俄国革命政府不愿还债。任何一个政府都不会还这种债，因为这些债款是已经还本 20 次的高利贷的利息。连那位丝毫不同情俄国革命运动的资产者凯恩斯都说：“显然这些债务是不能算数了。”

至于说到法国，凯恩斯引用了这样的数字：借出 35 亿，贷入却是 105 亿！要知道，法国人曾自称是全世界的高利贷者，因为它有大量的“积蓄”，它对殖民地的掠夺以及在金融上的掠夺积累了巨额的资本，使它能够几十亿几十亿地贷给别国，特别是贷给俄国。这些贷款提供了巨额收入。尽管如此，尽管法国是战胜国，它还是陷于负债地位。

共产党员布劳恩同志在《谁应该偿还战时债款？》（1920 年莱比锡版）一书中，引用了美国资产阶级的一个材料。材料得出了各国债务对国民财产的比例：英、法这两个战胜国的债务相当于全部国民财产的 50％以上；意大利相当于 60—70％；俄国相当于 90％。但是，大家知道这些债务并没有使我们担心，因为在凯恩斯的著作出版前不久，我们就已经听从了他的绝妙忠告——废除了一切债务。（热烈鼓掌）

然而凯恩斯在这里不过是大发其庸人常有的怪癖罢了，他提出废除一切债务的忠告时说，法国当然只会占到便宜，英国损失当然不会太大，因为反正从俄国是捞不回什么了；只有美国要受很大的损失，但是凯恩斯指望美国能够“大发慈悲”！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看法同凯恩斯以及其他市侩和平主义者是不一致的。我们认为，他们既然要废除债务，就应该把希望寄托在别的方面，朝另外的方向努力，而不应该指望资本家老爷们“大发慈悲”。

从这些最简单的数字可以看出，帝国主义战争同样给战胜国也造成了莫大的困难。工资远远跟不上物价的上涨，也说明了这一点。今年 3 月 8 日，最高经济委员会这个维护世界资产阶级秩序、防止革命日益高涨的机关，通过一项决议，决议最后号召人们遵守秩序，克勤克俭，当然，工人仍旧是做资本的奴隶。最高经济委员会这个协约国的机构，全世界资本家的机构提供了以下的数字：

美国物价平均上涨 120％，工资却只增加 100％；英国物价上涨 170％，工资只增加 130％；法国物价上涨 300％，工资只增加 200％；日本物价上涨 130％，

工资只增加 60%（这是我参照布劳恩同志在上述小册子里引用的数字和 1920 年 3 月 10 日《泰晤士报》[2]所载最高经济委员会公布的数字得出的）。

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的愤怒必然日益强烈，革命思想和革命情绪必然日益加强，自发的大规模罢工浪潮必然日益高涨，因为工人的处境已经不堪忍受了。工人根据经验确信，资本家靠战争大发横财，而把一切军费和债务转嫁给工人负担。不久前我们得到的一则电讯说，美国为了肃清“有害的鼓动分子”，想再驱逐 500 个共产党员到我们俄国来。

不要说美国驱逐 500 个，就是把整整 50 万个俄国的、美国的、日本的、法国的“鼓动分子”驱逐到我们这里来，也无济于事，因为使他们束手无策的物价失调问题仍然存在。他们之所以对此束手无策，是因为他们牢牢地保持着私有制，他们那里的私有制是“神圣的”。这一点决不应当忘记，因为现在只有俄国摧毁了剥削者的私有制。资本家对物价失调束手无策，而工人靠原来的工资已生活不下去了。任何老办法都解脱不了这种灾难，任何局部的罢工、任何议会斗争、任何投票表决都无济于事，因为“私有制是神圣的”，资本家已经放了这么多的债，以致全世界都在受一小撮人的盘剥，而工人的生活条件却变得愈来愈不堪忍受了。只有消灭剥削者的“私有制”，别的出路是没有的。

拉品斯基同志在《英国与世界革命》这本小册子（我国《外交人民委员部通报》[3]于 1920 年 2 月摘录了其中很有价值的部分）中指出，英国煤的出口价格比工业当局预计的高出一倍。

兰开夏郡的股票甚至增值 400%。银行赢利至少是 40—50%，还应该指出，所有的银行家在计算银行赢利时，都会巧妙地把大部分的赢利用奖金、酬金等名目隐藏起来，也就不算作赢利了。这些无可争辩的经济事实又一次证明：一小撮人大发其财，穷奢极欲，而与此同时工人阶级则日益贫困。还有一种情况应该着重指出，那就是莱维同志在上面提到的他的报告中所特别明确强调的币值变动。

由于负债、发行纸币等原因，各国的货币都贬值了。根据上面我提到的那个资产阶级的材料，即 1920 年 3 月 8 日最高经济委员会的声明所作的计算，可以看出：同美元比较，英国货币 12 贬值约 1/3，法国、意大利货币贬值 2/3，德国货币贬值竟高达 96％。

这个事实说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正在全面瓦解。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借以取得原料和销售产品的贸易关系，已经无法维持了；正因为许多国家从属于一个国家，币值一变动，这种关系就无法维持了。现在，任何一个最富有的国家也不能生存，不能进行贸易了，因为它无法出售自己的产品，也无法买进原料。

结果，连最富有的、控制所有国家的美国也无法做买卖了。这一点连凯恩斯那样一个在凡尔赛谈判中历尽千辛万苦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尽管他有捍卫资本主义的坚强决心，尽管他对布尔什维主义深恶痛绝。顺便说一下，我认为没有一篇共产主义的或任何革命的宣言就其效果来说能比得上凯恩斯书中描写威尔逊和实践中的“威尔逊主义”的那几页。象凯恩斯和第二国际的许多英雄（甚至包括“第二半”国际[4]的许多英雄）这类市侩及和平主义者，曾经把威尔逊当作偶像，对他的“14 点”顶礼膜拜，甚至撰写“学术”著作论述他的政策的“基础”，指望他能拯救“社会和平”，使剥削者同被剥削者和解，实行社会改良。后来凯恩斯却清楚地揭露了威尔逊原来是个愚人，这一切幻想一碰到以克列孟梭和劳合－乔治两位先生为代表的资本所采取的注重实际、专讲实利的商人政策，就烟消云散了。现在工人群众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愈来愈清楚地看到，学究们甚至从凯恩斯的书中也可以看到，威尔逊政策的“基础”，归结起来不过是神父的蠢见，小资产阶级的空谈和对阶级斗争的极端无知。

由于上述种种事实，完全不可避免地、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两个条件，产生了两种基本情况。一方面是群众的贫困、破产空前加重，这首先是指包括 125000 万

人口，即占全世界人口 70％的地区。这是一些居民在法律上毫无权利的殖民地附属国，是被“委任”给金融强盗们统治的国家。此外，凡尔赛条约把战败国受奴役的地位固定下来了，有关俄国的秘密条约也起了这种作用，不过，这种秘密条约的实际效力，有时和那些写着我们负债几十亿几十亿的废纸不相上下。把 125000 万人遭受掠夺、奴役、贫困、饥饿和屈居附属地位的事实，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了，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第一次。

另一方面，在每一个债权国里，工人的处境也到了不堪忍受的地步。战争使一切资本主义矛盾空前尖锐化了，这就是产生强烈的革命风潮的根源。这种风潮正在增长，因为战时人们受着军事纪律的约束，不是被拉去送死，就是随时都有受到军法制裁的危险。战争环境使人们不能去考察实际的经济情况。作家、诗人、神父和所有的报刊都一味地歌颂战争。现在，战争结束了，揭露也就开始了：德帝国主义及其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被揭穿了，凡尔赛和约被揭穿了，它本来应当是帝国主义的胜利，现在却变成了它的失败。凯恩斯这个例子还表明，欧美千千万万小资产阶级分子、知识分子、多少受过教育有点文化的人不得不走上凯恩斯所走的道路。凯恩斯辞去了职务，写了一本书，揭露本国政府。他的行为说明，一旦千百万人懂得了所谓“为自由而战”等花言巧语不过是十足骗人的鬼话，其结果不过是极少数人发财而其余的人破产、受奴役，那么他们的思想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资产者凯恩斯说，英国人要想救自己的命，挽救英国的经济，就应当设法恢复德俄两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关系！用什么方法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用凯恩斯所提出的方法，就是废除一切债务！这不光是凯恩斯这位博学的经济学家一个人的主张，现在已经有、将来还会有千百万人提出这样的主张。千百万人听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的呼声：只有废除债务，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因此他们说：“布尔什维克〈他们已经把债务废除了〉真该死”，让我们去乞求美国“大

发慈悲”吧!!我认为，应该以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名义向这些为布尔什维主义进行鼓动的经济学家致谢。

如果一方面，群众的经济状况已经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另一方面，象凯恩斯所证实的那样，在极少数势力极大的战胜国中间，瓦解已经开始而且正在加深，那么，十分明显，世界革命的两个条件都正在成熟。

现在，我们看到了一幅比较完整的全世界的图景。我们懂得，125000 万人依附于一小撮富翁，处于无法生存的境地，这意味着什么。另一方面，人们向各国人民端出了一项国际联盟盟约，宣称国际联盟结束了战争，今后不允许任何人再破坏和平。全世界劳动群众寄予最后希望的这个盟约生效，对我们来说倒是一个重大胜利。在盟约还没有生效的时候，有人说：对德国这样的国家不能不用特殊条件加以控制；你们瞧吧，有了盟约就好了。但是，盟约一正式公布，布尔什维主义的死敌就不得不背弃了它！盟约一开始生效，极少数最富有的国家，克列孟梭、劳合－乔治、奥兰多、威尔逊这“四巨头”，又坐下来磋商建立新关系了！盟约这部机器刚一开动，就完全垮了！

我们从侵犯俄国的战争中就看到了这一点。俄国这个又穷又弱、备受压抑的国家，这样一个最落后的国家，却抗击了所有的国家，抗击了统治全世界的富强国家的联盟，并且取得了胜利。双方力量悬殊，可是我们打赢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们之间毫不团结，因为大国之间互相作对。法国希望俄国还它的债，并成为威慑德国的力量；英国则希望瓜分俄国，企图夺取巴库的石油，并同俄国边境上的几个国家缔结条约。英国官方的一个文件，非常诚实地列举了大约半年前（1919 年 12 月）答应要攻占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国家（一共 14 个国家）。英国曾经打算利用这些国家来实行它的政策，给了它们几百万几百万的贷款。现在这一切指望都已落空，全部贷款也付诸东流了。

这就是国际联盟所造成的局势。这个盟约存在一天，就替布尔什维主义很好地作一天宣传，因为资本主义“秩序”的最强有力的维护者表明，在每个问题上他们都是互相拆台的。日本、英国、美国和法国为着瓜分土耳其、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和中国在进行激烈的争夺。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报刊都在猛烈地抨击和恶毒地咒骂自己的“伙伴”，斥责对方不该把自己快到口的肥肉抢走。我们看到，就上层来说，极少数最富裕的国家之间已经四分五裂。125000 万人决不会让“先进的”、文明的资本主义任意奴役下去，要知道，他们占世界人口的 70％！英、美、日（日本过去虽然能够掠夺东方各国，亚洲各国，但是，现在没有别国的帮助，它无论在财政上或军事上都没有独立行动的能力）这极少数最富有的国家，这两三个国家已经无法调整好它们的经济关系，它们把破坏国际联盟成员国和伙伴的政策作为自己政策的目标。这就产生了世界危机。这个危机的经济根源就是共产国际之所以取得辉煌成就的主要原因。

同志们！现在我们该谈谈作为我们革命行动的基础的革命危机问题。这里首先必须指出两种常见的错误。一种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用英国人文雅的口吻，把这种危机描绘成单纯的“人心惶惶”；另一种是革命者有时力图证明危机是绝对没有出路的。

这是错误的。绝对没有出路的情况是没有的。现在资产阶级活象一个既不讲廉耻又丧失了理智的强盗，接连不断地干着蠢事，使局势尖锐化，加速着自己的灭亡。这都是事实。但是决不能由此“证明”，资产阶级绝对不可能用微小的让步来麻醉一小部分被剥削者，绝对不可能把某一部分被压迫被剥削群众的某种运动或起义镇压下去。企图预先“证明”“绝对”没有出路，就是无用的学究气，或者是玩弄概念和字眼。在这个问题和类似问题上，只有实践才是真正的“证明”。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制度正在经历巨大的革命危机。现在各国的革命政党都应该用实

践来“证明”，他们有足够的觉悟和组织性，他们与被剥削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足够的决心和本领利用这个危机来进行成功的、胜利的革命。

我们召开这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主要目的，就是为这种“证明”做准备工作。

我现在拿英国“独立工党”的领袖拉姆赛·麦克唐纳作例子，来说明机会主义在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党内还有多么大的势力，有些党的工作离训练好革命阶级去利用革命危机这一要求还多么远。麦克唐纳的《议会和革命》一书中谈到的问题，正是我们现在研究的那些根本问题。他在这本书里对形势的描述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大致相同。他承认现在有革命危机，革命情绪正在增长，也承认工人群众是同情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请注意：这里讲的是英国），无产阶级专政比目前的英国资产阶级专政好。

但是，麦克唐纳仍旧是十足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和妥协主义者，是幻想建立超阶级政府的小资产者。麦克唐纳同一切资产阶级的骗子、诡辩家、学究一样，只认为阶级斗争是一种“记叙的事实”。麦克唐纳绝口不谈俄国克伦斯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建立似乎是超阶级的“民主”政府的尝试，以及匈牙利、德国等国家的类似的尝试。他却麻醉他的党，麻醉那些不幸把他这个资产者当作社会主义者，把他这个庸人当作领袖的工人，说什么：“我们知道，这（革命危机，革命风潮）会过去，会平息的。”他说，战争必然引起危机，危机在战后虽然不会立即平息，但“总归会平息下去的”！

一个愿意参加第三国际的党的领袖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这样赤裸裸的暴露是罕见的，因而更有价值，它暴露了法国社会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上层分子中间同样常见的情况，不仅不善于而且不愿意在革命意义上利用革命危机，换句话说，就是既不善于又不愿意使党和阶级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好真正的革命准备。

这就是许许多多目前退出第二国际的党的主要弊病。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我向这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提纲中，谈得最多的是尽量具体而明确地规定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准备的任务。

再举一个例子。不久以前，出版了一本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新书。现在，这种书在欧洲和美洲出版得特别多，可是，反布尔什维主义的书出得愈多，群众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同情就愈强烈、愈迅速地增长起来。我指的是奥托·鲍威尔的《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一书。德国人可以从这本书里清楚地看到，究竟什么是孟什维主义（它在俄国革命中所起的可耻作用，各国工人都已有足够的了解）。尽管奥托·鲍威尔把他对孟什维主义的同情掩盖起来，可是他写的却是一部道道地地的孟什维克式的诽谤作品。在欧洲和美洲，现在倒必须使更多的人更确切地了解什么是孟什维主义，因为这是一个概括所有敌视布尔什维主义的所谓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派别的类概念。我们俄国人可能没有兴趣为欧洲写一本书来说明什么是孟什维主义。而奥托·鲍威尔写的书实际上做到了这一点。我们预先感谢那些要把这本书译成各种文字出版的资产阶级出版家和机会主义出版家。鲍威尔的书是共产主义教科书有益而独特的补充读物。如果要“测验”是否领会了共产主义，出下面这样的试题是最好不过的：试分析奥托·鲍威尔书中的任何一节或任何一个论点，指出其中的孟什维主义，指出他背叛社会主义以及与克伦斯基、谢德曼等等同流合污的思想根源。要是你解答不了这个问题，那你还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你最好不要加入共产党。（鼓掌）

奥托·鲍威尔用一句话绝妙地表达了世界机会主义观点的全部实质——为此我们应当在他生前就给他建立纪念碑，如果我们能够在维也纳随意作主的话。他煞有介事地说，在现代民主国家的阶级斗争中使用暴力，无异是“对各种社会力量因素横施暴力”。

这句话也许你们听起来很古怪、很费解吧？然而，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表明人们把马克思主义糟蹋成了什么样子，人们可以把最革命的理论弄得何等庸俗，甚至用它来为剥削者辩护。只有德国那种市侩才能炮制出这样一种“理论”，说什么“各种社会力量因素”就是人数、组织能力、在生产和分配过程中所占的地位、积极性和教育程度。如果农村里的雇农和城市里的工人对地主和资本家使用了革命暴力，这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决不是对剥削和压迫人民的人使用暴力，绝对不是。这是“对各种社会力量因素横施暴力”。

我举的这个例子也许听来有点可笑。但是，现代机会主义的本性本来就是这样，它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总是会闹出笑话来。现在，引导工人阶级、引导工人阶级中一切肯动脑子的人参加国际孟什维主义（麦克唐纳之流、奥·鲍威尔之流）与布尔什维主义之间的斗争，对于欧洲和美洲来说，都是一件最有益、最迫切的事情。

这里我们要提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派别在欧洲那样根深蒂固呢？为什么这种机会主义在西欧比在我国强大呢？这是因为先进的国家过去和现在创造自己的文化都是靠了能剥削 10 亿被压迫的人民这样的条件。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家掠夺来的东西，大大超过了他们能够从本国工人身上榨取的利润。

战前有人计算过，英、法、德三个最富有的国家，其他收入不算，仅资本输出一项，每年就可获利 80—100 亿法郎。

很明显，从这么一大笔钱里，完全可以拿出哪怕是 5 亿法郎来施舍给工人领袖、工人贵族，来进行各种形式的收买。收买就是整个问题的症结所在。这可以采取千百种不同的方式：提高大中心城市的文化水平，设立教育机关，为合作社领袖、工联领袖、议会领袖提供千百个肥缺。哪里有现代的文明的资本主义关系，哪里就是如此。这几十亿超额利润，就是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机会主义领袖、工人阶级的上层分子、工人贵族最顽固，

他们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抵抗最顽强。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欧美工人政党要治好这种病症比我们要困难。我们都知道，自从第三国际成立以来，医治这种病症已经获得了极其巨大的成效，但是我们还没有彻底治愈，因为全世界工人政党，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还远没有肃清自己队伍中的资产阶级影响，还远没有肃清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

我不打算再谈我们应该如何具体地进行这个工作。这一点在我发表的提纲中已经讲过了。我在这里只想指出这种现象的深刻的经济根源。这病拖的时间很久了，要治好它，比乐观主义者所想象的时间要长得多。机会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工人运动中上层分子的机会主义，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实际证明：由工人运动内部机会主义派别的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工人要不是由他们来领导，资产阶级就无法支持下去。不但俄国克伦斯基统治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就是社会民主党政府领导的德国民主共和国，以及阿尔伯·托马对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态度，也证明了这一点。英国和美国的类似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这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必须战胜这个敌人。经过这次代表大会，我们应该下定决心，把各国党内的这一斗争进行到底。这是主要的任务。

同这一任务比起来，纠正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的错误，将是一项容易的任务。我们在许多国家里看到反对议会活动的倾向，这种倾向与其说是由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带来的，还不如说是受无产阶级的某些先进部队支持的，因为这些先进部队痛恨过去的议会活动，痛恨英、法、意等一切国家中议会活动家的所作所为，这种痛恨无疑是合理的、正当的和必要的。共产国际应当指导同志们更深入细致地了解俄国的经验，了解真正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我们的工作正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同无产阶级运动中的这些错误缺点作斗争比较容易，而同那些以改

良主义者的姿态加入第二国际旧党、并按资产阶级精神而不是按无产阶级精神来指导党的全部工作的资产阶级作斗争要困难一千倍。

同志们，最后，我还要讲一个问题。主席同志曾在会上说，这次代表大会可以称为一次世界性代表大会。我认为，他说得很对，特别是因为有不少殖民地、落后国家革命运动的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开端，但重要的是已经开始了。这次代表大会，已经把资本主义国家、先进国家的革命无产者，同那些没有或者几乎没有无产阶级的国家的革命群众，同东方殖民地国家的被压迫群众团结起来了。而巩固这种团结，则要靠我们的努力，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做到这一点。一旦各国被剥削被压迫工人的革命进攻击败了市侩分子的抵抗，肃清了一小撮工人贵族上层分子的影响，同迄今还站在历史之外，只被看作历史客体的亿万人民的革命进攻联合起来，世界帝国主义就一定会灭亡。

帝国主义战争帮助了革命。资产阶级从殖民地、落后国家以及那些最偏僻的地方征兵来参加这场帝国主义战争。英国资产阶级要印度士兵相信，抗击德国、保卫大不列颠是印度农民的义务；法国资产阶级要法属殖民地的黑人士兵相信，保卫法国是他们的义务。英法资产阶级教给了他们使用武器的本领。这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本领，为此我们要向资产阶级深深致谢，我们要以全体俄国工人和农民的名义，特别要以全体俄国红军的名义向他们致谢。帝国主义战争把附属国的人民卷进了世界历史。所以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考虑如何在各个非资本主义国家内为组织苏维埃运动奠定头一块基石。在这些国家里组织苏维埃是可能的，但这种苏维埃将不是工人苏维埃，而是农民苏维埃，或劳动者苏维埃。

我们还需要做许多工作，还难免会犯错误，而且在这条道路上会碰到许多困难。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就是制定或者指出一些实际工作的原则，使得到目前为止在亿万人当中无组织地进行的工作能够有组织地、协调地、有步骤地去做。

现在离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不过一年多一点，我们就战胜了第二国际。现在苏维埃思想不仅在各文明国家的工人当中已经传播开来，他们不仅已经知道、已经懂得了这种思想。一切国家的工人都在嘲笑那些自作聪明的人，这些人当中有不少人自命为社会党人，以学者或准学者的态度，象好讲体系的德国人那样谈论什么苏维埃“体系”，或者象英国“基尔特”社会主义者[5]那样谈论什么苏维埃“思想”。这种关于苏维埃“体系”和“思想”的议论，在工人当中往往会混淆视听，引起思想上的混乱。但是，工人现在正在抛弃这种学究式的无稽之谈，拿起苏维埃给他们的武器。苏维埃的作用和意义在东方各国也普遍地为人们所了解了。

在整个东方，在整个亚洲，在一切殖民地人民当中，苏维埃运动都已经打下了基础。

被剥削者必须奋起推翻剥削者，建立自己的苏维埃，这并不是十分复杂的道理。在有了我国的经验之后，在俄国建立苏维埃共和国两年半之后，在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全世界亿万被剥削被压迫的群众都懂得了这个道理。现在我们俄国由于比国际帝国主义弱，常常不得不实行妥协，等待时机，可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在维护 125000 万人的利益。暂时我们的前进道路上还有绊脚石，还有偏见和无知这样的障碍，但是这些正在迅速地被克服，愈往后，我们愈能真正代表和维护占世界人口 70%的被剥削劳动者的利益了。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实际上只是在进行宣传，只是向全世界无产阶级提出基本的思想，只是在发出斗争的号召，我们还只是在了解什么地方有人能走这条路；而现在，我们到处都有了先进的无产阶级，到处都有了无产阶级大军，虽然有时组织得不好，还需要改组。既然各国的同志们现在都在帮助我们组织一支统一的大军，那么任何缺点都阻碍不了我们去完成我们的事业。这个事业就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事业，就是建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的事业。（长时间鼓掌）

注释：

[1]这是有关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一组文献。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于 1920 年 7 月 19 日—8 月 7 日举行（开幕式于 7 月 19 日在彼得格勒举行，以后的会议从 7 月 23 日起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有来自 37 个国家的 67 个组织（其中有 27 个共产党）的 217 名代表。法国社会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派代表列席大会，有发言权。代表大会的全部筹备工作是在列宁的领导下进行的。他在会前写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对规定共产国际的任务和制定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起了重要的作用。列宁以俄共（布）代表团成员身分出席大会，被选入了主席团。

代表大会的议程包括：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基本任务；共产党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作用和结构；工会和工厂委员会；议会斗争问题；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土地问题；对新中派的立场和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共产国际章程；组织问题（合法与不合法组织、妇女组织等等）；青年共产主义运动；选举；其他事项。为了预先审议议程上的重大问题，在 7 月 24 日举行的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成立了 6 个委员会：工会运动委员会、议会斗争委员会、土地问题委员会、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任务委员会、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制定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委员会。

代表大会将列宁起草的《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作为大会决议予以批准。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代表大会通过了以列宁的初稿为基础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和《民族和殖民地问题补充提纲》。在土地问题上，代表大会通过了以列宁提纲为基础的决议。代表大会非常注意共产党争取和领导劳动群众的问题，它谴责了左倾学理主义，通过了《共产党和议会斗争》、《工会运动、工厂委员会和第三国际》等决议。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的决议指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解放的主要的和基本的武器；共产党的作用在工人阶级夺得政权以后不但没有缩小，相反还无比地增大了。代

表大会通过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这一文件对于在革命纲领基础上巩固共产党和防止机会主义的和中派的政党钻入共产国际具有重大的作用。代表大会还批准了共产国际的章程，通过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和一系列号召书。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奠定了共产国际的纲领的、策略的和组织的基础，对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重大意义。——205。

[2]《泰晤士报》(《TheTimes》)是英国的一家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785 年 1 月 1 日在伦敦创刊。原名《每日天下纪闻》，1788 年 1 月改称《泰晤士报》。——211。

[3]《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部通报》(《ВестникНародноГоКомиссариатапоИностраннымДеламРСФСР》)是苏维埃俄国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机关刊物，1919 年 6 月 20 日—1922 年 6 月在莫斯科出版。格·瓦·契切林、米·尼·波克罗夫斯基、费·阿·罗特施坦等参加过该刊的工作。——211。

[4]指在革命群众压力下退出了伯尔尼国际的各国中派社会党正在筹建的国际组织。这一组织在 1921 年 2 月 22—27 日举行的维也纳代表会议上成立，通称第二半国际或维也纳国际，正式名称是国际社会党联合会。参加这一组织的有英国独立工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等 10 多个中派社会党以及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弗·阿德勒任总书记。成立第二半国际的真正目的是阻碍广大群众转向共产国际。第二半国际的领袖们(阿德勒、奥·鲍威尔、罗·格里姆、阿·克里斯平、让·龙格、尔·马尔托夫、维·米·切尔诺夫等）口头上批评第二国际，实际上在无产阶级运动的一切主要问题上都执行机会主义的中派路线。1923 年 5 月，在革命浪潮开始低落的形势下，第二半国际同伯尔尼国际合并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212。

[5]“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基尔特”是拉丁语“gilda”一词的音译，意为“行会”）是20世纪初在英国工人运动中出现的改良主义派别，创始人是费边社成员乔·科尔、阿·约·彭蒂等。1914年，该派建立了“基尔特”全国联盟，制定了“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纲领。“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否认国家的阶级性，在工人中散布可以不通过阶级斗争而摆脱剥削的幻想。他们提出在现有工联的基础上由工人、工程技术人员按行业组成“基尔特”来管理工业生产，实行“产业民主”、“产业自治”，并由国家来负责产品分配和保证全民的消费，认为这样一来就能和平地消灭资本主义，使劳动者得到解放。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为了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相对抗，特别起劲地宣传他们的理论。20年代，“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影响逐渐消失。——222。

3 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1]

同志们，我只简短地讲几句开场白，然后，由我们委员会过去的秘书马林同志向你们详细地报告我们对提纲所作的修改。在他之后，补充提纲的起草人罗易同志也要发言。我们委员会一致通过了修改后的提纲初稿［注：见本卷第159—166页。——编者注］和补充提纲。这样，我们在一切最重要问题上完全取得了一致的意见。现在，我就来作几点简短的说明。

第一，我们提纲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思想是什么？就是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之间的区别。同第二国际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相反，我们强调这种区别。在帝国主义时代，对于无产阶级和共产国际来说，特别重要的是：弄清具体的经济事实；在解决一切殖民地和民族问题时，不从抽象的原理出发，而从具体的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出发。

帝国主义的特点，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就是现在全世界已经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另一部分是少数几个拥有巨量财富和强大

军事实力的压迫民族。世界人口的大多数属于被压迫民族，他们的总数在 10 亿人以上，大概是 125000 万人。我们把世界总人口按 175000 万计算，他们就占世界人口的 70％左右，他们有些处于直接的殖民地附属地位，有些是象波斯、土耳其、中国这一类的半殖民地国家，还有一些则是被帝国主义大国的军队打败，由于签订了和约而深深地陷入依附于该国的地位。把各民族区别、划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这个思想贯串着整个提纲，不仅由我署名的、以前发表过的第一个提纲是这样，罗易同志的提纲也是这样的。后一个提纲主要是根据印度和亚洲其他受英国压迫的大民族的情况写成的，因此，对我们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我们提纲的第二个指导思想就是：在目前的世界形势下，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后，各民族的相互关系、全世界国家体系，将取决于少数帝国主义国家反对苏维埃运动和以苏维埃俄国为首的各个苏维埃国家的斗争。如果忽略了这一点，我们就不能正确地提出任何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哪怕它涉及的是世界上一个最遥远的角落。无论是文明国家的共产党，还是落后国家的共产党，都只有从这种观点出发，才能正确地提出和解决各种政治问题。

第三，我想特别强调一下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问题。正是这个问题引起了某些意见分歧。我们争论的问题是：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应该支持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这样说在原则上和理论上是否正确。讨论结果我们一致决定：不提“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而改提民族革命运动。毫无疑问，任何民族运动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因为落后国家的主要居民群众是农民，而农民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关系的体现者。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如果它一般地说能够在这类国家里产生的话）不同农民运动发生一定的关系，不在实际上支持农民运动，就能在这些落后国家里实行共产主义的策略和共产主义的政策，那就是空想。但是当时有人反对说，要是我们提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那就抹杀了改良主义运动和革命运动之间的一切区别。实际上，在落后国家和殖民地国家里，这种区

别最近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因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也极力在被压迫民族中培植改良主义运动。剥削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所以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往往是，甚至可以说在多数场合下都是一方面支持民族运动，另一方面又按照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意志行事，也就是同他们一起来反对一切革命运动和革命阶级。在委员会里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认为，唯有注意这种区别，把“资产阶级民主”这样的提法一般都改为“民族革命”才是正确的。我们这样修改，意思是说，只有在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真正具有革命性质的时候，在这种运动的代表人物不阻碍我们用革命精神去教育、组织农民和广大被剥削群众的时候，我们共产党人才应当支持并且一定支持这种运动。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共产党人在这些国家里就应该反对第二国际的英雄们这样的改良派资产阶级。殖民地国家已经有了改良主义的政党，这些党的代表人物有时也自命为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党人，上面指出的那种区别现在已经贯串在整个提纲里面了，我认为，这就更确切地表达了我们的观点。

此外，我还想对农民苏维埃问题发表一点意见。俄国共产党人在以前属于沙皇政府的殖民地里，在象土耳其斯坦这类落后国家里进行的实际工作，向我们提出过在资本主义前的条件下如何运用共产主义的策略和政策的问题，因为这些国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资本主义前的关系还占统治地位，因此，还谈不到纯粹的无产阶级运动。在这些国家里几乎没有工业无产阶级。尽管如此，我们在那里还是担负起了领导者的作用，并且也应该担负起领导者的作用。我们的工作表明，在这些国家里一定要克服巨大的困难，而我们工作的实际结果也表明，在这些几乎没有无产阶级的地方，尽管有这些困难，仍旧可以在群众中激发起独立思考政治问题、独立进行政治活动的愿望。这个工作对我们比对西欧国家的同志们更困难些，因为俄国无产阶级正忙于国家事务。显然，处于半封建依附状态的农民能够出色地领会建立苏维埃组织这一思想，并把它付诸实现。同样明显的是，那些不

仅受商业资本剥削而且也受封建主和封建国家剥削的被压迫群众，在本国的条件下也能够运用这种武器，这种组织形式。建立苏维埃组织这一思想很简单，不仅可以应用于无产阶级的关系，而且可以应用于农民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关系。我们在这方面的经验暂时还不很丰富，但是委员会里有几个殖民地国家的代表参加的讨论，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在共产国际的提纲中必须指出：农民苏维埃、被剥削者苏维埃这种手段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也适用于还保留资本主义前的关系的国家；无论在落后国家或者在殖民地，普遍宣传建立农民苏维埃、劳动者苏维埃这一思想是各国共产党和准备建立共产党的人责无旁贷的义务；只要是条件允许的地方，都应该立即进行建立劳动人民苏维埃的尝试。

这样，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而又十分重要的领域。在这方面我们的共同经验暂时还不很丰富，但是我们会逐步地积累起更多的材料。毫无疑问，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能够也应该帮助落后国家的劳动群众，只要各苏维埃共和国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向这些群众伸出手来，并且能够支持他们，落后国家的发展就能够突破它们目前所处的阶段。

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不但对我署名的提纲，而且更多地对罗易同志起草的提纲进行了相当热烈的讨论（罗易同志还要在这里对他那个提纲作些说明），并且一致通过了对后一个提纲的一些修正。

问题是这样提出的：目前正在争取解放、而战后已经有了进步运动的落后民族的国民经济必然要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种说法究竟对不对。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如果胜利了的革命无产阶级对落后民族进行系统的宣传，而各苏维埃政府以其所拥有的一切手段去帮助它们，那么，说落后民族无法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就不对了。在一切殖民地和落后国家，我们不仅应该组成能够独立进行斗争的基干队伍，即党的组织，不仅应该立即宣传组织农民苏维埃并使这种苏维埃适应资本主义前的条件，而且共产国际还应该指出，还应该从理论上说

明，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

必须采取什么手段才能达到这个目的——这不可能预先指出。实际经验将会给我们启示。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建立苏维埃这一思想对于最遥远的民族中的全体劳动群众是很亲切的，苏维埃这种组织一定能够适应资本主义前的社会制度的条件，共产党应该立刻在全世界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我还想指出，共产党不仅在本国，而且在殖民地国家，特别是在剥削民族用来控制殖民地各民族的军队中进行革命工作具有很大的意义。

英国社会党的奎尔奇同志在我们委员会里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一个普通英国工人会认为，援助被奴役的民族举行起义反对英国的统治是背叛行为。的确，有琼果主义[2]和沙文主义情绪的英、美工人贵族是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人，是第二国际最有力的支柱。的确，属于这个资产阶级国际的那些领袖和工人实行过最大的背叛。第二国际也讨论过殖民地问题。在巴塞尔宣言[3]中关于这个问题也说得十分清楚。第二国际各党也曾表示要本着革命精神进行工作，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第二国际各党做了什么真正的革命工作，也没有看到它们援助过被剥削附属民族所举行的反对压迫民族的起义，我认为，多数已经退出第二国际而希望加入第三国际的党也是如此。我们应当公开地说出这一点，这是无法驳倒的。我们要看看，有没有人想来反驳。

我们草拟决议时就是把这些看法作为基础的。这些决议无疑是太长了些，但是我相信它们毕竟是有用处的，它们将有助于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开展和组织真正的革命工作，而这正是我们的主要任务。

注释：

[1]这是列宁代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所作的报告。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成立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由英国、奥地利、保加利亚、匈牙利、德国、荷兰、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爱尔兰、中国、朝鲜、墨西哥、俄国、美国、土耳其、法国、南斯拉夫等国的代表共 20 人组成。委员会于 1920 年 7 月 25 日讨论了列宁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对提纲稍作修改，于 7 月 26 日提交大会审议。提纲经代表大会第四次和第五次全体会议讨论后，于 7 月 28 日通过。此外，委员会和代表大会全体会议还讨论和通过了马·纳·罗易的补充提纲。——229。

[2]琼果主义即极端沙文主义。19 世纪 70 年代俄土战争期间，在英国流行过一首好战的军国主义歌曲，其歌词中反复出现“byJingo”（音译“琼果”）一语，意即“以上帝的名义起誓”。“琼果”后来就成了表示极端沙文主义情绪的专用名词。——234。

[3]巴塞尔宣言即 1912 年 11 月 24—25 日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人非常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国际局势和社会民主党反对战争危险的统一行动》决议，列宁所引的德文本称《国际关于目前形势的宣言》。宣言谴责了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备战活动，揭露了即将到来的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号召各国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宣言斥责了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号召社会党人为反对一切压迫小民族的行为和沙文主义的表现而斗争。宣言写进了 1907 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决议中列宁提出的基本论点：帝国主义战争一旦爆发，社会党人就应该利用战争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234。

4 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发言[1]

同志们！塞拉蒂说，我们还没有发明“sincéromètre”。这是法文的一个新词，意思是诚实测量器。这种器具还没有发明，我们也不需要这种器具，我们已经有

了测定方向的工具。塞拉蒂同志的错误就在于他不去使用这种早已为人所知的工具。关于他的错误，我以后再谈。

关于克里斯平同志，我只想说几句话。很遗憾，他今天没有到会。（迪特曼：“他病了！”）真可惜。他的发言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文件，它确切地反映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右翼的政治路线。我要说的不是个人的和个别的情况，而是克里斯平的发言中明确表述出来的思想。我想，我能够证明这个发言是彻头彻尾的考茨基式的发言，克里斯平同志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看法完全和考茨基相同。克里斯平在答复一句插话时说：“专政不是什么新东西，爱尔福特纲领中就提到过。”爱尔福特纲领根本没有谈到无产阶级专政，而且历史证明这并不是偶然的。当我们在1902—1903 年制定我们党的第一个纲领时，我们一直在借鉴爱尔福特纲领，而且普列汉诺夫，正是普列汉诺夫当时说得很对：“不是伯恩施坦埋葬社会民主党，就是社会民主党埋葬他。”［注：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1961 年三联书店版第 2 卷第 418 页。——编者注］说这句话的普列汉诺夫特别强调的正是这样一点：爱尔福特纲领没有谈到无产阶级专政，这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在实践上是胆怯地向机会主义者让步。所以从 1903 年起，我们就把无产阶级专政写进了我们的纲领。［注：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7 卷《附录》。——编者注］

克里斯平同志现在说，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什么新东西，又说，“我们一直主张夺取政权”，这就是回避问题的实质。承认夺取政权，但是不承认专政。所有的社会党文献，不管是德国的还是法国和英国的都证明，各机会主义政党的领袖，如英国的麦克唐纳，都是赞成夺取政权的。他们可真不简单，都是真诚的社会党人，但是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既然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不愧称为共产党的革命政党，那就应该与第二国际的旧观点有所区别，就应该宣传无产阶级专政。克里斯平同志却抹杀了这一点，掩盖了这一点，这就是所有考茨基的信徒所犯的基本错误。

克里斯平同志又说：“我们是群众选出来的领袖。”这是形式主义的不正确的看法，因为在德国“独立党人”的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了派别的斗争。不需要象塞拉蒂同志那样去寻找诚实测量器，去开这个玩笑，就能确定一个简单的事实，即派别的斗争必然存在，而且确实存在。一派是刚转到我们这边来的革命工人，他们反对工人贵族；另一派是工人贵族，即在各文明国家里以老领袖为首的工人贵族。克里斯平究竟属于老领袖和工人贵族一派呢，还是属于反对工人贵族的新的革命工人群众一派呢？正是对这个问题克里斯平同志没有交代清楚。

克里斯平同志在谈到分裂问题时用的是什么腔调呢？他说分裂是一种痛苦的必然，并且为此伤心了好久。这同考茨基的表现 完全吻合。究竟是同谁分裂了呢？同谢德曼吗？是的！克里斯平说，“我们分裂了”。第一，你们分裂得太迟了！既然谈到这个问题，就只能这么说。第二，独立党人不应该为这种事情伤心，而应该说：国际工人阶级还在受工人贵族和机会主义分子的压制。法国和英国的情形都是这样。克里斯平同志对分裂问题的想法不是共产党人的想法，而同似乎不再有影响的考茨基的想法完全一致。接着克里斯平谈到高工资问题。他说，同俄国工人以至东欧工人比较起来，德国工人的生活相当好。照他的说法，革命只有在它“不过分”使工人生活状况恶化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试问，在共产党内能容许用这种腔调说话吗？这是反革命的腔调。我们俄国的生活水平无疑比德国低，在我们建立了专政以后，工人反而更挨饿了，生活水平更低了。没有牺牲，没有工人生活状况的暂时恶化，工人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应当向工人说的，正好同克里斯平说的相反。如果想使工人为建立专政作好准备，又同他们谈什么生活状况“不过分”恶化，那就是忘记了一个主要的情况：帮助“本国的”资产阶级用帝国主义方法争夺和压迫整个世界，以便得到优厚的工资，工人贵族正是这样产生的。如果德国工人现在想开创革命事业，就应该忍受牺牲，不怕牺牲。

在落后的国家里，一个中国式的苦力不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这种说法从一般的世界历史的观点来看，是正确的；但是，在少数比较富有的国家里，由于帝国主义掠夺而生活比较好，如果对工人说他们应当提防“过分”变穷，那就是反革命。应当反过来说。工人贵族害怕牺牲，担心在革命斗争中会“过分”变穷，他们是不能加入党的。否则，专政就不可能建立，尤其是在西欧各国。

克里斯平关于恐怖手段和暴力说了些什么呢？他说，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在社会学教科书里，也许可以把二者区分开来，可是，在政治实践中，尤其是在德国的情况下，却不能这样做。对杀害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德国军官，对施汀尼斯和克虏伯这样收买报刊的人，我们就不得不使用暴力和恐怖手段。当然，没有必要预先宣布我们一定要采取恐怖手段；但是，如果德国军官和卡普分子还是和今天一样，如果克虏伯和施汀尼斯还是和今天一样，那么使用恐怖手段就是不可避免的。不管是考茨基，还是累德堡或克里斯平，都完全以反革命的观点来谈暴力和恐怖手段。抱有这种思想的党不能参加专政，那是很明显的。

还有一个土地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克里斯平特别激动，他想斥责我们是小资产阶级。他的意思是从大土地占有者那里搞点东西来给小农，便是小资产阶级味道。应该剥夺大土地占有者，而把土地交给协作社。这种看法太学究气了。就是在高度发达的国家里，包括德国在内，也有相当数量的大地产，这种地产不是用大资本主义方式而是用半封建方式耕种的，可以在不破坏农场的情况下把这种土地分一部分给小农。可以在保存大生产的同时把对小农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东西分给他们一些。很遗憾，他们没有想到这一点，可是实际上又不得不这样做，否则就要犯错误。例如，瓦尔加（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前国民经济人民委员）的书就证明了这一点，他写道，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匈牙利农村几乎没有起什么变化，日工没有感到什么好处，小农也没有得到什么东西。匈牙利有很多大地产，匈牙利的一些大块土地是用半封建方式经营的。在这些大地产中，总是能找出而

且应该找出一部分土地来分给小农（可以不归小农私有，而是租给他们），使拥有小块土地的小农可以得到一份没收来的土地。否则，小农就看不出苏维埃专政同实行专政前有什么区别。如果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不实行这种政策，那它就维持不下去。

虽然克里斯平说，“你们不能否认我们有革命信念”，但是我要回答说：我就坚决否认你们有革命信念。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们不愿意按革命方式行动，而是说你们不善于用革命观点考虑问题。假如选出一些有学识的人组成一个委员会，给他们考茨基的 10 本书和克里斯平的这篇讲话，那么我敢担保，这个委员会一定会说：这篇讲话完全是考茨基主义的，从头到尾贯串着考茨基的思想。克里斯平的一切论证方法彻头彻尾是考茨基式的，可是克里斯平却出来说：“考茨基在我们党内再也没有什么影响了。”也许，对后来入党的革命工人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应该承认一个确凿的事实：考茨基直到现在，对克里斯平同志，对他的整个思路、对他的一切观念，都还有很大的影响。克里斯平的讲话就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不必发明什么诚实测量器，就可以说：克里斯平的方向是不符合共产国际的方向的。我们说明这一点，也就规定了整个共产国际的方向。

怀恩科普和明岑贝格同志因为我们邀请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并且同它的代表谈话而表示不满，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当考茨基反对我们而且还写书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把他当作阶级敌人同他论战。可是独立社会民主党（该党现在已经由于大批革命工人的加入而壮大起来）到这里来谈判，我们就应该同他们的代表谈，因为他们代表着一部分革命工人。关于共产国际问题，我们同德国“独立党人”、法国人、英国人是不能一下子讲通的。怀恩科普同志的每一次发言都证明，他几乎完全同意潘涅库克同志的一切错误意见。怀恩科普说，他不赞成潘涅库克的观点，但是他的发言却证明完全不是这样。这就是这个“左派”集团的基本错误，不过，这是无产阶级运动发展过程中的错误。克里斯平和迪特曼同志的发言

全部贯串了资产阶级观点，抱着这种观点是无法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好准备的。如果怀恩科普和明岑贝格同志在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问题上走得还要远的话，那我们就不能同意了。

当然，我们没有象塞拉蒂所说的那种诚实测量器来测验一个人是否诚实。我们完全同意，问题不在于对人的判断，而在于对形势的估计。很可惜，塞拉蒂虽然说了话，可是没有说出什么新东西来。他的发言同我们在第二国际那里听到的一样。

塞拉蒂说，“法国的形势不是革命的形势，德国的形势是革命的，意大利的也是革命的”，他说得不对。

即使是反革命的形势，第二国际不愿意组织革命的宣传和鼓动，那也是犯了错误，有很大的过错，因为，即使没有革命的形势，也可以而且应该进行革命宣传。布尔什维克党的全部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社会党人不愿意象我们那样在任何形势下都进行工作，就是说不愿意进行革命工作，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差别就在这里。

塞拉蒂只是重复了克里斯平的话。我们不想说，哪天哪天一定要开除屠拉梯。这个问题执行委员会已经谈过了，可是塞拉蒂对我们说：“清党可以，但是不要驱逐任何人出党。”我们应当直率地告诉意大利的同志们，同共产国际的方向符合的，是“新秩序”派，而不是社会党和它的议会党团现在的领导者多数。后者硬说，他们想保卫无产阶级不受反动势力的摧残。俄国的切尔诺夫、孟什维克和其他很多人，也在“保卫”无产阶级不受反动势力的摧残，然而这还不能作为让他们加入我们队伍的根据。

因此，我们应当告诉意大利的同志们和一切有右翼的党：这种改良主义倾向与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我们请你们意大利的同志们召集一次代表大会，在会上提出我们的提纲和决议。我相信，意大利的工人是愿意留在共产国际里的。

注释：

[1]这是列宁在 1920 年 7 月 30 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就加入共产国际条件问题所作的发言。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成立的制定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委员会由保加利亚、荷兰、德国、匈牙利、俄国、美国、奥地利等国共产党以及法国共产主义小组、瑞士社会党左派、爱尔兰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共 11 人组成。列宁参加了该委员会的工作。委员会讨论了列宁草拟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见本卷第 198—203、204 页）这一文件。7 月 29 日和 30 日，代表大会第六、七、八次全体会议讨论了委员会的报告和它提出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提纲。代表大会通过了提纲，并决定把所有的补充和修改意见交委员会审订。加入共产国际的 21 项条件的定稿在 8 月 6 日代表大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以绝对多数（两票反对）通过。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

（1920 年 7-8 月）

1．资产阶级民主由它的本性所决定的一个特点就是抽象地或从形式上提出平等问题，包括民族平等问题。资产阶级民主在个人平等的名义下，宣布有产者和无产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形式上或法律上的平等，用这种弥天大谎来欺骗被压迫阶级。平等思想本身就是商品生产关系的反映，资产阶级借口个人绝对平等，把这种思想变为反对消灭阶级的斗争工具。要求平等的实际含义只能是要求消灭阶级。

2．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争取推翻资产阶级压迫的斗争的自觉代表，它的基本任务是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揭露资产阶级民主的欺骗和虚伪，因而在民族问题上也不应当把抽象的和形式上的原则当作主要之点，主要之点应当是：第一，准确地估计具体的历史情况，首先是经济情况；第二，把被压迫阶级、被剥削劳动者的利益，同笼统说的民族利益这样一种意味着统治阶级利益的一般概念，明确地区分开来；第三，把被压迫的、附属的、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同压迫的、剥削的、享有充分权利的民族也明确地加以区分。这同资产阶级民主的谎言是截然相反的，这种谎言掩盖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时代所特有的现象，即为数无几的最富裕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大多数人实行殖民奴役和金融奴役。

3．1914-1918 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在全世界各民族和被压迫阶级面前，特别清楚地揭示了资产阶级民主词句的欺骗性。交战双方都以人民解放和民族自决权这类花言巧语作掩饰，然而这场战争却表明，战胜国的资产阶级是如何根据自己的经济利益，一方面利用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条约和布加勒斯特条约，另一方面利用凡尔赛和约和圣-日尔曼和约，毫不客气地来划定“国家”边界的。就连“国家”边界也成了资产阶级的交易品。所谓国际联盟，只不过是此次战争中的战胜

国相互保证其战利品的一种保险合同。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恢复民族国家统一和“收复被割让的国土”的愿望，只不过是战败国企图为发动新战争而集结力量的一种阴谋。使人为地分裂的民族重新统一起来，这多少也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但是，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革命斗争和打倒资产阶级，才能得到真正的民族自由，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统一。国际联盟和帝国主义协约国战后的全部政策更清楚更突出地揭示了这一真理，它们加剧了先进国无产阶级和殖民地、附属国的一切劳动群众的革命斗争，使所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民族和平共处和一律平等的市侩的民族主义幻想更快地破灭。

4．从上述基本原理中可得出结论：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彼此接近，以便为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共同进行革命斗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战胜资本主义。而不战胜资本主义，就不能消灭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的现象。

5．目前的世界政治形势已把无产阶级专政提上了日程，世界政治中的一切事变都必然围绕着一个中心点，就是围绕世界资产阶级反对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而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必然一方面要团结各国先进工人的苏维埃运动，另一方面要团结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一切民族解放运动。这些民族根据自己的痛苦经验深信，只有与革命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只有苏维埃政权战胜世界帝国主义，他们才能得救。

6．因此，目前不能局限于空口承认或空口提倡各民族劳动者互相接近，必须实行使一切民族解放运动和一切殖民地解放运动同苏维埃俄国结成最密切的联盟的政策，并且根据各国无产阶级中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程度，或根据落后国家或落后民族中革命解放运动发展的程度，来确定这个联盟的形式。

7．联邦制是各民族劳动者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无论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同其他苏维埃共和国（过去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芬兰苏

维埃共和国、拉脱维亚苏维埃共和国，现在的阿塞拜疆苏维埃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的关系中，还是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部同从前既没有成立国家又没有实行自治的各民族（例如，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1919 年建立的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1920 年建立的鞑靼自治共和国）的关系中，联邦制都已经在实践上表明它是适当的。

8．共产国际在这方面的任务是，进一步地发展、研究以及通过实际来检验在苏维埃制度和苏维埃运动基础上所产生的这些新的联邦国家。既然承认联邦制是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那就必须力求建立愈来愈密切的联邦制同盟，第一，因为没有各苏维埃共和国最密切的联盟，就不能捍卫被军事上无比强大的世界帝国主义列强所包围的各苏维埃共和国的生存；第二，因为各苏维埃共和国之间必须有一个密切的经济联盟，否则就不能恢复和发展被帝国主义所破坏了的生产力，就不能保证劳动者的福利；第三，因为估计到建立统一的、由各国无产阶级按总计划调整的完整的世界经济的趋势，这种趋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已经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必然会进一步发展而臻于完善。

9．在国家内部关系方面，共产国际的民族政策决不能只限于空洞地、形式地、纯粹宣言式地、实际上却不负任何责任地承认民族平等，就像资产阶级民主派所做的那样。这些人不管是坦率地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或者是像第二国际的社会党那样，借社会党人的称号来掩饰自己，都是一样的。

不仅在各国共产党的全部宣传鼓动工作（议会讲坛上和议会讲坛外的宣传鼓动）中，应当不断地揭露各资本主义国家违背本国的“民主”宪法，经常破坏民族平等，破坏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种种事实，而且还必须做到：第一，经常解释，只有在反资产阶级的斗争中首先把无产阶级、然后把全体劳动者联合起来的苏维埃制度，才能实际上给各民族以平等；第二，各国共产党必须直接帮助附属的或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例如爱尔兰、美国黑人等）和殖民地的革命运动。

没有后面这个特别重要的条件，反对压迫附属民族和殖民地的斗争以及承认他们有国家分离权就仍然是一块假招牌，正像我们在第二国际各党那里看到的一样。

10．只在口头上承认国际主义，而事实上在全部宣传、鼓动和实际工作中却用市侩民族主义与和平主义偷换国际主义，这不仅是第二国际各政党中最常见的现象，而且也是那些已经退出这个国际的各政党中，甚至是现在往往自称为共产党的那些政党中最常见的现象。把无产阶级专政由一国的（即存在于一个国家的、不能决定全世界政治的）专政转变为国际的专政（即至少是几个先进国家的、对全世界政治能够起决定影响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越迫切，同最顽固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偏见（它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形式，如种族仇恨、民族迫害、反犹太主义）这种祸害的斗争就越会提到首要地位。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宣称，只要承认民族平等就是国际主义，同时却把民族利己主义当作不可侵犯的东西保留下来（更不用说这种承认纯粹是口头上的）；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第一，要求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服从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二，要求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有决心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

因此，在已经完全是资本主义的、拥有真正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工人政党的国家中，首要的任务就是同歪曲国际主义的概念和政策的机会主义和市侩和平主义作斗争。

11．对待封建关系或宗法关系、宗法农民关系占优势的比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应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1）各国共产党必须以实际行动援助这些国家的革命解放运动，而援助的方式应与各该国共严党（如果有共产党的话）协商确定。把落后国家沦为殖民地或在财政上加以控制的那个国家的工人，首先有义务给予最积极的援助；

（2）必须同僧侣、基督教会和其他类似分子的中世纪式的反动的影响作斗争；

（3）必须同那些企图利用反欧美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来加强土耳其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贵族、大地主、僧侣等势力的泛伊斯兰主义、泛亚细亚运动和其他类似的思潮作斗争 ；

（4）必须特别援助落后国家中反对地主、反对大土地占有制、反对各种封建主义现象或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运动，竭力使农民运动具有最大的革命性。在可能的地方，把农民和一切被剥削者联合在苏维埃之中，从而使西欧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与东方各殖民地以至一切落后国家的农民革命运动结成尽可能密切的联盟；

（5）必须坚决反对把落后国家内的并非真正共产主义的革命解放思潮涂上共产主义的色彩；共产国际援助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革命运动，只能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是各落后国家中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名义上是共产党）的成员已在集结起来，并且认识到同本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作斗争是自己的特殊任务；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达成临时协议，甚至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它们融合，要绝对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即使这一运动还处在最初的萌芽状态也应如此。

（6）必须坚持不懈地向一切国家，特别是落后国家和落后民族的最广大的劳动群众说明并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一贯进行的欺骗，即借助于被压迫国家的特权阶级，打着建立政治上独立的国家的幌子，来建立在经济、财政和军事上完全依附于它们的国家。协约国帝国主义勾结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对被压迫民族劳动群众实行欺骗的明显例子，便是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在巴勒斯坦所干的勾当。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打着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的幌子，把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劳动人民（其中犹太劳动者只占极少数）变成被英国剥削的牺牲品。在目前国际形势下，除了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联盟，附属民族和弱小民族别无生路。

12．帝国主义列强历来对殖民地和弱小民族的压迫，在被压迫国家劳动群众的心中不仅播下了仇恨，而且播下了对整个压迫民族包括对这些民族的无产阶级的不信任。这些民族的无产阶级的多数正式领袖，在 1914—1919 年背叛社会主义的卑鄙行径（社会爱国主义者借口“保卫祖国”来保卫“本国”资产阶级压榨殖民地和掠夺财政上不独立的国家的“权利”），不能不加深这种完全合乎情理的不信任心理。既然不信任心理和民族偏见，只有在各先进国家内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消灭以后，只有在落后国家的经济生活全部基础急剧改变以后才能消逝，那么这些偏见的消逝，就不能不是极其缓慢的。因此，各国有觉悟的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对于受压迫最久的国家和民族的民族感情残余必须坚持特别小心谨慎的态度。同样，为了更快地消除上述不信任心理和偏见，必须作出一定的让步。没有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无产阶级以至全体劳动群众自愿要求结盟和统一的愿望，战胜资本主义这一事业是不能顺利完成的。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

（1920 年 7-8 月）

1．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就是更具体地确定共产国际与资本帝国主义统治的国家（例如中国与印度）中的革命运动之间的关系。在当前世界革命历史的发展阶段，必须正确理解这种关系。欧洲大战及其结果清楚地表明：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的集中，欧洲以外被压迫各国的人民群众与欧洲无产阶级运动就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了，殖民地军队和大批工人队伍在大战期间被派往前线，就是例证。

2．欧洲资本主义汲取主要力量的主要来源之一就是殖民地和附属国。欧洲资本主义大国不控制广大的殖民地市场和广阔的殖民地剥削场所，就无法继续生存。英国这个帝国主义堡垒，100 多年来就一直遭受生产过剩的痛苦。没有为销售商品和供给本国不断发展的工业所需原料而必不可少的广大殖民地，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早就自行垮台了。只是因为英国帝国主义仍在奴役亚洲和非洲千百万居民，才迫使英国无产阶级不得不暂时服从资产阶级的统治。

3．从殖民地取得的超额利润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主要资金来源。不截断这种资金来源，欧洲工人阶级是难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目前，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正是通过扩大和加紧对殖民地劳动力与天然资源的剥削和掠夺，才得以避免破产。欧洲帝国主义靠剥削殖民地居民，贿赂宗主国的工人贵族。欧洲帝国主义一方面凭借附属国廉价劳动力所提供的产品，力图降低宗主国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只要能继续从殖民地取得超额利润，就甘愿牺牲它在宗主国的超额利润。

4．消灭殖民主义统治并在宗主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就能推翻欧洲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共产国际应当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共产国际应当与政治上经济

上受压迫国家中的决心推翻帝国主义的革命力量建立联系。为保证世界革命的彻底胜利，这两种力量必须采取共同的行动。

5．共产国际是世界革命无产阶级的意志的集中表现。它的使命是把全世界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第三国际是以联合全世界革命力量为己任的战斗组织。一小撮政客所领导的、中资产阶级文化毒素很深的第二国际，估计不到殖民地问题的全部重要性，看不到欧洲以外的世界。它不了解欧洲革命运动与非欧洲国家的革命运动相配合的必要性。第二国际的成员非但不给殖民地革命运动以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反而自己却成了帝国主义者。

6．东方各国人民由于遭受外国帝国主义的统治，而未能在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方面使他们［译文中，此处多出“不可能”三字。——校者注］达到欧美各国人民已经达到的水平。帝国主义政策是殖民地工业发展的绊脚石，因此，直到最近，殖民地才有了真正的无产阶级。当地的手工业被破坏了，代之以帝国主义国家的集中化工业；多数居民不得不重新务农，生产农产品和原料，以供出口。另一方面，土地迅速地集中于地主、资本家和官家手中，造成大批无地农民。殖民地的大多数居民处于愚昧无知的境地。这种政策在各殖民地被压迫人民群众中引起的愤懑，只是通过人数不多的中层知识分子表现出来。

外国的统治阻碍社会力量的自由发展，因此，殖民地开展革命首先就要推翻外国的统治。帮助殖民地推翻外国的统治，并不意味着支持当地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倾向，而只是给被压迫的殖民地无产阶级开辟解放的道路。

7．在附属国目前存在着两种相距日远的运动。一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民族主义运动，其纲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政治上的独立；另一种是贫穷无知的农民和工人争取摆脱一切剥削的群众性斗争。第一种运动企图控制第二种运动，并且往往得到一定的成功。共产国际及有关的政党应当反对这种控制，帮助殖民

地工人群众提高阶级觉悟。为推翻外国资本主义，实现殖民地革命的第一步，不妨同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分子进行合作。但首要的任务是建立共产党，因为只有共产党能组织农民和工人，带领他们进行革命和创立苏维埃共和国。可见，落后国家的人民群众不是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实现共产主义。

8．殖民地解放运动的实际力量，已不局限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民族主义者的狭小范围。多数殖民地已经建立起有组织的革命政党，它们努力同工人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共产国际应当通过这些政党或小组与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保持联系，因为它们是本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目前，它们的人数不多，但它们反映了群众的愿望，因此，群众将跟着它们干革命。帝国主义各国共产党应当与殖民地无产阶级政党密切协作，并通过它们，在道义上和物质上全力援助整个革命运动。

9．殖民地革命在初期并不是共产主义革命，然而，如果它从一开始就由共产主义先锋队来领导，革命群众就将逐渐获得革命经验，走上达到最终目的的正确道路。不言而喻，在许多东方国家，倘若力图按纯粹共产主义原则来解决土地问题，那就大错特错了。殖民地革命在其初期阶段，应当实行含有许多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要求的纲领，如分配土地等等。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殖民地革命的领导权应由资产阶级民主派来掌握。相反地，无产阶级政党应当经常大力宣传苏维埃思想，并且一有机会就建立工农苏维埃。这些苏维埃将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苏维埃政权一起，为彻底推翻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共同努力。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斯大林（1912 年底—1913 年初）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是斯大林于 1912 年底—1913 年初在维也纳写的，第一次发表在 1913 年《启蒙》杂志第 3—5 期上，署名科•斯大林，题为《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这篇论文于 1914 年由波涛出版社（彼得堡）出了单行本，书名为《民族问题和马克思主义》。按照沙皇政府内务大臣的命令，所有公共图书馆和阅览室都把它列为禁书。1920 年，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重印这一著作，把它编入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论文集》（图拉国家出版社版）。1934 年，这篇文章编入了斯大林的论文演说选辑《马克思主义和民族殖民地问题》。斯大林的这篇著作问世后，列宁对它作了很高的评价。在《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民族纲领》一文中，列宁在谈到民族问题在这个时期被提到显着地位的原因时写道："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献中，对于这种情况和社会民主党民族纲领的原则，最近已经作了阐明（在这方面首屈一指的是斯大林的论文）。"（《列宁全集》第 19 卷第 542 页）在有人提议把这篇文章当作讨论的文章时，列宁说："当然我们绝对反对。那篇文章写得很好。这是当前的重要问题，我们丝毫也不放弃反对崩得混蛋们的原则立场。"（《列宁全集》第 35 卷第 73 页）。

俄国的反革命时期不仅带来了"雷鸣电闪"，而且带来了对运动的悲观失望、对共同力量的怀疑顾虑。从前人们相信"光明的未来"，所以大家不分民族地共同进行斗争：共同的问题高于一切！后来人们心中发生了疑问，于是大家开始分手四散，回到民族的院落里去：让各人只靠自己吧！"民族问题"高于一切！

同时国内经济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05 年不是白白过去的：农村中的农奴制残余又受到了一次打击。连年饥荒之后的几次丰收和接着到来的工业高涨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农村中的分化和城市的发展，商业和交通的发展，都向前

迈进了一大步。这种情形在边疆地区尤其显着。可是这种情形不能不加速俄国各民族内部经济结合的过程。于是这些民族必然要行动起来……

这一时期所确立的“宪制”也在这方面起了唤醒各民族的作用。报纸和各种书刊的增多，出版事业和文化机关的某些自由，民族剧院的发展等等，无疑地都加强了“民族意识”。杜马及其选举运动和政治集团给各个民族的活跃造成了新的机会，给各个民族的动员提供了新的广阔场所。

可是从上层掀起的黩武的民族主义浪潮，“当权人物”由于边疆地区“爱好自由”而对它进行报复的种种高压手段，在下层激起了民族主义的反击浪潮，这种民族主义有时变成粗暴的沙文主义。犹太人中锡安主义（注：锡安主义　即犹太复国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末。它主张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是统一的犹太民族，有一致的民族利益，号召犹太人从世界各地回到巴勒斯坦重建国家。锡安是耶路撒冷的一座山，古犹太人曾以它作为政治和宗教的中心，锡安主义以此得名。在俄国，锡安主义为犹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一部分落后的犹太工人所拥护。1904年成立的俄国锡安主义社会工党认为，犹太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是为取得自己的领土并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而斗争。它鼓吹同犹太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在各民族的工人中间散布敌对情绪，妄图使犹太工人同俄国的和国际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隔离开来。锡安主义社会党人的民族主义活动模糊了犹太工人的阶级意识，给俄国工人运动带来了很大的危害。）的加强，波兰的沙文主义的增长，鞑靼人中的大伊斯兰主义（注：大伊斯兰主义是一种宗教政治思想。它宣传一切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联合成一个整体。十九世纪末，这种思想在东方各国的剥削阶级中间广泛传播。土耳其曾利用这种思想企图达到使全世界回教徒服从于土耳其苏丹这个“全体穆斯林的哈里发”的目的。列宁说，大伊斯兰主义是企图利用反欧美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来巩固可汗、地主、毛拉等的地位的一个派别（《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275 页）。），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乌克兰人中民族主义的加强，没有教养的人反犹太主义的共同倾向，——这一切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民族主义的浪潮日益汹涌地逼来，大有席卷工人群众之势。解放运动愈趋低落，民族主义的花朵就愈加怒放。

在这困难的关头，社会民主党负有崇高的使命：给民族主义一个反击，使群众同普遍的“时疫”隔离。因为社会民主党，而且只有社会民主党，才能负起这个使命，用久经考验的国际主义武器，用统一而不可分的阶级斗争去对抗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的浪潮来势愈汹涌，社会民主党争取俄国各民族无产者友爱团结的呼声就应当愈响亮。各边疆地区直接接触到民族主义运动的社会民主党人，在这一点上需要有特别的坚定性。

然而并非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首先是各边疆地区的社会民主党人，都能完成这个任务。崩得（注：崩得（依地语“Bund”一词的音译，意即联盟）是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的简称。崩得成立于 1897 年，参加者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1898 年 3 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 1903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在大会否决了这个要求以后，崩得退出了党。在 1906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崩得重新加入了党。崩得形式上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实际上是一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性质的组织。它在党内一直支持孟什维克，反对布尔什维克。它提出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同布尔什维克的民族自决权这个纲领性的要求相对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 年二月革命后，崩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8—1920 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崩得的领导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1921 年 3 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俄共（布）。）从前强调共同

的任务，现在却把它自己特殊的纯粹民族主义的目的放在首位，甚至把“过安息日”和“承认犹太语”当作自己竞选运动的战斗性条文（注：见《崩得第九次代表会议文件汇编》。）。高加索也步崩得的后尘：一部分高加索社会民主党人从前曾和其余的高加索社会民主党人一起否定过“民族文化自治”，现在他们却把它当作迫切的要求提了出来（注：见《八月代表会议的通报》。）。至于婉转地肯定民族主义动摇的取消派代表会议（注：取消派代表会议（八月代表会议）是 1912 年 8 月 12—20 日（公历 8 月 25 日—9 月 2 日）在维也纳召开的。列•达•托洛茨基在会上组织了反党的八月联盟。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崩得、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高加索区域委员会的代表，以及侨居国外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托洛茨基的维也纳《真理报》和前进集团的代表等。从俄国国内派遣代表的有彼得堡的“中央发起小组”以及取消派的《我们的曙光》杂志和《涅瓦呼声报》的编辑部。会议的绝大多数代表都是侨居国外的，与俄国工人阶级和地方党的组织毫无联系。会议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系列纲领性要求作了修改，并且反对秘密党的存在。），就更不用说了（注：见《八月代表会议的通报》。）。

由此可见，俄国社会民主党在民族问题上的观点并不是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都已经明白的。

显然，对于民族问题还必须进行一番认真的和全面的讨论。彻底的社会民主党人应当一致努力消除民族主义的迷雾，不管这种迷雾来自何方。

一　民族

民族（нация)是什么呢？

民族首先是一个共同体，是由人们组成的确定的共同体。

这个共同体不是种族的，也不是部落的。现今的意大利民族是由罗马人、日耳曼人、伊特拉斯坎人、希腊人、阿拉伯人等等组成的。法兰西民族是由高卢人、

罗马人、不列颠人、日耳曼人等等组成的。英吉利民族、德意志民族等也是如此，都是由不同的种族和部落的人们组成的。

总之，民族不是种族的共同体，也不是部落的共同体，而是历史上形成的人们的共同体。

另一方面，居鲁士帝国或亚历山大帝国虽然是历史上形成的，是由不同的部落和种族组成的，但无疑地不能称为民族。这不是民族，而是偶然凑合起来的、内部缺少联系的集团的混合物，其分合是以某一征服者的胜败为转移的。

总之，民族不是偶然的、昙花一现的混合物，而是由人们组成的稳定的共同体。

然而并非任何一个稳定的共同体都是民族。奥地利和俄国也是稳定的共同体，但是谁也不称它们为民族。民族的共同体和国家的共同体有什么区别呢？其中一个区别是民族的共同体非有共同的语言不可，国家却不一定要有共同的语言。奥地利境内的捷克民族和俄国境内的波兰民族不能没有各该民族的共同的语言，而俄国和奥地利内部有许多种语言的事实并不妨碍这两个国家的完整。当然，这里所指的是民众的口头语言，而不是官场的文牍语言。

总之，共同的语言是民族的特征之一。

当然不是说不同的民族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操着不同的语言，也不是说凡操着同一语言的人们一定是一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共同的语言，但不同的民族不一定要有不同的语言！没有一个民族会同时操着不同的语言，但并不是说不能有两个民族操着同一语言！英吉利人和北美利坚人操着同一语言，但他们毕竟不是一个民族。挪威人和丹麦人，英吉利人和爱尔兰人也是如此。

但是，象英吉利人和北美利坚人虽然有共同的语言，却不是一个民族，这是什么道理呢？

首先因为他们不是生活在一起，而是生活在不同的地域。只有经过长期不断的交往，经过人们世世代代的共同生活，民族才能形成起来。而长期的共同生活又非有共同的地域不可。从前英吉利人和美利坚人居住在一个地域，即居住在英国，所以当时是一个民族。后来一部分英吉利人从英国迁移到新的地域，迁移到美洲，于是在这个新的地域逐渐形成了新的民族，即北美利坚民族。由于有不同的地域，结果就形成了不同的民族。

总之，共同的地域是民族的特征之一。

但这还不够。单有共同的地域还不能形成民族。要形成民族，除此以外，还需要有内部的经济联系来把本民族中各部分结合为一个整体。英国和北美利坚之间没有这种联系，所以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民族。但是，假如北美利坚各地未因彼此分工、交通发达等等而联成一个经济上的整体，那么北美利坚人本身也就不配叫作民族。

就拿格鲁吉亚人来说吧。改革前时期（注：指格鲁吉亚废除农奴制的农民改革以前的时期。格鲁吉亚各地废除农奴制的时间不一致：梯弗利斯省在 1864 年，依麦列梯亚和古里亚在 1865 年，明格列里亚和列奇胡姆县在 1866 年，阿布哈兹在 1870 年，斯瓦涅季亚在 1871 年。）的格鲁吉亚人虽然生活在共同的地域，操着同一语言，可是严格说来，他们当时还不是一个民族，因为他们被分割成许多彼此隔离的公国，未能过共同的经济生活，长期互相混战，彼此破坏，往往假借波斯人和土耳其人的手来自相残杀。虽然有时某个侥幸成功的皇帝也曾勉强把各个公国统一起来，然而这种昙花一现的偶然的统一，至多也只是表面的行政上的统一，很快就因王侯跋扈和农民漠视而分崩离析了。而且在格鲁吉亚经济分散的情况下，也不能不这样……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格鲁吉亚才作为民族出现，因为当时农奴制度的崩溃和国内经济生活的发展，交通的发达和资本主义的产生，使

格鲁吉亚各个地区之间实行了分工，彻底打破了各个公国在经济上的闭关自守状态，而把这些公国联成一个整体。

其它一切度过了封建主义阶段并发展了资本主义的民族也是如此。

总之，共同的经济生活、经济上的联系是民族的特征之一。

但这还不够。除了上面所说的一切，还必须注意到结合成一个民族的人们在精神面貌上的特点。各个民族之所以不同，不仅在于它们的生活条件不同，而且在于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方面的精神面貌不同。英吉利、北美利坚和爱尔兰虽然操着同一种语言，但终究是三个不同的民族，它们历代因生存条件不同而形成的特殊的心理素质，在这一点上是起了不小的作用的。

当然，心理素质本身，或者象人们所说的“民族性格”本身，在旁观者看来是一种不可捉摸的东西，但它既然表现在一个民族的共同文化的特点上，它就是可以捉摸而不应忽视的东西了。

不用说，“民族性格”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生活条件变化的，但它既然存在于每个一定的时期内，它就要在民族面貌上打上自己的烙印。

总之，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的特征之一。

这样，我们就说完了民族的一切特征。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同时，不言而喻，民族也和任何历史现象一样，是受变化规律支配的，它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始末。

必须着重指出，把上述任何一个特征单独拿来作为民族的定义都是不够的。不仅如此，这些特征只要缺少一个，民族就不成其为民族。

假定有一些人具有共同的“民族性格”，但是他们在经济上彼此隔离，生活在不同的地域，操着不同的语言等等，那么还是不能说他们是一个民族。例如俄国

的、加里西亚的、美国的、格鲁吉亚的和高加索山区的犹太人就是如此，在我们看来，他们并不是统一的民族。

假定有一些人具有共同的地域和共同的经济生活，但是他们没有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民族性格”，那么他们仍然不是一个民族。例如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的德意志人和拉脱维亚人就是如此。

最后，挪威人和丹麦人虽然操着同一语言，可是由于缺少其它特征，他们也就不是一个民族。

只有一切特征都具备时才算是一个民族。

也许有人会觉得“民族性格”不是民族的特征之一，而是民族的唯一本质的特征，其它一切特征其实都是民族发展的条件，而不是民族的特征。例如有名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民族问题理论家鲁•施普林格，特别是奥•鲍威尔，就持有这样的观点。

现在我们就来考察一下他们的民族理论吧。

在施普林格看来，“民族是思想相同和语言相同的人们的联盟”。民族是“由一群现代人组成的、和‘地域’无关的文化共同体”。（注：见鲁.施普林格的《民族问题》1909 年公益出版社版第 43 页。）

总之，就是思想相同和语言相同的人们的“联盟”，不管他们彼此怎样隔离，不管他们住在什么地方。

鲍威尔却更进一步。

他问道：“什么是民族呢？它是不是那种把人们联合为民族的语言共同体呢？英吉利人和爱尔兰人……操着同一语言，却不是统一的民族；犹太人并没有共同的语言，却是一个民族。”（注：见奥.鲍威尔的《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1909 年镰刀出版社版第 1—2 页。）

那么，民族究竟是什么呢？

“民族就是相对的性格共同体。”

然而性格（这里讲的是民族性格）又是什么呢？

民族性格是“一个民族的人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人的种种特征的总和，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生理特质和精神特质的总和”。

鲍威尔当然知道民族性格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因此他补充说：

“人们的性格无非是由他们的命运决定的”,“……民族无非是命运的共同体”,而命运共同体又是“由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和分配自己的劳动产品时所处的条件”决定的。◎第 65 页◎

于是，我们就得出如鲍威尔所说的民族的最“完备的”定义了。

“民族就是那些在共同命运的基础上结合成共同性格的人们的集合体。”（注：见奥.鲍威尔的《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1909 年镰刀出版社版第 139 页。）

总之，在共同命运的基础上结合成的共同的民族性格，并不一定和共同的地域、语言以及经济生活相联系。

这样一来，民族还剩下什么东西呢？经济上彼此隔离、生活在不同的地域、世世代代都操着不同语言的人们，还谈得上什么民族共同体呢？

鲍威尔说犹太人是个民族，虽然“他们并没有共同的语言”，可是，例如格鲁吉亚的、达吉斯坦的、俄国的和美国的犹太人，既然彼此完全隔绝，生活在不同的地域，并且操着不同的语言，他们还谈得上什么“共同命运”和民族联系呢？

这些犹太人无疑地和格鲁吉亚人、达吉斯坦人、俄罗斯人以及美利坚人过着共同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受着共同文化的熏陶，这就不能不给他们的民族性格打上烙印；如果他们中间还有什么共同的东西，那就是宗教、共同的起源和民族性格的某些残余。这一切是用不着怀疑的。可是，怎么能认真地说，僵化的宗教仪式和日渐磨灭的心理残余会比这些犹太人所处的现实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

环境更强烈地影响到他们的“命运”呢？而只有在这样的假定下，才可以说犹太人是个统一的民族。

那么，鲍威尔的所谓民族和唯灵论者（注：唯灵论者是信奉精神统治自然界的一种唯心主义学说的人。唯灵论者承认灵魂、精神是唯一的实体，而把肉体看作是灵魂的产物。）的所谓神秘的独立自在的“民族精神”又有什么区别呢？

鲍威尔在民族“特点”（民族性格）和民族生活“条件”之间划了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把它们彼此隔离开来。然而民族性格如果不是生活条件的反映，不是从周围环境得来的印象的结晶，那又是什么呢？怎能仅限于民族性格而把它和它所由产生的根源割断分开呢？

其次，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当北美利坚还叫作“新英格兰”的时候，英吉利民族和北美利坚民族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当然不是民族性格上的区别，因为北美利坚人是从英国迁移过去的，他们带到美洲去的除英吉利语言以外，还有英吉利的民族性格，虽然他们在新环境的影响下大概已开始形成自己特有的性格，但他们当然不会很快就丧失其英吉利的民族性格。当时他们和英吉利人在性格上虽然还有或多或少的共同点，但他们毕竟已经是和英吉利民族不同的一个民族了！显然，当时“新英格兰”民族不同于英吉利民族的地方并不是特别的民族性格，或者与其说是民族性格，倒不如说是和英吉利民族不同的环境即生活条件。

由此可见，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唯一的民族特征，而只有各种特征的总和。在把各种民族拿来作比较的时候，显得比较突出的有时是这个特征（民族性格），有时是那个特征（语言），有时又是另一个特征（地域、经济条件）。民族是由所有这些特征结合而成的。

鲍威尔把民族和民族性格看成一个东西，这样就使民族脱离了它的根基，把它变成了不见形迹的独立自在的力量。结果就不是有生命的活动着的民族，而是一种神秘的、不可捉摸的、非人世间的东西。试问，——我重说一遍，——象格

鲁吉亚的、达吉斯坦的、俄国的、美国的和其它地方的犹太人，彼此语言不通（他们操着不同的语言），生活在地球上不同的地方，从来不能见面，无论和平时期或战争时期都不会共同行动，这算什么犹太民族呢？！

不，社会民主党不是为这种纸上的“民族”制定自己的民族纲领的。它只能承认那些活动着的、运动着的、因而使人们不能不承认的真正的民族。

鲍威尔显然把民族这一历史范畴和部落这一民族学范畴混淆起来了。

不过，鲍威尔本人大概也觉得自己的立论是有弱点的。他在自己那本书的开头虽然坚决地说犹太人是一个民族，但他在该书末尾就自行修正，肯定说“资本主义社会根本就不让他们〈犹太人〉保全为一个民族”而使他们受其它民族的同化。其所以如此，原来是“犹太人没有单独的居住地区”，而捷克人却有这样的地区，因此，鲍威尔认为捷克人一定能保全为一个民族。简言之，原因就在于没有地域。

鲍威尔如此推论，原想证明民族自治不能成为犹太工人的要求，他这样一来却无意中驳倒了他自己那种否认共同的地域是民族特征之一的理论。

可是鲍威尔不以此为限。他在自己那本书的开头坚决地说：“犹太人并没有共同的语言，却是一个民族。”可是他刚刚写到第一三○页就改变了阵线而同样坚决地说：“无疑地，没有共同的语言，就不可能有什么民族。”（黑体是我们用的）

鲍威尔在这里原想证明“语言是人类交际最重要的工具”，但他同时无意中证明了他不想证明的东西，证明了自己那种否认共同语言的意义的民族理论是站不住脚的。

用唯心论的针线缝成的理论就这样不攻自破了。

二　民族运动

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封建制度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人们形成为民族的过程。例如西欧的情形就是如此。英吉利人、法兰西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等都是在资本主义打破封建割据局面而胜利前进时形成为民族的。

但是，西欧各民族形成的过程同时就是它们变为独立的民族国家的过程。英吉利、法兰西等民族同时就是英吉利等国家。处于这一过程以外的爱尔兰并不能改变总的情景。

东欧的情形却有些不同。当西欧各民族发展成国家的时候，东欧却形成了多民族的国家，即由几个民族组成的国家。奥匈帝国和俄国就是这样的国家。在奥地利，当时政治上最为发展的是德意志人，于是他们就负起了把奥地利各民族统一成一个国家的任务。在匈牙利，最能适应国家组织性的是匈牙利各民族的中坚——马扎尔人，于是他们成了匈牙利的统一者。在俄国，是以历史上形成的强大而有组织的贵族军事官僚为首的大俄罗斯人担负了统一各民族的使命。

东欧的情形就是如此。

只有在封建制度还没有消灭、资本主义还不大发达、被排挤到次要地位的各民族在经济上还没有结合成完整的民族的条件下，才能有这种特殊的国家形成方式。

可是资本主义在东欧各国也开始发展起来了。商业和交通日益发达，大城市相继出现，各民族在经济上逐渐结合起来。资本主义闯进了被排挤的各民族的平静生活中，惊醒了它们，使它们行动起来。报刊和剧院的发展，莱希斯拉特（奥地利）和杜马（俄国）的活动，都加强了“民族意识”。新兴的知识分子充满了“民族思想”，并在这方面进行活动……

但是那些觉醒起来要求独立生活的被排挤的民族已不能形成独立的民族国家了，因为它们在自己的道路上碰到了早已居于国家领导地位的统治民族中的领导阶层极其强烈的反对。它们来迟了！……

奥地利的捷克人和波兰人等等，匈牙利的克罗地亚人等等，俄国的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等等就是这样形成民族的。在西欧（爱尔兰）是例外的，在东欧却成了通例。

西欧的爱尔兰用民族运动回答了这种例外的情形，东欧已觉醒的各民族也不免要这样回答。

推动东欧各个年轻民族去进行斗争的情况就是这样形成的。

其实，斗争并不是在整个民族和整个民族之间，而是在统治民族的和被排挤民族的统治阶级之间开始并激烈起来的。通常是被压迫民族中的城市小资产阶级起来反对统治民族中的大资产阶级（捷克人和德意志人），或者被压迫民族中的农村资产阶级起来反对统治民族中的地主（波兰的乌克兰人），或是被压迫民族中的整个“民族”资产阶级起来反对统治民族中的执政贵族（俄国的波兰、立陶宛、乌克兰）。

资产阶级是主角。

在年轻的资产阶级看来，市场是基本问题。它的目的是销售自己的商品，战胜和自己竞争的异族资产阶级。因此，它力求保证自己有“自己的”“本族的”市场。市场是资产阶级学习民族主义的第一个学校。

但问题通常不仅限于市场。统治民族中的半封建半资产阶级的官僚常用他们“只捉不放”（注：只捉不放　是形容沙俄时代警察专横的成语，出自格•伊•乌斯宾斯基的短篇小说《岗亭》。小说中描写一个名叫梅穆列佐夫的警察，滥用职权，动辄捉人，不肯释放。）的方法干预斗争。于是统治民族中的资产阶级，不论小资产阶级或大资产阶级，就有可能“更迅速地”“更坚决地”制服自己的竞争者。“力

量”既日趋统一，限制“异族”资产阶级的一连串办法以至高压手段也就开始实行起来了。斗争由经济范围转入政治范围。限制迁徙自由，限制语言使用，限制选举权，减少学校，限制宗教活动等等办法纷纷加到“竞争者”的头上。当然，采取这种办法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统治民族中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可以说是为了执政官僚们特殊集团的目的。但结果都是一样：资产阶级和官僚在这种场合总是携手并进的，不论奥匈帝国或俄国，情形都是如此。

被压迫民族中受各方面排挤的资产阶级自然要行动起来。它向“下层同胞”呼吁，开始高呼“祖国”，把自己的私事冒充全民的事情。它为着……“祖国”的利益而在“同胞”中间给自己招募军队。“下层”对这种号召并非始终不理，有时也在资产阶级旗帜的周围集合起来，因为上层的高压手段也在触犯它们，引起它们的不满。

民族运动就是这样开始的。

民族运动的力量取决于该民族广大阶层即无产阶级和农民参加运动的程度。

无产阶级是否站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旗帜下面，这要看阶级矛盾的发展程度，要看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觉悟的无产阶级有自己的久经考验的旗帜，它用不着站到资产阶级的旗帜下面去。

至于农民是否参加民族运动，这首先要看高压手段的性质。如果高压手段触犯到“土地”利益，象在爱尔兰发生过的情形那样，那么广大农民群众就会立刻站到民族运动的旗帜下面去。

另一方面，如果说在格鲁吉亚没有较为严重的反俄罗斯的民族主义，那这首先是因为那里没有使群众产生这种民族主义的俄罗斯地主或俄罗斯大资产阶级。在格鲁吉亚有反亚美尼亚的民族主义，但这是因为那里还有亚美尼亚的大资产阶级在打击着尚未巩固的格鲁吉亚小资产阶级，推动它走向反亚美尼亚的民族主义。

以这些因素为转移，民族运动可能具有群众性而愈益扩展起来（爱尔兰、加里西亚），也可能变成一连串的小冲突，流为无谓的争吵和争取用本族文字写招牌的“斗争”（波希米亚的某些小城市）。

当然，民族运动的内容决不会到处一样，它完全取决于运动所提出的各种不同的要求。爱尔兰的运动具有土地问题的性质，波希米亚的运动带着“语言问题的”性质，这里要求公民权利平等和信教自由，那里要求任用“本族的”官吏或组织本族的议会。在各种不同的要求中往往透露出民族所具有的各种不同的特征（语言、地域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鲍威尔所说的包罗万象的“民族性格”这一要求。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民族性格”就其本身来说是不可捉摸的，约•施特拉塞尔说得对，“政治家对它是奈何不得的”。（注：见他的《工人和民族》1912 年版第 33 页）

民族运动的形式和性质大致如此。

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民族斗争是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有时资产阶级也能把无产阶级吸引到民族运动中去，那时民族斗争表面上就会带着“全民的”性质，然而这只是表面上如此。实质上这个斗争始终是资产阶级的，主要是有利于和适合于资产阶级的。

但决不能因此说无产阶级不应当反对民族压迫政策。

限制迁徙自由，剥夺选举权，限制语言使用，减少学校以及其它种种高压政策使工人受到的损害并不比资产阶级所受到的少，甚至还要多。这种情形只能阻碍被压迫民族内无产阶级精神力量的自由发展。当鞑靼工人或犹太工人还被禁止用本族语言开会和演讲，他们的学校被关闭的时候，自然根本谈不到他们的精神才智的充分发展。

然而民族主义的高压政策对于无产阶级的事业还有另一方面的危险。它把广大阶层的视线从社会问题、阶级斗争问题转移到民族问题，转移到无产阶级和资

产阶级的“共同”问题。这就会为进行所谓“利益协调”的欺骗宣传、抹杀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在精神上束缚工人打下有利的基础，因而严重地阻碍各族工人的团结事业。如果说很大一部分波兰工人至今还受着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精神束缚，如果说他们至今还站在国际工人运动之外，那么这主要是因为“当权人物”历来的反波兰政策为这种束缚打下了基础，加重了工人们挣脱这种束缚的困难。

但是高压政策并不以此为限。它往往由压迫的“制度”转到挑拨各民族互相残杀的“制度”，转到屠杀和蹂躏的“制度”。当然，后者并不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能实现的，但是在可能实现的地方，即在缺乏起码自由的条件下，它往往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使工人的团结事业有淹没在血泪中的危险。高加索和南俄有过不少例子。“分而治之”，——这就是挑拨政策的目的。这样的政策如果得逞，就会给无产阶级带来莫大的祸害，使国内各族工人的团结事业受到极大的阻碍。

但工人所关心的是使自己所有的同志完全汇合成一支统一的跨民族的大军，使他们迅速地彻底地摆脱资产阶级的精神束缚，使任何一个民族的兄弟们的精神力量都能得到充分的和自由的发展。

因此，工人现在反对、将来还要反对从最巧妙的到最粗暴的各种各样的民族压迫政策，同样要反对各种各样的挑拨政策。

因此，各国社会民主党主张民族自决权。

自决权就是：只有民族自己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谁也没有权利用暴力干涉这个民族的生活，毁坏它的学校和其它机关，破坏它的风俗和习惯，限制它的语言，削减它的权利。

这当然不是说社会民主党要支持一个民族的一切风俗和机关。它反对用暴力压迫民族，仅仅维护由民族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同时要进行鼓动，反对该民族的一切有害的风俗和机关，使该民族的劳动阶层能够摆脱这些有害的东西。

自决权就是民族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去处理自己的事情。它有权按自治原则安排自己的生活。它有权和其它民族建立联邦关系。它有权完全分离出去。每个民族都是自主的，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

这当然不是说社会民主党将维护民族的任何要求。一个民族甚至有恢复旧制度的权利，但这还不是说社会民主党将赞同该民族某个机关的这种决定。社会民主党是保护无产阶级的利益的，而民族则是由不同的阶级组成的，因此，社会民主党的义务和民族的权利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社会民主党为民族自决权而斗争，目的是消灭民族压迫政策，使这种政策没有立足的余地，以便消除民族间的斗争，使它缓和下去，使它减到最小限度。

这就是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策同资产阶级力求加剧并扩大民族斗争、继续并激化民族运动的政策在本质上的区别。

正因为如此，觉悟的无产阶级就不能站到资产阶级的“民族”旗帜下面去。

正因为如此，鲍威尔提出的所谓“进化的民族的”政策就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政策。鲍威尔企图把自己的“进化的民族的”政策和“现代工人阶级的”政策等同起来，就是企图使工人的阶级斗争迁就民族斗争。

民族运动实质上既然是资产阶级的运动，它的命运自然就和资产阶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只有资产阶级灭亡，民族运动才会彻底灭亡。只有在社会主义世界里，完全的和平才能建立起来。可是把民族斗争减到最小限度，从根本上瓦解它，尽量使它无害于无产阶级，这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也是可以做到的。瑞士和美国的例子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为此就必须使国家民主化，使各个民族有自由发展的可能。

三　问题的提法

民族有权自由决定自己的命运。它有权随意处理自己的事情，当然，也不能侵犯其它民族的权利。这是无可争辩的。

但是，如果注意到民族中多数人的利益，首先是无产阶级的利益，那么民族究竟应当怎样处理自己的事情，民族未来的宪法究竟应当采取怎样的形式呢？

民族有权按自治原则处理自己的事情。它甚至有权分离。但这并不是说它在任何条件下都应当这样做，也不是说自治或分离无论何时何地都有利于该民族，即有利于该民族中的多数，有利于劳动阶层。例如，南高加索的鞑靼民族可以召开本族的议会，并在本族别克和毛拉（注：别克是南高加索、中亚细亚和土耳其等地王公贵族等上层人士的尊号。毛拉在俄国指伊斯兰教宗教仪式的主持人。——编者注）的摆布之下恢复它的旧制度，决定从国家分离出去。根据民族自决的条文，它是完全有权这样做的。但这对鞑靼民族的劳动阶层是否有利呢？社会民主党能否漠不关心，听任别克和毛拉带领群众去解决民族问题呢？难道社会民主党不应当干预这种事情，不应当给民族意志以一定的影响吗？难道它不应当提出最有利于鞑靼群众的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吗？

但是如何解决才最符合于劳动群众的利益呢？自治，联邦，还是分离呢？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要根据该民族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来解决的。

不仅如此，条件也和其它一切事物一样是变化着的，因而在某个时期是正确的解决方法，在另一个时期也许是完全不可以采纳的。

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曾主张俄属波兰分离，他是正确的，因为当时的问题是要把较高的文化从破坏它的那种较低的文化中解放出来。当时这个问题不是单纯理论上的问题，不是学院式的问题，而是实践中、实际生活中的问题……

十九世纪末叶，波兰马克思主义者却反对波兰分离，他们也是正确的，因为近五十年来俄国和波兰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它们在经济和文化方面接近起

来了。此外，在这个时期，分离问题已由实践的问题变成至多只能引起国外知识分子注意的学院式的争论问题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从此就不会出现某种内部和外部的情况，使波兰分离问题重新提上日程。

由此可见，民族问题只有和发展着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看才能得到解决。

某个民族所处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条件便是解决该民族究竟应当怎样处理自己的事情和它的未来宪法究竟应当采取什么形式这种问题的唯一关键。同时，很可能每个民族解决问题都需要用特殊的方法。如果在什么地方必须辩证地提出问题，那正是在这个地方，正是在民族问题上。

因此，我们应当坚决反对崩得所创始的那种很流行而又很笼统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我们所指的是有人轻率地拿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南方斯拉夫社会民主党（注：南方斯拉夫社会民主党是在奥地利南部进行工作的。）做榜样，说它们已经解决了民族问题，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只要抄袭它们的解决方法就行了。同时，他们竟以为凡在奥地利是正确的东西，在俄国也是正确的。他们忽略了这方面最重要和最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整个俄国以及俄国境内每个民族生活中的具体历史条件。

例如，请听听有名的崩得分子弗•科索夫斯基的话吧：

“当崩得第四次代表大会讨论到这一问题〈指民族问题。——约•斯大林注〉的原则方面时，代表大会中的一位代表根据南方斯拉夫社会民主党的决议的精神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博得了全体的赞同。”（注：见弗•科索夫斯基的《民族问题》1907 年版第 16—17 页。）

结果，“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民族自治。

如此而已！既没有分析俄国的实际情况，也没有弄清俄国境内犹太人的生活条件，首先抄袭了南方斯拉夫社会民主党的解决方法，接着“赞同了”，然后“一致通过了”！崩得分子就是这样提出并“解决”俄国的民族问题的……

然而奥地利和俄国的条件完全不同。因此，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布隆（1899年）（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布隆代表大会于 1899 年 9 月 24—29 日举行。斯大林在本文第四章所引用的就是这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所通过的决议。）根据南方斯拉夫社会民主党的决议的精神通过民族纲领（固然有一些小小的修正）时，根本就不是按俄国的情况考虑问题，当然也就不会按俄国的情况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是问题的提法。主张民族文化自治的奥地利理论家、布隆民族纳领和南方斯拉夫社会民主党的决议的解释者施普林格和鲍威尔是怎样提出问题的呢？

施普林格说：“对于多民族的国家究竟能否组成，或具体地说，奥地利各民族是否不得不组成一个政治整体这一问题，我们现在不来回答；我们应认为这些问题已经解决了。在不同意上述可能性和必要性的人们看来，我们的研究当然是没有根据的。我们的主题是：这些民族不得不共同生活；什么样的法律形式才能使它们生活得最好呢？”（黑体是施普林格用的）（注：见施普林格的《民族问题》第 14 页。）

总之，出发点就是奥地利国家的完整。

鲍威尔所说的也是如此：

“我们的出发点是假定奥地利各民族将仍然留在它们现在居住的国家联盟以内，于是我们就要问，在这个联盟范围内，各民族相互间的关系和它们全体对于国家的关系将是怎样的呢？”（注：见鲍威尔的《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第 399 页。）

又是把奥地利的完整列在第一位。

俄国社会民主党能不能这样提出问题呢？不，不能。其所以不能，在于它一开始就主张民族自决，根据这种主张，民族有分离权。

甚至崩得分子戈尔德勃拉特也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于 1903 年 7 月 17 日—8 月 10 日（公历 7 月 30 日—8 月 23 日）先后在布鲁塞尔和伦敦举行。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根据《火星报》提出的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建立真正的政党。列宁在大会上为在俄国建立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进行了斗争，并取得了胜利。在讨论党纲时，列宁坚决主张在党纲中肯定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原则，着重指出农民的革命斗争的重大意义，并坚持把民族自决权列入党纲，维护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大会通过了《火星报》提出的工人阶级政党的革命纲领。在讨论党章，特别是关于党员资格的第一条条文时，列宁及其拥护者同尔•马尔托夫等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大会通过了列宁拟订的党章，但关于党章第一条，却以一票弃权，二十八票对二十二票的多数通过了马尔托夫的条文。在选举中央机关时，拥护列宁的人获得多数票，反对列宁的人获得少数票。从这时起，前者被称为布尔什维克，后者被称为孟什维克。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参看《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75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42—48 页。——第 23、25、79、498 页。）上承认俄国社会民主党不能放弃自决的主张。当时戈尔德勃拉特说：

“自决权是丝毫不容反对的。如果某一民族为独立而斗争，那就不要阻拦它；如果波兰不愿和俄国结成‘合法婚姻’，那我们就不应该去妨碍它。”

这都是事实。可是由此就应得出结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出发点不仅不同，而且根本相反。既然如此，还说得上可以抄袭奥地利人的民族纲领吗？

其次，奥地利人是想用微小的改良、缓慢的步骤来实现“民族自由”的。他们提出民族文化自治作为实际办法时，完全没有指望根本的改变，没有指望他们

远景中所没有的民主解放运动。然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民族自由”的问题和可能的根本改变联系在一起，和民主解放运动联系在一起，他们没有理由指望改良。这就使俄国各民族可能的命运问题发生根本的变化。

鲍威尔说：“当然很难设想民族自治是靠一个重大的决定，靠大胆的坚决行动就可以实现的。奥地利将逐步走向民族自治，这是一个缓慢而痛苦的过程，是艰苦的斗争，由于这种斗争，立法和行政管理将陷于慢性的瘫痪状态。不，新的国家法律制度决不是通过一个重要的立法文件就建立起来的，而是要通过分别为各个地区、各个村社而颁布的许多单项的法令才能建立起来。”（注：见鲍威尔的《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第422页。）

施普林格所说的也是如此。

他写道：“我清楚地知道这种机关〈民族自治机关。——约•斯大林注〉不是一年也不是十年可以建立起来的，单是为了改组普鲁士的行政管理机构就用了很长的时间……普鲁士用二十年才完全建立了自己的主要行政机关。因此，请不要以为我不知道奥地利要用多少时间，要克服多少困难吧。”（注：见施普林格的《民族问题》281—282页。）

这一切都是很明确的。但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否不把民族问题和“大胆的坚决行动”联系起来呢？他们能否指望局部的改良，指望“许多单项的法令”作为争取“民族自由”的手段呢？既然他们不能而且不应这样做，那么从这里不是可以清楚地看出奥地利人的斗争方法和前途与俄国人完全不同吗？在这种情况下，怎能局限于奥地利人那种片面的不彻底的民族文化自治呢？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主张抄袭的人不指望俄国有“大胆的坚决行动”，或者是他们虽指望有这种行动，但“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最后，俄国和奥地利当前的任务完全不同，因此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也应当不同。奥地利生存在议会制度的条件下，目前那里没有议会就不能有什么发展。

可是奥地利的议会生活和立法工作往往因各民族政党间的剧烈冲突而完全陷于停顿。这就是奥地利早已患慢性政治危机病的原因。因此，民族问题在那里是政治生活的轴心，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无怪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家首先竭力设法解决民族冲突问题，当然是以现存的议会制度为基础用议会方法去解决的……

俄国的情形却不是这样。第一，在俄国，“谢天谢地，没有议会”（注：“在我国，谢天谢地，没有议会”——这句话是沙皇政府的财政大臣弗•尼•科科夫策夫 1908 年 4 月 24 日在国家杜马中说的。）。第二，这是主要的，俄国政治生活的轴心不是民族问题而是土地问题。因此，俄国问题的命运即各民族“解放”的命运在俄国是和解决土地问题，即和消灭农奴制残余也就是和国家民主化联系在一起的。这就说明为什么俄国的民族问题并不是独立的和有决定意义的问题，而是更加重要的国家解放这个总问题的一部分。

施普林格写道：“奥地利议会之所以没有成果，只在于每一种改良都在各个民族政党内部引起矛盾而使这些政党的团结受到破坏，于是各政党的领袖们对于一切带有改良气味的东西都竭力回避。奥地利的进步只有在各民族都获得不可剥夺的法律地位时才谈得上；这样就使各民族不必在议会里保持常备的战斗队伍，使各民族有可能去解决各种经济的和社会的任务。”（注：见施普林格的《民族问题》第 36 页。）

鲍威尔所说的也是如此：

“民族和平首先是国家所需要的。一个国家决不能容忍立法工作因极无聊的语言问题，因民族边界上某个地方某些激动的人彼此发生一些极小的争执，因每设立一所新的学校而陷于停顿。”（注：见鲍威尔的《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第 401 页。）

这都是很明白的。但是民族问题在俄国处于完全不同的地位，这也是很明白的。决定俄国进步的命运的不是民族问题，而是土地问题。民族问题是从属的问题。

总之，有不同的问题提法，有不同的前途和斗争方法，有不同的当前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不顾空间时间地“解决”民族问题的书呆子才会拿奥地利做榜样，才会抄袭它的纲领，这难道不明显吗？

再说一遍：以具体历史条件为出发点，把辩证地提问题当作唯一正确的提问题的方法，——这就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

四　民族文化自治

上面我们已经谈过奥地利民族纲领的形式方面，谈过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不能简单地模仿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简单地采用它的纲领的那种方法论上的根据。

现在我们谈谈这个纲领的实质。

那么，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民族纲领是怎样的呢？

一句话，这个纲领就是民族文化自治。

第一，这就是说，自治权不是给予主要是住着捷克人或波兰人的捷克或波兰，而是给予一切捷克人和波兰人，不分地域，不管他们居住在奥地利什么地方。

因此，这种自治就叫作民族自治，而不叫作地域自治。

第二，这就是说，分散在奥地利各地的捷克人、波兰人、德意志人等等都以个人资格分别组成完整的民族，并以这样的民族的资格加入奥地利国家。这样，奥地利将不是由各自治区域组成的联盟，而是由不分地域建立起来的各自治民族组成的联盟。

第三，这就是说，为着这种目的而应当给波兰人、捷克人等等建立起来的全民族机关将只管“文化”问题，不管“政治”问题。专门政治性的问题都集中在全奥地利议会（莱希斯拉特）手中。

因此，这种自治还叫作文化自治，民族文化自治。

下面就是1899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布隆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注：南方斯拉夫社会民主党代表也曾投票拥护这个纲领。见《党的布隆代表大会关于民问题的讨论》1906年版第72页。）

纲领上先提到“奥地利民族纠纷阻碍着政治进步”，“彻底解决民族问题……首先是文化上所必需的”，“这个问题只有在根据普遍、直接和平等的选举制建立起来的真正民主的社会里才能得到解决”。然后说：

“只有在完全平等和没有任何压迫的条件下，奥地利各民族的民族特点（注：在马•帕宁的俄译本中，“民族特点”译成了“民族个性”（见鲍威尔此书帕宁译本）。帕宁把这个地方译错了，因为在德文原本上并无“个性”一词，那里所说的是“natioanlenEigenart”，即民族特点，而这和“民族个性”是完全不同的。）的保存和发展才有可能。因此，首先必须屏弃官僚的国家集权制和各个领地上的封建特权。

在这种条件下，而且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消除奥地利的民族纠纷，建立民族秩序，其原则如下：

1.奥地利应改组为各民族民主联盟的国家。

2.应组成按民族划分的自治团体来代替历代的皇朝封地，每个团体的立法权和行政权均由根据普遍、直接和平等的投票选举出来的民族议院掌管。

3.属于同一民族的各自治区域共同组成单一的民族联盟，该联盟完全按自治原则来处理本民族的事务。

4.少数民族的权利由帝国议会颁布特别法律加以保障。”

纲领的结语号召奥地利各民族团结起来。（注：见 1899 年布隆《党代表大会的讨论》。）

不难看出这个纲领中还留下一些“地域主义”的痕迹，但它大体上是民族自治的纲领。无怪乎第一个鼓吹民族文化自治的施普林格热烈地欢迎这个纲领。鲍威尔也赞同这个纲领，称它为民族自治的“理论上的胜利”；不过为了更明确起见，他才提议用更确定的条文代替第四条，其内容是说必须“把每个自治区域内的少数民族组成公法团体”来掌管学校及其它文化事宜。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民族纲领就是如此。

我们来考察一下它的科学根据。

我们来看看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是怎样论证它所鼓吹的民族文化自治的。

我们来看看民族文化自治的理论家施普林格和鲍威尔的意见吧。

民族自治的出发点就是认为民族是和固定的地域无关的人们的联盟。

施普林格说：“民族和地域没有任何本质上的联系，民族是自治的个人联盟。”

鲍威尔也说民族是“不在某个固定地区内独占统治的”“个人的共同体”。

但组成一个民族的人并不总是大批地密集地住在一起的，他们往往分成许多集团而掺杂在别的民族机体中。这是资本主义驱使他们到各个地区和城市去谋生的缘故。可是这些集团既然掺杂在别的民族地区，并在那里占少数，于是在语言、学校等方面就会受到人数众多的当地民族的限制。由此就产生了民族冲突。由此就证明地域自治是“毫无用处的”。照施普林格和鲍威尔的意见，摆脱这种状况的唯一出路是把这个散处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组成一个共同的包括各阶级的民族联盟。他们认为只有这样的联盟才能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利益，才能消除民族纠纷。

施普林格说：“必须使各民族有正确的组织，必须给它们以权利和义务……”当然，“法律是容易制定的，但它是否能发生人们所预期的作用呢？……”“要想

给民族制定法律，首先就要把这些民族建立起来……”“不组成民族便不能建立民族法和消除民族纠纷。”

鲍威尔也是这样说的，他借口“工人阶级的要求”，提议“根据个人原则把各个少数民族组成一些公法团体”。

但是，怎样组织民族呢？怎样确定某人属于某个民族呢？

施普林格说：“用民族名册来确定某人属于某个民族，居住在一个地区的每个人都应当声明自己属于某一民族。”

鲍威尔说：“个人原则的前提是根据成年公民的自由声明按民族划分居民……”为此就“应当编制民族名册”。

其次：

鲍威尔说：“居住在单一民族区内的一切德意志人以及登记在杂居区的民族名册上的一切德意志人共同组成一个德意志民族，并选出民族委员会。”

应该说，捷克人、波兰人等也是如此。

施普林格说：“民族委员会就是民族文化议会，它有权为管理民族教育、民族文学、艺术和科学，为建立学院、博物馆、美术陈列馆、剧院规定原则和批准经费”等等。

民族组织及其中央机关就是如此。

照鲍威尔的意见，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主张建立这种包括各阶级的机关是想“使民族文化……成为全体人民的财富，并且用这种唯一可能的办法把民族的全体成员结合成一个民族文化共同体”（黑体是我们用的）。

也许有人认为这一切只和奥地利有关。但是鲍威尔不以为然。他坚决认定在其它和奥地利一样是由几个民族组成的国家里，也必须实行民族自治。

鲍威尔认为：“在多民族的国家里，各民族中的无产阶级都应当提出自己的民族自治的要求去对抗有产阶级的民族政策，即夺取政权的政策。”

然后，鲍威尔悄悄地用民族自治替换了民族自决而继续说：

“这样，民族自治，民族自决，就必然成为多民族国家中各族无产阶级的立宪纲领。”

但他还不以此为限。他深信他和施普林格所“规定的”包括各个阶级的“民族联盟”会成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种雏形。因为他知道“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将把人类分成一些按民族划分的团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类将分成一些民族自治团体”；“这样一来，社会主义社会无疑地是一幅由许多个人的民族联盟和地域的团体构成的五光十色的图画”；因此“社会主义的民族原则是民族原则和民族自治的最高综合”。

大概够了……

在鲍威尔和施普林格的著作中就是这样论证民族文化自治的。

最惹人注意的首先是他们用民族自治来替换民族自决的那种莫名其妙的毫无理由的做法。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鲍威尔不懂得自决是什么，或者是他懂得，但不知他为什么竟故意把它缩小了。因为毫无疑义的是：（一）民族文化自治是以多民族国家的完整为前提的，自决却超出了这种完整的范围；（二）自决是赋予民族以全部权利的，民族自治却只限于“文化”权利。这是第一。

第二，将来内外情况完全可能配合成这样，那时某一民族会决定退出多民族的国家，例如退出奥地利，——卢西人社会民主党人在党的布隆代表大会上就曾这样声明他们要把本族人民的“两部分”合并成一个整体。那时，对“各族无产阶级必然要采取的”民族自治怎么办呢？用削足适履的办法把各民族机械地塞进国家完整性的框子里去，这算是什么“解决”问题的方法呢？

其次，民族自治是和民族的整个发展进程抵触的。民族自治提出组织民族的口号，可是，既然实际生活、既然经济发展使得整批的人脱离本民族，并使他们散居各地，试问，怎能人为地把这种民族结合起来呢？无疑地，在资本主义的最

初阶段民族逐渐集结起来。可是同样无疑地，在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开始了民族分散的过程，成批人离开本民族出外谋生，以至于完全迁移到国内其它地区去；同时，这些移民就渐渐失去旧有的联系，而在新的地方取得新的联系，一代一代地养成新的风俗习惯，也许还会通晓新的语言。试问，能否把这些彼此隔离的集团合并成统一的民族联盟呢？什么地方竟有这样一种魔箍能把无法统一的东西统一起来呢？例如，难道可以把波罗的海沿岸和南高加索一带的德意志人“结合成一个民族”吗？既然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不可能做到的，那么民族自治和那些力图使历史开倒车的老民族主义者的空想又有什么区别呢？

但民族的统一不仅因移居而逐渐消失，并且由于内部原因，即由于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而消失下去。在资本主义的最初阶段，还可以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文化共同性”。然而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这种“共同性”开始消失了。在同一民族的雇主和工人再不能互相了解的时候，根本就谈不到民族的“文化共同性”。在资产阶级渴望战争，无产阶级却宣布“以战争对付战争”的时候，还谈得上什么“共同命运”呢？能不能把这些彼此对立的分子组成一个统一的包括各个阶级的民族联盟呢？既然如此，还谈得上“民族的全体成员结合成一个民族文化共同体”吗？因此，民族自治是和阶级斗争的整个进程相抵触的，这不是很明显吗？

我们暂且假定“组织民族”这个口号是可能实现的口号。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议员们为了取得更多的选票而力图“组织”民族，那还可以理解。可是，社会民主党人什么时候竟也开始干起“组织”民族、“成立”民族、“建立”民族的事情来了呢？

在阶级斗争极端尖锐的时代去组织包括各个阶级的民族联盟，这算什么社会民主党人呢？到现在为止，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其它各国的社会民主党一样，只有一个任务，就是组织无产阶级。可是这个任务看来“已经过时了”。于是施普林

格和鲍威尔现在提出一个“新的”更引人入胜的任务，就是“建立”民族，“组织”民族。

不过，逻辑上必然如此：既然采取了民族自治，当然就要接受这个“新的”任务，而接受这个“新的”任务就是离开阶级立场，走上了民族主义的道路。

施普林格和鲍威尔的民族文化自治是一种精致的民族主义。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的民族纲领责成大家关心“各民族的民族特点的保存和发展”，这也绝不是偶然的。真是异想天开：“保存”南高加索的鞑靼人在“沙黑西—瓦黑西”节日（注：沙黑西－瓦黑西　节日是什叶派伊斯兰教徒的哀悼日。伊斯兰教历史上第四代哈里发、什叶派宗奉的第一代伊玛目——阿里的儿子胡塞因于公元 680 年在战斗中殉难。什叶派教徒每年在他的忌日举行各种哀悼仪式。在举行模拟胡塞因出殡的游行时，参加者呼喊着：“沙黑，胡塞因！瓦黑，胡塞因！”（意思是：“王呀，胡塞因！啊呀，胡塞因！”“沙黑西－瓦黑西”一词即由此而来）同时用铁链抽打自己，甚至用刀剑刺砍自己，以表示对殉难者的同情。沙黑西－瓦黑西节日常被利用来激起宗教狂热。）自己打自己这一类的“民族特点”！“发展”格鲁吉亚人的“复仇权”这一类的“民族特点”！……

这种条文只配列在十足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纲领上，它既然出现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上，那就因为民族自治和这类条文是相容的，而不是相抵触的。

然而对现在的社会不适用的民族自治，对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更不适用的。

鲍威尔的“把人类分成一些按民族划分的团体”这一预言已被现代人类的整个发展进程驳倒了。民族壁垒并不是在巩固，而是在毁坏，在倒塌。马克思早在四十年代就说过：“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离和对立日益消失”，“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人类后来的发展及其资本主义生产的巨大增长，各民族的杂居和人们在愈益广阔的地域上的结合，都十分肯定地证实了马克思的思想。

鲍威尔想把社会主义社会看作“一幅由许多个人的民族联盟和地域的团体构成的五光十色的图画”，其实就是暗中企图用经过改良的巴枯宁的概念来代替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概念。社会主义的历史表明，任何这样的企图本身都包含着必然破产的因素。

至于鲍威尔竭力推崇的“社会主义的民族原则”，那就更不用说了。这个“原则”，在我们看来，就是想用资产阶级的“民族原则”代替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原则。如果民族自治是从这种可疑的原则出发，那就必须承认民族自治只能有害于工人运动。

固然这种民族主义并不如此明显，因为它是用社会主义的辞藻巧妙地伪装起来的，但是正因为如此，它对无产阶级就更加有害。公开的民族主义总可以对付，因为它是不难识破的。要和伪装的和伪装得不易识破的民族主义作斗争，那就困难得多。它既然装上社会主义的铁甲，也就较难攻破和较能持久了。它既然存在于工人中间，散播各民族工人互相猜忌、彼此隔离的有害思想，也就把气氛毒化了。

但是民族自治的害处还不止于此。它不仅造成各民族彼此隔离的基础，而且造成统一的工人运动分裂的基础。民族自治的思想为统一的工人政党分成一些按民族建立的单独的政党造成一种心理上的前提。党一分裂，工会就跟着分裂，结果是彼此完全隔离。统一的阶级运动就这样分成一些单独的民族细流。

奥地利，“民族自治”的故乡，提供了这种现象的最惨痛的例证。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本是一个统一的党，从 1897 年（党的维姆堡代表大会（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维也纳代表大会，或称维姆堡代表大会，于 1897 年 6 月 6—12 日在维也纳维姆堡旅馆举行。））起它就开始分裂成几个单独的党。从党的布隆代表大会（1899 年）采纳了民族自治以后，分裂的程度更加深了，最后竟使一个统一的跨民族的

政党分成了现在的六个民族政党，其中捷克族的社会民主党甚至不愿和德意志族的社会民主党打交道。

但是工会和党是有联系的。奥地利党内和工会内的主要工作都是由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员担任的。这就令人担忧党内的分离主义会使工会也走上分离主义的道路而陷于分裂。事实果然如此：工会也按民族分开了。现在甚至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是捷克族工人破坏德意志族工人的罢工，或在选举市政机关时和捷克族资产者一起反对德意志族工人。

由此可见，民族文化自治并不能解决民族问题。不仅如此，它还使民族问题更尖锐，更紊乱，更容易使工人运动的统一遭受破坏，使工人们彼此按民族隔离开来，使他们中间的纠纷加剧下去。

这就是民族自治的收获。

五　崩得，它的民族主义，它的分离主义

面我们说过，鲍威尔虽然认为民族自治对捷克人、波兰人等是必需的，但是他反对给犹太人这种自治。对“工人阶级应否为犹太人民要求自治”这个问题，鲍威尔回答道：“民族自治不能成为犹太工人的要求。”根据鲍威尔的意见，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不让他们〈即犹太人。——约•斯大林注〉保全为一个民族”。

简言之，犹太民族将不再存在，所以无从为谁要求民族自治了。犹太人在被同化着。

对犹太民族命运所持的这种观点并不是新的。马克思早在四十年代就有过这种观点，他当时所指的主要是德国的犹太人。考茨基在 1903 年重述过这种观点（注：见他的《基什尼奥夫惨案和犹太人问题》1903 年版。），他当时所指的是俄国的犹太人。现在鲍威尔在谈到奥地利的犹太人时又重述这种观点，不过有一点差别，就是他所否认的不是犹太民族的现在，而是犹太民族的将来。

鲍威尔认为犹太人之所以不能保全为一个民族，在于“犹太人没有单独的居住地区”。这种解释基本上虽然正确，但还没有说出全部真理。问题首先在于犹太人没有一个和土地相联系的广大的稳定的阶层，这样一个阶层是不仅作为民族骨干，而且作为“民族”市场自然地把一个民族联结起来的。俄国的五六百万犹太人只有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和农业有一些联系。其余百分之九十六从事商业、工业和在城市机关中工作，一般是住在城市里，并分散在俄国各处，无论在哪一省都不占多数。

可见以少数民族资格杂居在其它民族地区的犹太人主要是以工业家、商人和自由职业者的身分为“异”族服务的，在语言等各方面自然也就适应“异族”。所有这一切，再加上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各个民族的日益杂居，就使犹太人受到同化。“特许犹太居住区”的废除只能加速这种同化。

因此，为俄国的犹太人要求民族自治的问题是有些滑稽可笑的：有人竟主张替一个前途被否定、存在与否尚待证明的民族要求自治！

虽然如此，崩得还是采取了这种滑稽可笑的动摇不定的立场，竟在其第六次代表大会上（1905 年）通过了主张民族自治的“民族纲领”。

驱使崩得走这一步的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即崩得作为犹太人的、而且仅仅作为犹太人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组织而存在。早在 1897 年以前，那些在犹太工人中进行工作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就已经打算建立一个“纯粹犹太工人组织”。1897 年，他们果然建立了这样一个组织，即联合成为崩得了。这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事实上还没有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时候。从那时起，崩得不断发展和扩大起来，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处境惨淡的时候日益显露头角……可是二十世纪到来了。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开始了。波兰社会民主党成长起来并把犹太工人吸引到群众斗争中去了。俄国社会民主党成长起来并把“崩得”工人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了。崩得那种没有地域基础的民族圈

子愈见狭小了。一个问题摆在崩得面前：或者是融化到各民族的总浪潮中去，或者是坚持自己的独立存在，做一个超地域的组织。崩得选择了后者。

所谓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唯一代表”的“理论”就这样形成了。

但是要“简单地”随便为这个奇怪的“理论”作辩护已经不可能了，必须有某种“原则性的”根据、“原则性的”理由才行。民族文化自治就成了这样的根据。崩得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那里抄袭了民族文化自治就抓住不放。即使奥地利人没有这样的纲领，崩得也一定会想出一个来，以便“从原则上”为自己的独立存在作辩护。

这样，崩得在 1901 年（第四次代表大会）作了一番怯懦的尝试以后，终于在 1905 年（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民族纲领”。

第二种情况，即犹太人作为个别的少数民族在各完整地区的其它密集的多数民族中所处的特殊地位。我们已经说过这种地位使犹太人不成其为一个民族，使他们走上被同化的道路。但这是客观的过程。主观上，在犹太人头脑中，这一过程却引起了反应，提出了保障少数民族权利、保障不受同化的问题。崩得既然宣扬犹太“民族”富有生命力，就不能不采取主张“保障”的立场；既然采取了这种立场，就不能不采纳民族自治。因为，如果崩得能够抓住什么自治，那就只能是民族自治，即民族文化自治：犹太人的地域上政治上的自治是谈不上的，因为犹太人没有一定的完整的地域。

值得注意的是崩得一开始就强调说，民族自治的特点就是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保障民族的“自由发展”。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崩得代表戈尔德勃拉特说民族自治就是“保障它们〈即各个民族。——约•斯大林注〉充分自由发展文化的机关”，这也不是偶然的。崩得思想的拥护者也是抱着这种主张加入社会民主党第四届杜马党团的……

崩得就这样采取了主张犹太人民族自治的可笑的立场。

上面我们已经分析了民族自治。这一分析说明了民族自治导致民族主义。下面我们就会看到崩得果然得到了这样的结局。不过崩得还从特殊方面即从保障少数民族权利方面来考察民族自治。我们也就从这个特殊方面来分析问题吧。这样做之所以尤其必要，是因为少数民族问题（不仅是犹太少数民族问题）对社会民主党具有重大的意义。

总之，就是“保障”各民族“充分自由发展文化的机关”。（黑体是我们用的。——约•斯大林注）

但“保障……的机关”等等究竟是什么呢？

这首先就是施普林格和鲍威尔的“民族委员会”，一种类似掌管文化事宜的议会。

可是这种机关能否保障民族“充分自由发展文化”呢？掌管文化事宜的某种议会能否保障民族免于民族主义的迫害呢？

崩得认为能保障。

但历史证明恰恰相反。

俄属波兰曾经有过议会，一种政治性的议会，它当然力求保障波兰人自由“发展文化”，可是它不但没有做到这一点，反而在同俄国总的政治条件作力量悬殊的斗争中垮台了。

芬兰早就有了议会，它也力求保护芬兰民族不受“侵犯”，但它在这方面究竟有多少成绩是有目共睹的。

当然，议会是有各种各样的，对付按民主原则组织起来的芬兰议会不象对付贵族的波兰议会那样容易。但是有决定意义的终究不是议会本身，而是俄国总的制度；如果俄国目前还象过去一样，象废除波兰议会时一样，存在着野蛮的亚洲式的社会政治制度，那么芬兰议会的处境就要坏得多。况且“侵犯”芬兰的政策正在加紧推行，决不能说这种政策遭受过失败……

历史上形成的老机关政治议会尚且如此，新的议会，新的机关，尤其象“文化”议会这样软弱的机关，就更不能保障民族的自由发展了。

问题显然不在于“机关”，而在于国内总的制度。国家没有民主化，民族“充分自由发展文化”也就没有保障。可以肯定地说，国家愈民主，对“民族自由”的“侵犯”就愈少，免受“侵犯”的保障就愈多。

俄国是半亚洲式的国家，所以这里的“侵犯”政策往往采取极粗暴的方式，即蹂躏的方式。不用说，所谓“保障”在俄国是少到最低限度的。

德国已经是多少有些政治自由的欧洲式的国家。无怪乎那里的“侵犯”政策从来不采取蹂躏的方式。

在法国，“保障”当然更多些，因为法国比德国民主。

瑞士更不用说了。那里由于有高度的、虽然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各民族都自由地生活着，不管它们是少数还是多数。

总之，崩得硬说“机关”本身能保障各民族充分发展文化，这是十分荒唐的。

也许有人会指出，崩得自己也认为俄国的民主化是“建立机关”和保障自由的先决条件。但这是不对的。从《崩得第八次代表会议文件汇编》中可以看出，崩得想在俄国现存制度的基础上通过“改革”犹太教公会去达到成立这种“机关”的目的。

有一个崩得首领在这次代表会议上说过：“犹太教公会能成为将来的民族文化自治的核心。民族文化自治是民族自我服务的形式，是满足民族需要的形式。犹太教公会这一形式也包含着同样的内容。这是一条链子的几个环节，是一个进化过程中的几个阶段。”

代表会议根据这一点决定必须争取“改革犹太教公会，通过立法程序把它变成世俗机关”，即按民主原则组织起来的机关。（黑体是我们用的。——约•斯大林注）

显然，崩得当作条件和保障的并不是俄国的民主化，而是犹太人将来的“世俗机关”，这种机关是用“改革犹太教公会”的方法，所谓根据“立法”程序，即经过杜马而成立的。

然而我们已经看到，如果在整个国家内没有民主制度，“机关”本身是不能尽“保障”之责的。

那么，在将来的民主制度下究竟怎样呢？在民主制度下是不是也需要有“保障......的”专门“文化机关”呢？例如民主的瑞士在这方面的情形是怎样的呢？那里有没有施普林格的“民族委员会”之类专门的文化机关呢？那里并没有这种机关。那么，在那里占少数的例如意大利人的文化利益是不是因此受到损害呢？这类事情还没有听说过。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瑞士国内的民主制度使一切似乎能“保障......的”专门文化“机关”都成为多余的了。

总之，现在是软弱的，将来是多余的，——民族文化自治机关就是如此，民族自治就是如此。

可是，如果把这种民族自治强加于一个存在和前途都成问题的“民族”身上，那么它的害处就更大了。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民族自治的人必然要维护和保全“民族”的一切特点，而不管它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只求“拯救民族”免于同化，只求“保全”民族。

崩得必然会走上这条危险的道路。而它事实上已走上了这条道路。我们所指的是崩得最近几次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关于“安息日”、“犹太语”等等尽人皆知的决议。

社会民主党努力为一切民族争取本族语言权，但崩得并不以此为满足，它还要求“特别坚决地”捍卫“犹太语言权”（黑体是我们用的。——约•斯大林注），而且崩得自己在第四届杜马选举时，“宁愿选举他们〈即复选代表〉中间答应捍卫犹太语言权的人”。

不是共同的本族语言权，而是单独的犹太语言权，犹太语权！让各个民族的工人首先去为本族语言而斗争：犹太人为犹太语言而斗争，格鲁吉亚人为格鲁吉亚语言而斗争等等。为各民族共同的权利而斗争是次要的事情。你尽可不承认一切被压迫民族的本族语言权，只要你承认犹太语权，你就可以放心：崩得会投票拥护你，崩得“宁愿选举”你。

那么，崩得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社会民主党要求规定每周必须有一个休息日，可是崩得并不以此为满足，它还要求用“立法程序”“保证犹太无产阶级有权过安息日，不得强迫它也过另一个节日”。

应该想到崩得会“进一步”要求有权过一切旧的犹太节日。如果崩得不幸，犹太工人已抛弃偏见，不愿过这种节日，那么崩得就要用争取过“安息日的权利”的鼓动去叫他们想起安息日，在他们身上培植所谓“安息日精神”……

因此，完全可以理解崩得第八次代表会议上许多发言人要求设立“犹太医院”的“热烈言论”，其根据是“病人在自己人中间觉得愉快些”，“犹太工人在波兰工人中间会觉得不愉快，而在犹太店铺老板中间会觉得愉快”。

保存一切犹太的东西，保全犹太人的一切民族特点，以至保全显然对无产阶级有害的特点，把犹太人和一切非犹太的东西隔开，甚至主张设立专门的医院，——请看崩得堕落到了什么地步！

普列汉诺夫同志说崩得“使社会主义迁就民族主义”，这是千真万确的。当然，弗拉•科索夫斯基和象他那样的崩得分子可以骂普列汉诺夫为“蛊惑者”（注：见《我们的曙光》杂志[《我们的曙光》（《Наща_Заря》）是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月刊，1910 年 1 月—1914 年 9 月在彼得堡出版。该杂志的领导人是亚•尼•波特列索夫，撰稿人有费•伊•唐恩、谢•奥•策杰尔包姆（弗•叶若夫）等。在《我们的曙光》杂志周围形成了一个俄国取消派的中心。]1912 年第 9—10 期第 120 页。）

（注：格•瓦•普列汉诺夫在 1912 年 10 月 2 日（公历 15 日）《护党报》第三号上发表了《又一个分裂的代表会议》一文，斥责取消派的八月代表会议，指出崩得分子和高加索社会民主党人的立场是使社会主义迁就民族主义。为此，崩得领袖弗拉•科索夫斯基用《不可宽恕的蛊惑行为》为题致函取消派杂志《我们的曙光》编辑部，以回击普列汉诺夫。）（纸上是什么都能写的），然而熟悉崩得活动的人不难看出这些勇士们就是害怕说出关于自己的实话，于是用“蛊惑人心”一类的谩骂字眼来掩护自己……

崩得在民族问题上既然采取这样的立场，在组织问题上自然就走上使犹太工人隔离的道路，走上在社会民主党内结成各民族选民团的道路。民族自治的逻辑就是如此！

崩得果然从“唯一代表”论进到工人“民族划分”论了。崩得要求俄国社会民主党“在自己的组织结构上实行按民族划分”（注：见《关于崩得第七次代表大会的通报》第 7 页）。然后，它又由“划分”论“进一步”走到了“隔离”论。无怪乎在崩得第八次代表会议上有人说“民族生存就是隔离”（注：见《崩得第八次代表会议文件汇编》第 72 页。）。

组织上的联邦制包含着瓦解和分离主义的成分。崩得正在走向分离主义。

它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它那种超地域组织的地位驱使它走上分离主义的道路。崩得没有一定的完整的地域，它是在“别人的”地域上活动的，然而和它来往密切的波兰、拉脱维亚以及俄国的社会民主党都是跨民族的地域性的集体。结果便是这些集体每扩大一步都使崩得多受一分“损失”，使崩得的活动场所缩小。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党应按民族联邦制原则实行改组，那时崩得就有可能“保障”自己拥有犹太无产阶级；或者是这些集体的跨民族的地域原则仍然有效，那时崩得就要象波兰和拉脱维亚的社会民主党那样按跨民族的原则实行改组。

崩得一开始就要求“俄国社会民主党按联邦制原则实行改组”（注：见《民族自治和按联邦制原则改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问题》1902 年崩得版。），原因就在这里。

1906 年，崩得向下层群众要求统一的浪潮让步而选定了中间道路，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但它是怎样加入的呢？波兰和拉脱维亚的社会民主党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党是为了和平地共同进行工作，但崩得加入的目的是为联邦制而战斗。崩得首领麦迭姆当时就是这样说的：

“我们不是为了太平生活，而是为了斗争才加入的。太平生活是没有的，只有马尼洛夫（注：马尼洛夫是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游手好闲、痴心妄想、阿谀逢迎和虚假伪善的地主。马尼洛夫精神是想入非非的意思。）之流才会盼望在最近的将来能享受太平生活。崩得应当从头到脚地武装起来去加入党。”（注：见 1906 年在维尔纳出版的《我们的言论》杂志[《我们的言论》（《Наще Слово》）是崩得的合法周刊，1906 年在维尔诺出版，共出了九期。]第 3 期第 24 页。）

如果认为这是出于麦迭姆的恶意，那就错了。问题并不在于恶意，而在于崩得的特殊立场，由于这种立场，它就不能不和建立在跨民族的原则上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作斗争。崩得既然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作斗争，自然就破坏了统一的利益。最后，事情竟发展到崩得违背了党章，在选举第四届杜马时联合波兰民族主义者反对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因而和俄国社会民主党正式决裂。

显然，崩得认为决裂是它的独立自主活动最好的保障。

组织上“划分”的“原则”就这样导致了分离主义，引起了完全决裂。

从前崩得和旧《火星报》（注：《火星报》（《ИСкра》）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由列宁创办。创刊号于 1900 年 12 月在莱比锡出版，以后在慕尼黑、伦敦出版，自 1903 年春起在日内瓦出版。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列

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巴•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自 1901 年 4 月起，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任编辑部的秘书。列宁实际上是《火星报》的主编和领导者。1900—1903 年列宁在《火星报》上发表了五十多篇论文，阐述了有关党的建设和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并对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作了评论。《火星报》从国外秘密运进俄国散发，其中一部分曾由国内秘密印刷所翻印。《火星报》在俄国国内有代办员网，代办员在俄国传播《火星报》思想和建立火星派组织。《火星报》在建立俄国工人阶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承认它为党的中央机关报。《火星报》在 1903 年 10 月出版第五十一号后，被普列汉诺夫支持下的一些孟什维克分子所篡夺。列宁于 1903 年 11 月 1 日退出了编辑部。从第五十二号起，《火星报》成了孟什维克的机关报。因此，人们把五十一号以前的《火星报》称作旧《火星报》，以后的称作新《火星报》。——第 20、26、100、174、256、498 页。）辩论联邦制问题时说：

“《火星报》想使我们相信崩得同俄国社会民主党建立联邦关系一定会削弱它们之间的联系。我们不能援引俄国的实践来驳斥这种意见，原因很简单：俄国社会民主党不是联邦制的团体。然而我们可以援引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大有教益的经验，因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根据 1897 年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而变成了一个联邦性的组织。”（注：见《民族自治……问题》（指《民族自治和按联邦制原则改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问题》。——编者注））

这是在 1902 年写的。

现在已经是 1913 年了。现在我们有了俄国的“实践”，也有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经验”。

这些“实践”和“经验”究竟说明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大有教益的经验”吧。1896 年以前，奥地利还存在着统一的社会民主党。就在这一年，捷克人在伦敦国际代表大会（注：伦敦国际代表大会　即第二国际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于 1896 年 7 月 27 日—8 月 1 日召开。大会讨论了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问题、战争问题、土地问题和民族问题等。）上首先要求单独的代表权，并取得了这种代表权。1897 年，在党的维也纳（维姆堡）代表大会上正式取消统一的党，而成立了六个民族“社会民主主义团体”组成的联邦制同盟。后来这些“团体”又都变成了独立的政党。这些政党彼此又渐渐断绝了关系。接着议会党团也随着党而分裂，成立了几个民族“俱乐部”。后来工会也按民族分裂了，最后甚至连合作社也被殃及了，捷克分离主义者竟号召工人拆散合作社。（注：见《分离主义的文件》第 29 页所援引的瓦涅克的小册子的这些话。）至于分离主义的鼓动会削弱工人的团结精神，往往推动他们走上破坏罢工的道路，那就更不用说了。

总之，“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大有教益的经验”证明崩得是错误的，旧《火星报》是正确的。奥地利党内联邦制造成了最恶劣的分离主义，破坏了工人运动的统一。

上面我们已经看到，“俄国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崩得分离主义者也象捷克分离主义者一样和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决裂了。至于工会，崩得的工会，那么它们一开始就是按民族原则组织起来的，就是说，和其它民族的工人是隔绝的。

完全隔离，完全决裂，——这就是联邦制在“俄国的实践”所表明的。

这种情形自然要削弱工人的团结精神，使他们的士气涣散，而且这种涣散现象也侵入崩得里面了。我们指的是犹太工人和波兰工人因失业问题而发生日益频繁的冲突。请看崩得第九次代表会议关于这个问题所发的议论吧：

“……我们把排挤我们的波兰工人看成暴徒，看成黄色工人；我们不支持他们的罢工，而要破坏他们的罢工。第二，我们用排挤对付排挤：他们不许犹太工人进工厂做工，我们就不许波兰工人进手工作坊做工……如果我们不把这件事抓

到自己手里来，工人就会跟着别人走。”（注：见《崩得第九次代表会议文件汇编》第 19 页）（黑体是我们用的。——约•斯大林注）

崩得代表会议就是这样谈论团结精神的。

这真是登峰造极的“划分”和“隔离”。崩得已经达到了目的：它已经把各民族的工人划分得厮打起来，划分得破坏起罢工来了。不这样是不行的，因为“如果我们不把这件事抓到自己手里来，工人就会跟着别人走”……

工人运动的瓦解，社会民主党队伍中士气的涣散，——这就是崩得联邦制造成的恶果。

由此可见，民族文化自治的思想及其所造成的气氛，在俄国比在奥地利更为有害。

六　高加索人，取消派代表会议

前面我们已经说到，抵挡不住民族主义“时疫”的一部分高加索社会民主党人发生了动摇。这种动摇表现在这些社会民主党人步崩得的后尘（虽然这很奇怪）而宣布了民族文化自治。

全高加索实行区域自治，高加索境内各民族实行民族文化自治，——上述社会民主党人（顺便说一下，他们是附和俄国取消派的）就是这样表述自己的要求的。

请听听他们公认的领袖，并非无名的诺某所说的话吧：

“谁都知道，高加索无论按居民的人种成分或按地域和农业文化来说，都和中部各省大不相同。要开发并在物质上发展这样的边疆区，就需要有本地的工作人员，需要有熟悉当地特点、习惯于当地气候和文化的行家。一切以开发本地为目的的法律都必须由当地颁布，并由当地人才去执行。因此，颁布有关当地各项问题的法律属于高加索中央自治机关的职权范围……所以高加索中央机关的职权

就在于颁布旨在开发本地经济富源，促使边疆区物质繁荣的法律。”（注：见格鲁吉亚文的《我们的生活报》（《我们的生活报》是格鲁吉亚孟什维克的日报，于1912年7月1—22日在库塔伊斯用格鲁吉亚文出版。）1912年第12号。）

总之，就是高加索的区域自治。

诺某对理由的说明有点语无伦次，互不连贯，如果撇开这点不谈，那就应该承认他的结论是正确的。由于高加索居民成分及其生活条件有许多特点，在全国性的宪法范围内（这一点诺某也不否认）实行高加索区域自治确实是必要的。这一点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也承认了的，它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曾宣布："在生活条件和居民成分与俄国本土各地区不同的边疆地区实行区域自理。"

马尔托夫把这一条提交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时，曾这样申述其理由："俄国幅员的辽阔和我们的集中管理的经验，使我们有理由认为在芬兰、波兰、立陶宛和高加索这样大的地域单位实行区域自理是必要而合理的。"

由此可见，应当把区域自理了解为区域自治。

但是诺某还要更进一步。他认为高加索区域自治所包括的"只是问题的一方面"。

"到现在为止，我们所说的只是本地生活的物质上的发展。但可以促进边疆区经济发展的不仅是经济上的活动，而且还有精神上文化上的活动……""文化上很强的民族，在经济方面也是很强的……""但是只有用民族的语言才能发展民族的文化……""因此，凡与本族语言有关的问题都是民族文化问题。教育、诉讼、教会、文学、艺术、科学、戏剧等等问题便是这样的问题。从物质上发展边疆区的事业把各民族联合在一起，而民族文化事业却使各民族彼此分开，使每个民族单独进行活动。前一种活动是和一定的地域相联系的……""民族文化事业则不然。这种事业并不和一定的地域相联系，而和一定民族的存在相联系。格鲁吉亚语言的命运是任何地方的格鲁吉亚人同样关心的。如果以为格鲁吉亚文化只和住在格

鲁吉亚的格鲁吉亚人有关，那就太无知了。举亚美尼亚的教会为例。各地和各国的亚美尼亚人都参加管理教会的事务，地域在这里是不起任何作用的。或者，例如创办格鲁吉亚博物馆，无论梯弗利斯的格鲁吉亚人或巴库、库塔伊斯、彼得堡及其它各地的格鲁吉亚人都是关心的。这就是说，一切民族文化事业均应由各有关民族自己去掌管和领导。我们主张高加索各民族实行民族文化自治。"（注：见格鲁吉亚文的《我们的生活报》1912 年第12 号。）

简言之，文化不等于地域，地域也不等于文化，所以必须实行民族文化自治。诺某可以替民族文化自治辩护的不过如此而已。

我们在这里不再一般地谈民族文化自治，因为前面我们已经把它的坏处说明了。现在我们只想指出，民族文化自治不但毫无用处，而且从高加索的条件来看，是毫无意义和荒谬绝伦的。

原因如下：

民族文化自治是以具有发达的文化和文学（注："文学"一词俄文是"лиТераТура"，这里泛指书面著作。——编者注）的、较为发达的民族为前提的。没有这些条件，这种自治就会失去任何意义而变为无稽之谈。但是高加索许多民族只有原始的文化，它们虽有特殊的语言，但没有本民族的文学；况且这些民族都处于过渡阶段，一部分在被同化，一部分在向前发展。怎样在它们那里实行民族文化自治呢？怎样对待这些民族呢？怎样按民族文化自治所肯定要求的那样把它们"组织"成一些单独的民族文化联盟呢？

怎样对待那些操着不同的语言但没有自己的文学的明格列里亚人、阿布哈兹人、阿扎尔人、斯万人、列兹金人等呢？应当把他们列入哪个民族呢？能不能把他们"组织"成一些民族联盟呢？应当以什么"文化事业"为中心把他们"组织"起来呢？

怎样对待那些在南高加索正受格鲁吉亚人同化（但还远没有完全被同化）、在北高加索一部分正受俄罗斯人同化、一部分又正在向前发展、创造着本民族文学的奥塞梯人呢？怎样把他们“组织”成统一的民族联盟呢？

把那些操着格鲁吉亚语言但过着土耳其文化生活并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扎尔人列入哪个民族联盟呢？是不是以宗教事业为标准叫他们脱离格鲁吉亚人而单独“组织”起来，同时又以其它文化事业为标准叫他们和格鲁吉亚人一起“组织”起来呢？还有科布列特人呢？英谷什人呢？英格洛伊人呢？

把许多民族屏弃在外，这算什么自治呢？

不，这并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办法，这是胡思乱想的结果。

好吧，我们就来假设一下不可假设的东西，假定我们这位诺某的民族文化自治已经实现了，那么它会把事情弄到什么地步，会导致什么结果呢？例如拿南高加索那些识字人数的百分比少到最低限度、学校由支配一切的毛拉主持、文化渗透了宗教精神的鞑靼人来说吧……不难了解，把他们“组织”成民族文化联盟，就是让毛拉骑在他们头上，就是任凭反动的毛拉去宰割他们，就是替鞑靼群众的死敌建立一座在精神上奴役这些群众的新堡垒。

可是，社会民主党人从什么时候起开始给反动分子助长声势呢？

把南高加索的鞑靼人圈到一个替最凶恶的反动分子奴役群众的民族文化联盟中去，——难道高加索取消派再不能“宣布”一种较好的办法吗？……

不，这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办法。

只有把后进的民族纳入高度文化的总轨道才能解决高加索的民族问题。只有这种解决方法才是社会民主党所能采纳的进步的解决方法。高加索区域自治之可以采纳，在于它把后进的民族引上总的文化发展的大道，帮助它们跳出小民族闭关自守的狭隘范围，推动它们前进，使它们易于享受高度文化的成果。民族文化

自治却适得其反，因为它把各民族禁锢在旧的狭隘范围内，把它们固定在文化发展的低级阶段，妨碍它们走上高级的文化阶段。

因此，民族自治使区域自治丧失它的优点，把区域自治化为乌有。

正因为如此，诺某所提议的那种混合式的自治，即将民族文化自治和区域自治配合起来的自治，也是毫无用处的。这种反常的配合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因为它除了阻碍后进的民族的发展以外，还会把区域自治变成被组织在民族联盟内的各民族互相冲突的舞台。

这样，毫无用处的民族文化自治，在高加索就会变成毫无意义的反动的妄想了。

诺某及其高加索同道者的民族文化自治就是如此。

高加索取消派是否会“进一步”，是否会在组织问题上也效法崩得，这有待将来的事实证明。到现在为止，在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中总是先有组织上的联邦制，然后才有纲领上的民族自治。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从 1897 年起实行了组织上的联邦制，而民族自治是两年以后（1899 年）才采用的。崩得分子第一次明确地叫喊民族自治是在 1901 年，而组织上的联邦制远自 1897 年就实行了。

高加索取消派是从末尾开始，即从民族自治开始做起的。如果他们还继续跟着崩得走，那么他们就得先把目前这个早在九十年代末根据跨民族的原则建立起来的组织机构全部摧毁。

但是采用工人暂时尚不明了的民族自治是很容易的，而要摧毁高加索各民族的工人苦心培育出来、多年建立起来的机构，那就很困难了。只要一开始实行这种赫罗斯特拉特（注：赫罗斯特拉特　是公元前四世纪的希腊人。据传说，他为了留名于后世，竟纵火焚烧了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爱非斯城阿尔蒂米斯神殿。后来“赫罗斯特拉特”一词成了为追求个人名声而不惜犯罪的人们的通称。）的想法，工人们就会睁开眼睛，看出民族文化自治的民族主义实质了。

如果说高加索人用来解决民族问题的是一种平常的方式，即口头讨论和文字辩论的方式，那么取消派的全俄代表会议却想出了一种完全不平常的方式。一种简便的方式。请听吧：

“听取了高加索代表团……关于必须提出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的报告以后，代表会议对这一要求的实质不表示意见，确认对纲领中承认每一民族均有自决权的条文作这种解释和纲领原意并不抵触。”

总之，首先是“对这一”问题的“实质不表示意见”，然后却来“确认”。真是一种新奇的方式……

究竟这个新奇的代表会议“确认”了什么呢？

就是确认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是和承认民族自决权的纲领的“原意并不抵触”的。

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论点吧。

民族自决的条文所说的是民族权利。根据这个条文，民族不仅有权实行自治，而且有权实行分离。条文上所讲的是政治上的自决。取消派竟企图曲解整个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早已规定的这种政治上的民族自决权，这想欺骗谁呢？

或许取消派会规避问题，用诡辩为自己辩护，说民族文化自治和民族权利“并不抵触”吧？也就是说，如果某个国家的一切民族都同意按民族文化自治原则处理自己的事情，那么所有这些民族就完全有权这样去做，谁也不能强迫它们接受别的政治生活方式。真是既新颖又聪明。是否还要加上一句：一般讲来，民族有权废除自己的宪法，有权用专横制度代替宪法，有权恢复旧制度，因为民族，也只有民族本身才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重说一遍：在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民族文化自治或任何一种民族的反动措施都和民族权利“并不抵触”。

可敬的代表会议想说的是不是这一点呢？

不，不是这一点。它分明说：民族文化自治不是和民族权利，而是和纲领“原意”“并不抵触”。这里所说的是纲领，而不是民族权利。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某个民族向取消派代表会议请求指示，那么代表会议就会直接确认民族有民族文化自治权。但是向代表会议请求指示的并不是民族，而是高加索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团”，不错，他们是一些不好的社会民主党人，但毕竟是社会民主党人。并且他们所过问的不是民族权利，而是民族文化自治是否和社会民主党的原则矛盾，是否和社会民主党纲领的“原意”“抵触”？

总之，民族权利和社会民主党纲领的“原意”并不是一个东西。

显然也有这么些要求，它们虽然和民族权利并不抵触，但可能和纲领的“原意”抵触。

例如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上有信教自由一条。按照这一条，任何一群人都有权信奉任何一种宗教：天主教、东正教等。社会民主党反对一切宗教压制，反对压制东正教徒、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这是否就意味着天主教和新教等和纲领“原意并不抵触”呢？不，不是这个意思。社会民主党始终反对压制天主教和新教，始终维护各民族有信奉任何一种宗教的权利，但同时它要根据正确理解的无产阶级的利益去进行反对天主教、反对新教和反对东正教的宣传，以便获得社会主义世界观的胜利。

社会民主党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等等无疑是和纲领“原意抵触”的，即和正确理解的无产阶级的利益抵触的。

自决权问题也是如此。各民族有权按照自己的愿望处理自己的事情，有权保存自己的任何一种民族机关，无论是有害的还是有益的，谁也不能（没有权利！）用强迫手段干涉各民族的生活。但这并不是说社会民主党就不进行斗争，不进行鼓动，以反对各民族的有害的机关，反对各民族的不适当的要求。相反地，社会民主党必须进行这种鼓动，必须努力影响各民族的意志，使各民族按照最符合于

无产阶级利益的方式来处理本民族的事情。正因为如此，社会民主党要为民族自决权而斗争，同时要进行鼓动，比方说，既要反对鞑靼人实行分离，又要反对高加索各民族实行民族文化自治，因为二者虽然和这些民族的权利并不抵触，可是和纲领的“原意”抵触，即和高加索无产阶级的利益抵触。

显然，“民族权利”和纲领的“原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纲领的“原意”表现无产阶级在自己的纲领中科学地规定的利益，民族权利却可以表现任何阶级——资产阶级、贵族和僧侣等等——的利益，这要看这些阶级的势力和影响而定。一个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义务，一个是由各阶级所组成的民族的权利。谈论民族权利和社会民主主义原则是否“抵触”，正象谈论奇阿普斯金字塔（注：奇阿普斯金字塔是埃及最大的金字塔，古埃及第四王朝法老奇阿普斯（约公元前二十七世纪时在位）的陵墓，位于开罗附近的吉萨，高一百四十六点五米，底边各长约二百三十米，用了二百余万块每块平均重两吨半的巨石，不施泥灰，叠砌而成。）和臭名远扬的取消派代表会议是否“抵触”一样，二者是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的。

由此可见，可敬的代表会议竟无可宽恕地把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混淆起来了。结果得到的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办法，而是一套谬论，依照这种谬论，民族权利和社会民主党的原则“并不抵触”，因此，民族的每一要求都能和无产阶级的利益兼容，因此，力求自决的民族的任何一种要求都不会和纲领的“原意抵触”！

他们太滥用逻辑了……

在这套谬论的基础上，也就产生了取消派代表会议臭名远扬的决议，按照这个决议，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和纲领的“原意并不抵触”。

但是取消派代表会议所违背的不仅是逻辑的规律。

它还违背它对俄国社会民主党所负的义务，批准了民族文化自治。它确实违背纲领的“原意”，因为大家知道，通过这个纲领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是断然否决了民族文化自治的。请看这次代表大会上有关这个问题的发言吧：

“戈尔德勃拉特〈崩得分子〉说：……我认为必须设立一些能保障各民族自由发展文化的特别机关，因此我提议在第八条上补充一句：‘并设立一些保障它们充分自由发展文化的机关。’〈大家知道，这就是崩得的民族文化自治的条文。——约•斯大林注〉

马尔丁诺夫指出，应该设立也能保障局部利益的总机关，任何保障民族自由发展文化的特别机关都是不能设立的。

叶哥罗夫说：在民族问题方面，我们只能采纳消极的建议，就是说，我们反对对民族的一切限制。但某一民族是否会作为一个民族发展下去，这和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无关。这是一个自发的过程。

科尔佐夫说：崩得代表一听见有人说到他们的民族主义就感到委屈。然而一位崩得代表提出的修正案却带着纯粹民族主义的性质。他们竟要求我们采取非常积极的办法去维持那些甚至已在衰亡的民族。”

……结果，“戈尔德勃拉特的修正案以多数对三票被否决了”。

总之，取消派代表会议显然是和纲领的“原意抵触”的。它违背了纲领。

现在取消派企图为自己辩护，竟求援于斯特哥尔摩代表大会（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　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于 1906 年 4 月 10—25 日（公历 4 月 23 日—5 月 8 日）举行。大会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土地纲领问题、对目前形势和无产阶级的任务的估计、对国家杜马的态度、武装起义问题等。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都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列宁就以上主要问题作了报告或发言，并参加了党章起草委员会的工作。斯大林化名伊万诺维奇代表梯弗利斯布尔什维克组织出席大会。他在大会关于土地纲领、对目前形势的估计和国家杜马等问题的辩论中曾几次发言，并发表声明，用具体事实揭露了南高加索孟什维克对于国家杜马、对于和崩得订立协约等等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策略。由于布尔什维克占多数的工业区党组织在 1905 年十二月起义时和起

义后遭到严重破坏，孟什维克在代表大会上占了多数。这种情况决定了大会在许多问题上通过的决议具有孟什维克的性质。但孟什维克也被迫接受了列宁拟订的关于党员资格的党章第一条条文，从而否定了马尔托夫的机会主义条文。孟什维克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中占多数，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则全是孟什维克。列宁和斯大林对这次代表大会工作的分析，见《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似乎这次大会批准了民族文化自治。例如弗拉•科索夫斯基写道：

“大家知道，根据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达成的协议，崩得可以保留自己的民族纲领（直到民族问题在全党代表大会上获得解决时为止）。这次代表大会承认了民族文化自治无论如何和全党纲领并不抵触。”

但取消派的企图是徒然的。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并没有考虑批准崩得的纲领，而只同意暂时把这一问题作为悬案。勇敢的科索夫斯基竟没有勇气说出全部真情。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且看：

“加林提出修正案：‘民族纲领问题因代表大会没有讨论而留作悬案。’（五十票赞成，三十二票反对。）

有人问：留作悬案是什么意思？

主席答：我们说把民族问题留作悬案，这就是说，崩得在下届代表大会以前可以保留自己对这一问题所作的决定。”（黑体是我们用的。——约•斯大林注）

可见代表大会甚至“没有讨论”崩得的民族纲领这一问题，只是把它留作“悬案”，让崩得自己在下届全党代表大会以前去决定自己纲领的命运。换句话说，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规避了这个问题，对民族文化自治未置可否。

可是取消派代表会议对这个问题作了十分确定的评价，认为民族文化自治可以采纳，并根据党纲批准了它。

差别是有目共睹的。

由此可见，取消派代表会议虽然用尽了一切狡猾手段，但并不能使民族问题有丝毫进展。

在崩得和高加索民族主义取消派面前献媚，——这就是代表会议所能施展的全副本领。

七　俄国的民族问题

最后，我们还必须提出一个积极解决民族问题的办法。

我们的出发点是：民族问题只有同俄国目前的形势密切联系起来才能得到解决。

俄国正处在过渡时期，“正常的”“宪制的”生活还没有确立，政治的危机还没有克服。狂风暴雨和“闹纠纷”的日子还在前面。因此，现在和将来的运动就是争取完全民主化的运动。

民族问题也应该同这个运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总之，国家完全民主化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基础和条件。

在解决问题时，不仅要估计到国内的情况，而且要估计到国外的情况。俄国位于欧洲和亚洲之间，奥地利和中国之间。民主主义在亚洲的增长是必不可免的。帝国主义在欧洲的增长不是偶然的。资本在欧洲已感到地盘狭小，于是冲入异国去寻找新的市场、廉价的劳动力、新的投资场所。但是这就会引起国际纠纷和战争。谁也不能说巴尔干战争（注：指 1912 年 10 月 9 日爆发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战争的一方是由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门的内哥罗组成的巴尔干同盟，另一方是土耳其。结果土耳其战败。根据 1913 年 5 月 30 日签订的伦敦和约，马其顿等地区摆脱了土耳其的统治。）是纠纷的终结，而不是纠纷的开始。因此，完全可能造成一种内外形势结合在一起的局面，那时俄国某个民族将认为必须提出和解决本身独立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加以阻碍，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事情。

由此可见，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主张民族自决权。

总之，自决权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

其次，对那些由于某种原因而宁愿留在整体范围内的民族怎么办呢？

我们已经知道民族文化自治是不适用的。第一，它是人为的，没有生命力的，因为它要把一些被实际生活拆散和转移到全国各地去的人勉强凑成一个民族。第二，它驱使大家走向民族主义，因为它主张人们按民族标准“划分”，主张“组织”民族，主张“保全”和培植“民族特点”，——这些都绝非社会民主党所应做的事情。莱希斯拉特中的摩拉维亚族分离主义者离开德意志族社会民主党议员而同摩拉维亚族资产阶级议员合并为一个所谓摩拉维亚“议员团”，这不是偶然的。崩得的分离主义者沉溺于民族主义，赞美“安息日”和“犹太语”，这也不是偶然的。在杜马中还没有崩得议员，在崩得活动的区域里却有教权主义的反动的犹太教公会，崩得目前就在这个公会的“领导机关”里策划犹太工人和犹太资产者“合伙”（注：《崩得第八次代表会议文件汇编》中关于犹太教公会的决议结尾部分。）。民族文化自治的逻辑本来就是如此。

总之，民族自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出路何在呢？

正确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区域自治，就是象波兰、立陶宛、乌克兰、高加索等固定了的地域单位的自治。

区域自治的优点首先在于实行的时候所遇到的不是没有地域的空中楼阁，而是居住于一定地域上的一定居民。其次，区域自治不是把人们按民族划分的，不是巩固民族壁垒的，相反地，是打破这种壁垒，把居民统一起来，以便为实现另一种划分即按阶级划分开辟道路的。最后，它使大家不必等待整个中央机关的决议而能最适当地利用本地区的天然富源并发展生产力，——这样的职能是民族文化自治所没有的。

总之，区域自治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

无疑地，不论哪一个地区都不是清一色的单一民族区，因为每个地区里都杂居着少数民族。例如波兰有犹太人，立陶宛有拉脱维亚人，高加索有俄罗斯人，乌克兰有波兰人等等。因此，有人就要担心少数民族会受多数民族的压迫。但是只有当国家还保存着旧制度的时候，这种担心才有根据。如果国家具有完备的民主制度，这种担心就失去任何根据了。

有人提议把散居各地的少数民族结成一个统一的民族联盟。但少数民族所需要的不是人为的联盟，而是它们在当地拥有的真正权利。没有完全的民主化，这种联盟能给它们什么呢？或者有了完全的民主化，民族联盟又有什么必要呢？

少数民族特别关心的是什么呢？

少数民族感到不满的不是没有民族联盟，而是没有使用本族语言的权利。让它们使用本族语言，这种不满就会自行消失了。

少数民族感到不满的不是没有人为的联盟，而是它们没有本族的学校。给它们这种学校，这种不满就失去任何根据了。

少数民族感到不满的不是没有民族联盟，而是没有信仰（信教）、迁徒等等的自由。给它们这种自由，它们就不再会不满了。

总之，在一切方面（语言、学校等等）实行民族平等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因此，必须在国家完全民主化的基础上颁布全国性的法律，无例外地禁止民族享有任何特权，禁止对少数民族权利加以任何妨碍或限制。

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实际地而不是纸上空谈地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

关于组织上的联邦制和民族文化自治彼此之间有没有逻辑上的联系，可争论可不争论。但民族文化自治替那种可能演变为完全分裂即演变为分离主义的、漫无边际的联邦制造成有利条件，却是无可争辩的。如果奥地利的捷克人和俄国的崩得分子从自治开始，继而进到联邦制，最后竟转到分离主义，那么无疑地，民

族文化自治自然而然造成的民族主义气氛，在这方面是起了巨大的作用的。民族自治和组织上的联邦制携手并进不是偶然的。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两者都要求按民族划分，两者都提议按民族进行组织。相同处是没有疑问的，不同的只是前者要求划分全体居民，后者则要求划分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员。

我们知道按民族划分工人会引起怎样的结果。统一的工人政党的瓦解，工会按民族的分裂，民族纠纷的尖锐化，民族的破坏罢工行为，社会民主党队伍中士气完全涣散，——这就是组织上实行联邦制的结果。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和俄国崩得的活动都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对付这种情况的唯一手段就是根据跨民族的原则来进行组织。

在各地把俄国各民族的工人结合成统一的完整的集体，再把这些集体结合成统一的党，——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显而易见，这样建党并不是排斥而是预计到在统一的党的整体内实行广泛的区域自治。

高加索的经验表明这种组织形式是完全适当的。如果说高加索人已经能够消除亚美尼亚工人和鞑靼工人间的民族纠纷，如果说他们已经能够使居民避免互相残杀和互相枪击，如果说在巴库这个民族杂处的地方现在已经没有发生民族冲突的可能，如果说在那里已经能够把工人群众纳入强大运动的统一轨道，那么，高加索社会民主党的跨民族的建党原则在这方面是起了不小作用的。

组织形式不仅影响到实际工作，它还在工人的全部精神生活上打上不可磨灭的烙印。工人过着自己的组织的生活，在自己的组织中获得精神上的发展并受到教育。他既在自己的组织中交往，每次都在那里和其它民族的同志相见，和他们一起在共同集体的领导下进行共同的斗争，当然就深刻地意识到工人首先是一个阶级家庭中的成员，是统一的社会主义大军中的成员。这对于工人阶级的广大阶层就不能不有极大的教育意义。

因此，跨民族的组织形式是培养同志情感的学校，是拥护国际主义的最强有力的鼓动。

按民族建立的组织却不然。工人如按民族来组织，就会局限在民族的小圈子里，彼此被组织上的壁垒隔离开来。这样，所强调的就不是工人彼此共同之点，而是他们彼此不同之点。在这里，工人首先是自己民族中的一员，如犹太人、波兰人等等。无怪乎组织上的民族联邦制只能使工人养成民族隔离的精神。

因此，民族的组织形式是培养民族狭隘性和民族保守性的学校。

这样，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两种原则上不同的组织形式：各民族团结的形式和在组织上按民族“划分”工人的形式。

调和这两种形式的尝试直到今天也没有什么成绩。奥地利社会民主党 1897 年在维姆堡制定的调和性的章程已成了废物。奥地利党已经四分五裂，并殃及了工会。“调和”原来不仅是空想的，而且是有害的。施特拉塞尔说得对：“分离主义在党的维姆堡代表大会上初次奏了凯歌。”（注：见他的《工人和民族》1912 年版。）俄国的情形也是如此。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和崩得的联邦制所达成的“调和”，结果是完全破产了。崩得破坏了斯德哥尔摩的妥协。从斯德哥尔摩大会后第一天起，崩得就成了各地工人联合为各族工人统一组织的道路上的绊脚石。虽然俄国社会民主党在 1907 年和 1908 年再三要求最后实现各族工人自下而上的统一（注：关于统一民族组织问题，在 1907 年 11 月 5—12 日（公历 18—25 日）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会议（“第三次全俄代表会议”）和 1908 年 12 月 21—27 日（公历 1909 年 1 月 3—9 日）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会议（“1908 年全俄代表会议”）的决议中都作了规定。），但崩得还是顽固地继续实行它的分离主义的策略。崩得起初主张实行组织上的民族自治，继而事实上已转到联邦制，以便最后完全决裂，实行人分离主义。它既然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决裂，也就给俄国社会民主党带来了离散和混乱。我们不妨回忆一下亚格洛事件

（注：亚格洛事件　发生在 1912 年。叶•约•亚格洛是波兰社会党党员，在崩得和波兰社会党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为反对波兰社会民主党人而组成的联盟的支持下，被华沙市选为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以孟什维克的七票对布尔什维克的六票通过决议，接受亚格洛为社会民主党党团的成员。)。

因此，“调和”的办法应该抛弃，因为它是空想的，有害的。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接受崩得的联邦制，那么俄国社会民主党就要根据按民族“划分”工人的原则来实行改组；或者是采取跨民族的组织形式，那么崩得就要根据地域自治的原则，按照高加索、拉脱维亚和波兰的社会民主党的榜样来实行改组，而为犹太工人和俄国其它各族工人的直接统一开辟道路。

中间道路是没有的：原则只会战胜，不会“调和”。

总之，工人的民族间团结的原则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

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

斯大林（1918 年 11 月）

民族问题不能认为是什么独立自在的、一成不变的问题。民族问题只是改造现存制度总问题的一部分，它完全是由社会环境的条件、国家政权的性质并且一般地是由社会发展的全部进程决定的。这在俄国革命时期表现得特别明显，当时民族问题和俄国边疆地区的民族运动随着革命的进程和结局而迅速和明显地改变自己的内容。

一 二月革命和民族问题

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一九一七年二月)，各边疆地区的民族运动带有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性质。世世代代受“旧制度”压迫和剥削的俄国各民族，初次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并奋起投入反对压迫者的战斗。“消灭民族压迫”，这就是当时运动的口号。俄国各边疆地区转瞬间布满了“全民族”机关。领导运动的是各民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边区、立陶宛、格鲁吉亚、阿尔明尼亚、阿捷尔拜疆、北高加索、柯尔克兹和伏尔加河中游地区的“民族委员会”；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拉达”；贝萨拉比亚的“斯法图尔—采利”；克里木和巴什基里亚的“库鲁尔泰”；土尔克斯坦的“自治政府”，——这些就是各民族的资产阶级把各种力量聚集在它们周围的“全民族”机构。当时的问题是摆脱沙皇制度这一民族压迫的“基本原因”和成立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当时民族自决权被解释为各边疆地区民族的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利用二月革命成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的权利。革命进一步发展的问题，没有列入而且也不能列入上述资产阶级机构所考虑的范围之内。并且没有注意到，前来代替沙皇制度的是赤裸裸的、不

戴假面具的帝国主义，这个帝国主义是各民族的更强大更危险的敌人，它是新的民族压迫的基础。

但是，沙皇制度的消灭和资产阶级的当政并没有使民族压迫消灭。旧的粗暴的民族压迫形式，被新的精致的因而是更危险的压迫形式所代替。李沃夫—米留可夫—克伦斯基政府不但没有放弃民族压迫的政策，而且还组织了反对芬兰（一九一七年夏季解散议会)和乌克兰（捣毁乌克兰的文化机关)的新进攻。不仅如此，这个本性是帝国主义的政府为了征服新的土地、新的殖民地和民族，还号召居民继续进行战争。推动这个政府这样做的，不仅是帝国主义的内在本性，而且还由于西方存在着老帝国主义国家，这些国家不可抑制地力图统辖新的土地和民族，有使这个政府势力范围缩小的危险。帝国主义国家为征服小民族而进行斗争（这些国家生存的条件)，——这就是在帝国主义战争进程中展现的一幅图画。沙皇制度的消灭和米留可夫—克伦斯基政府的上台，丝毫没有使这幅丑恶的图画有一点改观。既然各边疆地区的“全民族”机构表现出实现国家独立的趋向，自然它们就遭到俄国帝国主义政府方面的猛烈反对。既然它们在建立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权的时候，把“自己的”工人和农民的根本利益置诸不顾，所以就引起了工人和农民的埋怨和不满。所谓“民族部队”只是火上加油：对付从上面来的危险，它们无能为力，而从下面来的危险，它们又只能使它加强和加深。“全民族”机构既无法抵御外来的打击，又无法对付内部的爆发。刚刚萌芽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还没有来得及开花，就开始凋谢了。

这样，对于自决原则的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解释就成了空谈，失去了它的革命意义。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就谈不到消灭民族压迫和确保小民族国家的独立了。显然，不同帝国主义决裂，不推翻“自己的”民族资产阶级，不由劳动群众自己来掌握政权，被压迫民族劳动群众是不能解放的， 民族压迫是不能消灭的。

这在十月革命以后表现得特别明显。

二 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

二月革命包含着不可调和的内部矛盾。革命是由工人和农民 （士兵)的努力完成的，但是革命的结果，政权不是归工人和农民，而是归资产阶级所有了。工人和农民进行革命，是想要结束战争，取得和平。但是掌握了政权的资产阶级，却力图利用群众的革命热情来继续战争，反对和平。国内的经济破坏和粮食恐慌要求为了工人的利益剥夺资本和工业企业，为了农民的利益没收地主的土地，但是米留可夫—克伦斯基的资产阶级政府却保卫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坚决保护他们，使他们不受工人和农民的侵害。这是靠工人和农民的手进行的有利于剥削者的资产阶级革命。

当时国家仍然呻吟在帝国主义战争、经济崩溃和粮食恐慌的重压之下。前线土崩瓦解。工厂时常停工。国内饥荒日益严重。含有内部矛盾的二月革命显然不足以“救国”了。米留可夫—克伦斯基政府显然没有能力来解决革命的根本问题了。

为了使国家摆脱帝国主义战争和经济崩溃的绝境，必须实行新的**社会主义**革命。

这个革命随着十月变革而到来了。

十月革命推翻了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政权，而代之以工人和农民的政府，一举而解决了二月革命的矛盾。废除地主富农的无限权力，把土地交给农村的劳动群众使用；没收工厂，把它们交给工人管理；同帝国主义决裂，结束掠夺性的战争；公布密约，揭穿侵占别国领土的政策；最后，宣布被压迫民族劳动群众实行自决，承认芬兰独立,——这些就是苏维埃政权在苏维埃革命初期所实施的主要措施。

这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

在中部开始的革命，是不能长久地停留在中部狭窄地域范围内的。革命在中部胜利后，就必然要扩展到各边疆地区去。果然，革命浪潮从革命的最初几天起就从北部泛滥到全俄国，席卷了一个又一个边疆地区。但是它在边疆地区碰到了堤坝，这就是在十月革命以前就已经成立的“民族委员会”和区域“政府”(顿河、库班、西伯利亚)。原来.这些“民族政府”连听都不愿意听社会主义革命。它们在本性上是资产阶级政府,根本不愿意破坏旧的资产阶级秩序,相反地，它们认为有义务来全力保存并巩固这一秩序。它们在本质上是帝国主义政府，根本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决裂，相反地，只要有机会，它们从不放松去侵占并统辖“异”民族的几块或几小块领土。所以，各边疆地区的“民族政府”向中部的社会主义政府宣战是并不奇怪的。它们一经宣战，自然就成了纠集俄国一切反革命势力的反动基地。谁都知道，所有被驱逐出俄国的反革命分子都奔向这些基地，他们在这些基地上编成了白卫“民族”部队。

但是，除了“民族政府”，在各边疆地区还有各民族的工人和农民。他们在十月革命以前就已经仿照俄国中部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组织了自己的革命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从来没有同自己的北部弟兄断绝过联系。他们同样力求战胜资产阶级，他们同样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所以，他们和“自己的”民族政府的冲突与日俱增是并不奇怪的。十月革命只是巩固了边疆地区的工人和农民同俄国的工人和农民的联盟，鼓舞了他们对社会主义胜利的信心。而“民族政府”对苏维埃政权的战争则使各民族的群众同这些“政府”的冲突达到完全决裂的地步，达到以公开起义反对它们的地步。

这样就形成了反对俄国各边疆地区民族资产阶级“政府”的反革命联盟的全俄国工人和农民的社会主义联盟。

有些人把各边疆地区“政府”的斗争描绘成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无情的中央集权制”、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这是完全不对的。世界上没有一个政权像俄国的

苏维埃政权这样允许如此广泛的地方分权制，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像俄国的苏维埃政权这样给予各民族如此充分的民族自由。各边疆地区“政府”的斗争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反对社会主义的斗争。打出民族旗帜只是为了欺骗群众，因为它是一面便于掩盖民族资产阶级反革命阴谋的受人欢迎的旗帜。

但是，各“民族”政府和区域“政府”所进行的斗争是力量悬殊的斗争，“民族政府”两面受敌：外受俄国苏维埃政权攻击，内受“自己的”工人和农民攻击。因此，它们经过最初几次战斗以后就不得不退却了。芬兰工人、托尔帕利〔35〕的起义和资产阶级“上议院”的逃亡，乌克兰工农的起义和资产阶级“拉达”的逃亡，顿河、库班、西伯利亚工农的起义和卡列金、科尔尼洛夫、西伯利亚“政府”的崩溃，土尔克斯坦贫农的起义和“自治政府”的逃亡，高加索的土地革命和格鲁吉亚、阿尔明尼亚、阿捷尔拜疆的“民族委员会”的完全孤立无援，——这些就是表明各边疆地区“政府”完全脱离了“自己的”劳动群众的尽人皆知的事实。被彻底击溃的“民族政府”“不得不”求助于西方帝国主义者，求助于全世界各民族数百年来的压迫者和剥削者来对付“自己的”工人和农民。

这样就开始了外国干涉和边疆地区沦陷的时期，这个时期再一次揭穿了“民族”政府和区域“政府”的反革命性。

只是现在大家才明白：民族资产阶级追求的并不是使“自己的人民”从民族压迫下解放出来，而是从人民身上榨取利润的自由，是保存自己的特权和资本的自由。

只是现在才知道：不和帝国主义决裂，不推翻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政权不转到这些民族的劳动群众的手里,被压迫民族就不能解放。

对自决原则的旧的资产阶级的看法和“全部政权归民族资产阶级”的口号就这样被革命进程本身所揭穿了，抛弃了。对自决原则的社会主义的看法和“全部政权归被压迫民族劳动群众”的口号则获得了被采用的全部权利和机会。

这样，十月革命结束了旧的资产阶级的民族解放运动，开辟了被压迫民族工人和农民的新的社会主义运动的纪元，这个运动的目的在于反对一切压迫（也包括民族压迫)，反对“自己的”和异族的资产阶级政权，反对整个帝国主义。

三 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

十月革命在俄国中部胜利并蔓延到许多边疆地区后，就不能局限于俄国领土范围之内了。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下层民众普遍不满的气氛中，它不能不波及邻近国家。俄国同帝国主义决裂并摆脱掠夺性的战争；公布密约，庄严地废除侵占别国领土的政策；宣布民族自由，承认芬兰独立；宣告俄国为“苏维埃民族共和国联邦”，苏维埃政权向世界发出对帝国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的战斗呼声，——所有这一切不能不对被奴役的东方和流血殆尽的西方发生重大影响。

果然，十月革命是世界上第一个打破了东方被压迫民族劳动群众数百年来的沉睡并把他们卷入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斗争的革命。在波斯、中国和印度效法俄国的苏维埃成立工农苏维埃的事实，充分有力地说明这一点。

十月革命是世界上第一个成为西方工人和士兵解救自己的活榜样并推动他们走上真正摆脱战争和帝国主义压迫的道路的革命。奥匈帝国和德国的工人和士兵的起义，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成立，奥匈帝国没有充分权利的各族人民反对民族压迫的革命斗争，都十分雄辩地说明这一点。

问题完全不在于东方的斗争乃至西方的斗争还没有摆脱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杂质；问题在于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开始了，这个斗争正在继续进行并且一定会达到它的逻辑的结局。

外国干涉和“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占领政策，只是使革命危机尖锐化，把更多的民族卷入斗争，扩大同帝国主义作革命搏斗的地区。这样，十月革命就在落

后的东方各族人民和先进的西方各族人民之间建立了联系，把他们拉进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阵营。

这样，民族问题就从反对民族压迫的局部问题发展成为各民族、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

第二国际及其首领考茨基的该死的罪过之一，就是他们对民族自决问题的看法始终和资产阶级的看法相同，不了解民族自决的革命意义，不会或是不愿意把民族问题放在和帝国主义进行公开斗争的革命基础上，不会或是不愿意把民族问题和殖民地解放问题联系起来。

鲍威尔和伦纳一类奥国社会民主党人愚蠢的地方，其实就在于他们不了解民族问题和政权问题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力图把民族问题和政治分开并把它限制在文化教育问题范围之内，忘记了帝国主义和被帝国主义奴役的殖民地的存在这样的“小事”。

有人说，在社会主义革命日益高涨的情势下，自决和“保卫祖国”的原则已经被事变进程本身废弃了。事实上，被废弃的不是自决和“保卫祖国”的原则，而是对这些原则的资产阶级的解释。只要看一看呻吟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和渴求解放的沦陷区，只要看一看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不受帝国主义强盗侵害而进行着革命战争的俄国，只要想一想奥匈帝国目前爆发的事变，只要看一看那些已经自行组织苏维埃的被奴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印度、波斯、中国)就足以理解按照社会主义解释的自决原则的全部革命意义了。

十月革命的伟大的世界意义主要在于：

（一)它扩大了民族问题的范围，使民族问题从欧洲反对民族压迫的局部问题变为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

（二)它给这一解放开辟了广泛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这就大大促进了西方和东方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把他们汇总到胜利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巨流中去；

（三)它**从而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建成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

这其实也就说明了为什么东方和西方的劳动人民和被剥削群众现在以难于描述的热情对待俄国的无产阶级。

这主要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强盗目前这样疯狂地攻击苏维埃俄国。

毛泽东篇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1939 年 12 月）

新民主主义论（1940 年 1 月）

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1948 年 11 月）

将革命进行到底（1948 年 12 月 30 日）

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 年 6 月 30 日）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9 年 8 月 14 日）

别了，司徒雷登（1949 年 8 月 18 日）

“友谊”，还是侵略？（1949 年 8 月 30 日）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1949 年 9 月 16 日）

批判大汉族主义（1953 年 3 月 16 日）

【志愿者的话：本文件不提供，请自行寻找原文】